

神仙湖



SPRING 2024
THE FAIRY LAKE



故乡在何方
WHERE ARE WE FROM?



2024 年 1 月 第 1 期 总第 12 期
Spring 2024

刊名《神仙湖畔》由校长徐扬生教授题赠

主管

Authorities in Charge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主办

Sponsor

传讯及公共关系处

Communications and Public Relations Office

顾问

Adviser

徐扬生

President Yangsheng Xu

邓康延

Deng Kangyan

出品人

Producer

马明霞

Ma Mingxia

主编

Editor-in-Chief

北海

Beihai

副主编

Deputy Chief Editor

徐涵

Xu Han

李佳阳

Li Jiayang

张筠尉

Zhang Junwei

英文编审

English Editor

陈俊豆

Chen Jundou

视觉监督

Visual Design

陈鸣

Chen Ming

排版设计

InDesign

陆艳钰

Lu Yanyu

学生编委会

主编

Chief Editor

惠诗雅 Hui Shiya

副主编

Associate Editor

冯子凌 Feng Ziling

编务组

Editor&Reporter

责任编辑

Managing Editor

杜 可 Du Ke

薛中凯 Xue Zhongkai

叶润博 Ye Runbo

刘璐嘉 Liu Lujia

张恩禧 Zhang Enxi

罗筱茜 Luo Xiaolian

唐嘉谣 Tang Jiayao

陈智欣 Chen Zhixin

林之源 Lin Zhiyuan

采编

Editor

季伊忱 Ji Yichen

高子悦 Gao Ziyue

施清源 Shi Qingyuan

谭芷韵 Tan Zhiyun

黄子珊 Huang Zishan

童 溢 Tong Yi

唐可馨 Tang Kexin

罗雯静 Luo Wenjing

赵榕熙 Zhao Rongxi

刘广悦 Liu Guangyue

蒲严博 Pu Yanbo

于 睿 Yu Rui

文宣组

Public Relation

宣传

Publicity

黄语忻 Huang Yuxin

伍彤悦 Wu Tongyue

陈依雯 Chen Yiwen

美术编辑

Art Editor

陈彦升 Chen Yansheng

裴嘉琨 Pei Jiakun

郑奕然 Zheng Yiran

李潇彤 Li Xiaotong

行政组

Project Management

Organization

肖毅然 Xiao Yiran

王梓涵 Wang Zihan

叶未央 Ye Weiyang



《神仙湖畔》杂志社
The Fairy Lake Magazine

E-mail: fairylake@cuhk.edu.cn

电话：0755-84273523 Tel: 0755-84273523

地址：行政楼东翼 303 室 Address: E303,Administration Building

声明：本作品版权由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Copyright ©2023 b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次 2024 年 5 月深圳第 1 版

May 2024 Shenzhen 1st Edition

开本 215mm × 285mm

Format 215mm × 285mm

CONTENTS

目录

演讲

徐扬生校长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辞	08
-----------------------------	----

主题报道

故乡在何方 Where are we from?

一、乡愁剪影

我眼中的故乡——摄影投稿节选	19
时代剪影中人与乡土的情感纠葛——“家族史”优秀作业片段汇总	28

二、去国离乡

再探乡愁：黔贵村寨中的乡土之思——专访 2022 级本科生杜俊林	35
半径扩大的同心圆： FROM HOMETOWN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40

三、此心安处

离开故乡，获得故乡——《十三邀》观影沙龙纪实	55
街头启示录：走向心中的故乡	62
当代年轻人与故乡连接的新构建——专访 2020 届毕业生黄嘉俊	67

人 物

专访经管学院谭安厚教授：我们都是答案的一部分	78
邓扬舟：做一棵高出自己的树	86
二十岁，我们的黄金时代 ——专访播客《二十纪事》栏目创办者董智行、廖冰雁	92
于神仙湖畔，谈《神仙湖畔》 ——专访《神仙湖畔》杂志社前主编叶润博	99

校长专栏

黄昏的神仙湖	104
--------	-----

书 院

共启新途，筑梦前行——逸夫书院旗下学生组织专访	110
-------------------------	-----



Sharing
and
exchange
of ideas

演讲

分享观点 碰撞思想

SPEECHES



徐扬生校长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大会上的致辞

编辑 / 唐嘉谣
主编 / 惠诗雅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大会暨发展论坛

3月23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大会暨发展论坛在大学礼文堂举行。各级政府领导、百余名院士、各界社会嘉宾、海内外高校代表、全球校友代表、全国各地考试院院长代表、全国重点中学校长代表、在校师生、全国各地的家长代表以及新闻媒体等，共1000余人欢聚一堂，以“感恩”为主题，共同见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



徐扬生校长在建校十周年大会上发表演讲。

各位朋友，各位同事，各位同学：

今天是个大喜的日子！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周年了，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大学全体师生感谢各位嘉宾的莅临！特别感谢韩启德委员长、李家超特首、覃伟中市长、段崇智理事长、刘遵义校长刚刚的讲话，令我们倍感鼓舞和荣幸。今天，我要感谢来自世界天南地北的各位朋友、校友，你们都与这所大学有着深厚的情谊与缘分，都参与、见证、帮助了这所大学的成长，看到你们，我的脸上是笑容，心里是激动的泪水，我们都曾是一条战壕里并肩作战的战友！今天能够与大家共聚一堂，共同庆祝这所大学的十周岁生日，何其有幸！何其难忘！

朋友们，回顾这十年的历程，感慨万千……常言道，“人间三月有幸事”，十年前的3月21日，正好是我农历的生日，我还记得那天早餐，家人为我准备了一碗面条，上面加了一个鸡蛋，吃过早餐来到办公室，就接到了教育部的电话，通知我这所大学去筹已获批准——国家正式批准参照《中外合作办学条例》设立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历时一年零两个月的审批过程终于顺利结束，一所全新的现代化大学就这么诞生了！

那是2014年3月底，5月就要招生了！我们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告诉全国几千所中学的学生和家长，世界上有这么一所大学，她的教育理念是什么，任务非常艰巨。而当时的我们可以说是“手空空，无一物”，这是我们当时的校园、启动区的改建工程，我们是从一片荒芜的空地和几幢废旧的厂房起步的……

我去的第一所中学是深圳中学，后来一步步往北走，走遍了大江南北。我走了100多所全国的重点中学，我的同事们走得更多，就这样，我们的教育理念走向了神州大地的千家万户。有了学生，我们的校园建设和师资招聘分秒不能延误，首先要解决学生的住宿问题，只能借用对面的信息学院的宿舍，当时的龙岗不像现在这么繁华，学生下了晚自习之后要过马路，走很长一段没有路灯的夜路，很不安全，于是，每天晚上九点半后，我都会站在路边，看着学生安全回到宿舍。



2014 年首次本科招生宣讲会



徐校长在晚上看护学生回宿舍。

当时有位家长拍下一张照片，记录下办学初期条件的困窘。这只是办学过程中我们所遇到的许许多多困难与挑战的一个缩影。

朋友们，这是奋斗的十年，我们每一天过得格外漫长，而这十年却又过得这么快！（The days are long, and a decade is so short）。时至今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已经是大湾区一座风景秀丽、朝气蓬勃的大学，已建成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医学院、音乐学院六所学院；逸夫、学勤、思廷、祥波、道扬、厚含和第七书院共七所书院；占地约 133 万平方米，建筑面积 65.6 万平方米，正在建设之中的包括医学院、音乐学院和直属医院的建筑面积 126.67 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教职员工 1881 人，在校生 10118 人（其中，本科生 6641 人，硕博生 3477 人）。

创校初期，我在全校师生员工的会议上讲了四句话“一腔热血，百年大学，千载品牌，万世

良心”，我们是一群有理想的人，走遍天下，现在凭着一腔热血，来到这里创办一所中国自己的国际大学。我同大家提了四条要求：第一，港中大（深圳）是所有师生员工、校友和家长的港中大（深圳），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面，学生是第一位的，老师是第二位的，校长是第三位的，我们与这个大家庭风雨同舟、荣辱与共，一起开创这所百年大学；第二，港中大（深圳）是深圳的港中大（深圳），是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我们有责任为深圳的经济、社会和人才发展作出贡献；第三，港中大（深圳）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延续，没有香港中文大学就没有港中大（深圳），我们要用自己的生命来守护和发扬香港中文大学的声誉、品牌和传统；第四，港中大（深圳）是中国的乃至世界的港中大（深圳），我们要在国家的发展、民族的复兴和世界科学技术的进步中，留下我们的足迹。

十年过去了，这一阵子我们一直在思考，在

这十年中我们做对了什么？哪些是我们的经验教训，下面我想与大家分享几点感悟：

第一，我们立足国家发展战略和大湾区的人才需求，规划四大学科群，迄今为止，这四个学科群的发展已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第一个学科是经济金融，目前有全职教授 123 人，全部从世界顶尖大学引进，学科的师资、学生质量和学术质量完全可以与世界上任何一所大学的相关学科相媲美。第二个学科是计算机数据科学，目前有全职教授 117 人，全部从世界顶尖大学和研究所引进，在 5G 网络、人工智能、机器人、统计科学等领域建立了国家和地方 23 个重点实验室，数据科学理学硕士在 2023 年被 QS 评为中国第一，机器人学科在 CS Ranking 机器人领域

连续十年被评为中国第一。第三个学科是材料化学，汇集了 7 位院士和几十位世界一流科学家，其中唐本忠教授被评为化学领域中国第一、世界第五的科学家，在纳米结构聚集发光材料领域取得重大突破，荣获 2021 Nano Today Award 和 2023 Biomaterial Global Impact Award。第四个学科是生物医学，我们组建了三个以诺贝尔奖得主领衔的重点研究院，包括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科比尔卡创新药物研究院和切哈诺沃精准再生医学研究院，建立了第一个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生物信息数据库。

第二，我们建立和实施了一套完整的学术管理体系和人才评价系统，保证了我们的师资水平和学术质量能够站在国际一流大学的前列。大学



二期校园落成后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图书馆

于外部设立校外专家委员会、外部审查委员、外部评审学者的三级评审制度，于内部设立教学委员会、同行评议，并引进港中大课程和教学评估问卷，形成完善高效的学术与教学质量评估机制。自办学以来，在教育部的高校办学质量评估，以及历次香港特区政府质保局质素核证中，大学的学术与教学质量均获得高度赞许。大学按照国际一流大学水准，采用“9+3”灵活的薪酬体系，面向全球遴选师资。学校已面向全球招聘引进了655名国际知名学者，其中包括诺贝尔奖得主5名，院士40余名，国家级人才101名。引进的教师100%具有在国际一流大学学习、工作的经验，是一批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和教书育人热忱的优秀教师。

第三，我们紧紧抓住了学生的两头，即进口和出口，招生质量和毕业生质量是社会对这所大

学认可度的考验。十年来，我校招生在绝大多数省份，文科 / 历史类最低录取分位居各省市考生前0.7%以内，理科 / 物理类最低录取分位居各省市考生前1.5%以内，已连续八年成为凭高考成绩录取的广东省内院校分数最高的大学。大学在广东、浙江、福建、江苏、山东、上海等六个省市采用“6+3+1”的综合评价考试录取方式，在人才的综合评价与选拔方面提供了有效的创新方案。我们的毕业生获得海内外的广泛认可，大学已培养了六届本科毕业生，八届硕士毕业生，四届博士毕业生，80%的毕业生选择继续深造，其中71%就读世界排名前50的大学。选择就业的毕业生，平均年薪高达17.08万元，其中逾半数选择在粤港澳大湾区就业。

第四，我们传承香港中文大学六十年来所坚持的书院制和全人教育理念，建立了一套完整的

育人方法和学生管理体制，先后建立了七所书院，实施四年一贯的通识教育课程。培养学生成为“学贯中西、会通古今、融合文理”的综合型人才。大学非常重视艺术教育，通过驻校艺术家和艺术课程等形式，培养学生的审美能力和艺术情操，提高学生的情感能力、想象力、创造力。同时，我们已与148所世界名校开展实质性合作，各类国际合作项目达250个，本科在校生中具有境外学学习经历的占比超过60%。

第五，我们建立了一套与社会密切互动、鼓励社会参与办学的系统。一所好的大学是一个社会的灵魂，十年来，深港两地社会各界对这所大学给予了高度的认可和信任，我们每年给优秀贫寒学子发放的奖助学金高达1.3亿—1.4亿元，全部来自于社会捐赠，没有依靠大学的行政经费，也没有依靠政府支持。我们鼓励学生走出校门，建立了完备的校外导师制度和社会实习、实践环节。我们鼓励教授走出校门，与企业共建了20多个实验室和研究所，采用“9+3”薪酬体系，鼓励教师到企业开展科研合作。我们的学生家长是我们与社会的纽带，虽然子女早已毕业离校，但家长永不毕业，他们始终以爱与奉献的精神帮助这所大学和社会一起成长。

朋友们，我们之所以做对了这些事，是因为这所大学的立校之本是四个字——“融汇创新”，简单地讲，就是“包容”和“创新”，我们包容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制度、不同的学生、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学科；我们提倡“创新”，包括教师薪酬制度的创新、招生制度的创新、学生管理制度的创新、教学内容的创新；我们培育科学思维和科学精神，培养下一代创新型人才。朋友们，包容就是自信，创新就是自强，包容才有“全球命运共同体”，创新才有“新质生产力”，我们只有坚守这两条，才能真正培养有担当、有能力、有作为的一流人才，昨天是如此，今天是如此，明天还是如此。

朋友们，我们取得了这些成绩是无数人的汗水与心血浇筑而成的，我要特别感谢教育部、中央港澳办、中联办和中央有关部委，香港特区政

府、广东省委省政府、深圳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龙岗区委区政府，感谢香港中文大学的管理层、校董、校友和师生，以及深港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没有你们的信任、厚爱与支持，就没有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今天！今天是一个充满感恩的日子，我希望郑重地向所有关心过、支持过、帮助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朋友道一声：“感谢！”

朋友们，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建设现代化强国的战略高度上提出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创新是根本，基础和先靠教育，这对进一步深化科技和教育体制改革，构建高质量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和深化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将继续以“融汇创新”的精神，担当为国家探索自主培养高层次国际化人才的使命。在未来十年里，我们将在各个方面全面提升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全球影响力：在学科方面，建成15—20个世界一流学科，进入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科研方面，继续按照国家及大湾区的战略需求，建立基础性、前沿性、跨学科的科研平台和技术转化中心；继续深化与香港中文大学及国际高校合作伙伴的创新合作，将大湾区打造成国际高等教育的高地与枢纽。我们要砥砺前行，锐意创新，把这个学校建设成为国家中外合作示范性大学，在2035年建成国际化一流研究型大学。

最后，我想和我们的学生讲几句话，同学们，我们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文明的进步并不总是直线型的，我们要有耐心，要有信心，要往远看。十年前，我在旧厂房改建的图书馆的电梯上写了一句话，“在这个深夜里，哪怕只有我一个人还在这里读书，人类就有救。”读书人要有读书人的坚守与志气，要对国家、对社会有我们的担当和责任。我要感谢你们，感谢你们对大学理念的认同，我为你们骄傲，是这所大学把你们推向了世界，也是你们把这所大学推向了世界，这里是你们永远的精神故乡。今后的道路，希望你们，我祝福你们！

谢谢大家！

Spotlight on youth

主题报道

聚焦青年话题 洞察青年思想

FEATURES





故乡在何方 Where are we from?

故乡在何方？这是一个容易回答但又内含深意的问题，当我们讨论故乡的时候，也许我们的脑海中浮现的是一首童谣、一句诗歌、一口老井，或是一声呼唤。每个人都在这世界的某个角落留下了对于人生与世界最初的记忆。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时代的发展，我们或走出故乡，前往未知的远方探索生命的新可能；或固守热土，在熟悉的环境中平稳而简单地生活。伴随着我们的阅历不断增加，我们与故乡的关系与情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也许儿时的那个故乡已被我们远远抛在身后，渐行渐远；也许故乡发展的脚步走得比我们还要迅速，变得让我们难以辨别。无法重返的故乡席卷着我们的过往远去，而时代的浪潮裹挟着个人的命运涌向未知的地方。

如今，迁移与流动维系着社会的运行，旧有的秩序被打破，新的秩序尚未成熟，当陌生关系与浮泛交往成为人际主旋律，我们又该如何回望那个给我们留下最初记忆的地方。抑或者，我们如何与周围的环境构建一种全新的联系，以轻松而热情的态度拥抱当下，把握幸福。

Part 01

乡愁剪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个人的心中都有属于自己的“城南旧事”。草木无情，砖瓦无言，但是一草一木、一砖一瓦承载着每个人对于故乡的独家记忆，皆为我们人生的底色。那些隐于心头的珍贵回忆，便是此心安处的吾乡。若问何为故乡，我们收集的故乡的剪影，便是每个人心头故乡的模样。

我眼中的故乡

—— 摄影投稿节选

编辑 / 赵榕熙

编审 / 徐涵



广西崇左

崇左的水是蓝的，石头是绿的。这是一座边境线上的小城市，人烟稀少，鲜为人知。当我来到港中大（深圳）上学，意识到周围没有人知道它的时候，似乎走出山山水水的不只有我，还有它的名字——崇左，我身份证上的籍贯，我的故乡。

我喜欢在发家乡照片的时候在左下角打上崇左的定位，喜欢说自己来自一个哪怕无人知晓的崇左，喜欢说“崇左的水是蓝的，石头是绿的”。似乎和崇左的名字一样，这里蓝色的水和绿色的石头仅仅囿于它荒无人烟，鲜为人知。尤其是，当我看到一串一串外地牌照的自驾车和一族一族操着异地乡音的人误打误撞，来到离我的村子十几公里的一个景区。而那个景区所有的一切，不过是这座小城市里五步一石、十步一泉的司空见惯的一切。

我无意让它成名，只是它蓝色的水已经流淌在我的血液，绿色的石子已经建构成我的骨架。我在走出了它的山山水水的同时，也带上了它的山山水水走出去，活下去。

——黄思睿《清泉石上流》



广东肇庆

时隔多年回到家乡，于外婆的菜地旁。恰逢日落，阳光透过油菜花瓣使其发出盛放的光，我在田埂上走“独木桥”，看向脚边奔腾流淌的小水沟，忍不住惊叹，叹那大自然里的美好生命力。小水沟流过这片土地，留下的是几代人的饱腹与美梦。于是掏出口袋里的小微单，着急忙慌地捕捉到了这一刻。思绪随流水回到了童年，以前我们家经常回来这里，我就爱钻进菜地玩水挖土抓小虫。其实，幼稚点没什么不好的，因为只用专注于一方泥土，一片云彩，就可以开心很久很久……至于内耗和焦虑，早一并灰飞烟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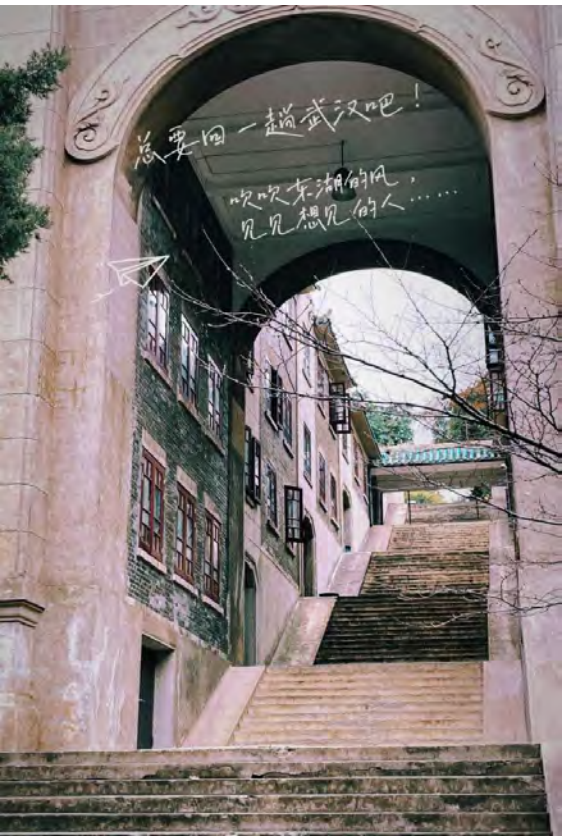
——薛凯晴《流淌，盛放》

苏州并不是我的故乡，但今年春节我去苏州游玩了。常言道：“在苏州过酥年”，苏州评弹非常动听，吴侬软语名不虚传，演唱者的微笑、自信也很动人。然而吴语的小众与濒临绝迹也是残酷的现状。如此那些为吴语宣传的各类艺术从业者的身影也是可歌可敬的。这张照片拍摄时刚好演员在演巴金的《家》的评弹曲目，现代离家工作、生活的游子很普遍，对于他们来说，家的概念可能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出生的地方，还包括从小耳濡目染的传统文化所涉及的地方，那是他的文化之根，《史记》第一世家吴太伯所创建的吴国，即今苏州一带，也是这样一处地方呀。

——陈炳林《评弹茶馆·家》



江苏苏州



湖北武汉

1月22日清晨，南昌的居民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苏醒，大地早已喜气洋洋地披上二十年不曾穿过的棉袄，生怕冻坏了正孕育着新生命的枝丫。街上来来往往皆是为生活奔忙之人，而这场大雪，仿佛为人们的生活踩了个急刹车，告诉他们，多看着脚下，照顾好自己，为自己添件新袄子吧，准备过年啦！

——过静予《雪袄》



江西南昌

从小在珞珈山东湖边长大的我，从2014年来深圳后每年都会至少回一次武汉，回到从小长大的地方，呼吸旧旧的熟悉的空气，每次都会有充满电的感觉。有了孩子以后回去充电的机会越来越少。电量低的时候看看这张照片，就能闻到木头散发的潮湿味道，听到上下台阶的脚步声，看到遮天蔽日的梧桐树，一种心安踏实的感觉。

——衡小狮《吹吹东湖的风》



贵州遵义

大年三十除夕夜是一定要放烟花的！从小到大，每年过年之前都会买上几大箱烟花，有“窜天猴”“加特林”“摔炮”等等。当然还有红色的一长挂的大鞭炮。点燃引线后一定要躲起来，不然噼里啪啦的炸得耳朵痛。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立在地上，左炸一朵，右炸一朵，火树银花一般的小盒子烟花。它小小的，没那么响，也不太持久。但是一闪一闪时，真的很光彩夺目。

这些烟花构成了我对家乡的原初记忆。每年假期回乡的日子也好似烟花一般，短暂而绚烂。无论是回忆还是照片里，都明亮张扬，熠熠生辉。

——汪邻筠《烟花辉煌》



河北邢台

我的老家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三线小城市。儿时每年的暑假，我都会因为父母工作的原因，跟随姥姥姥爷像候鸟一样向北迁徙，来这座淹没在繁华都市中的老城。但是它却有着我童年全部的记忆。

夏天，我们在草丛里捉蚰蚁、去邻居家摘无花果；冬天每到春节，这座城市便开始忙碌起来，小区门口的夜市灯火通明，鞭炮响到天明。5块钱一串的糖葫芦又大又圆，小推车里的炸布袋永远都是新鲜出炉。

每年春节的常驻节目，就是听老一辈讲故事。姥姥姥爷的兄弟姐妹都离开了这座城市，去了北京、青岛这样更大、机遇更多的地方。只有我们这一家，还扎根在这里。大城市闯荡的人很多，但停留在故土的人却愈加的少。如果可以，我希望能有更多的人看到河北，看到邢台这座城市。正如它们的宣传标语：“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陈一帆《老城的新色彩》

图为过年期间我去仁和骑自行车时所拍。我的家乡攀枝花是一座以花命名的城市，图片中正是盛开的攀枝花（别称木棉花），攀枝花开花的时候没有叶子（叶子掉光了），在每年春季（春节前后）开花，红红火火预示新一年新气象新开始。同时一望无际的蓝天和阳光也是我最喜欢的天气，红花，蓝天和绿树，随手一，拍家乡的风景都很美！

——陈思洁《故乡的攀枝花》



四川攀枝花



广东江门

正月初六，因外舅公家新建祖宅，举办席宴的缘故，我第一次去到外婆出生成长的地方，在小巷听着母亲回忆起儿时与她外婆的故事。太阳渐渐下山，阳光洒在小巷，就在这时，三只小狗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它们站在远处，一齐地望向散步的我们。那一刻，感到时光悠悠，岁月静好。我迅速拿出手机，记录下了这一刻。

——伍铠佑《时光》



辽宁沈阳

这张照片摄于今年的正月初四，我回到儿时生活的沈河区“扫街”，正好看到当天的新月与小南教堂的塔顶融为一体。塔顶被月色涂上了一层柔和的银光，静静地伫立在夜色之中。空气中传来的钟声，似乎带着一丝古老的回响，穿透寂静的夜空，触动着每一个经过的行人的心弦。这一刻，时间仿佛静止了，所有的喧嚣都退去，只留下了教堂的尖顶、细弱的新月和那宁静而神圣的钟声。

—— 孟子迪《月光下的祷告》

$$\begin{array}{c|c} 1 & 2 \\ \hline & 3 \end{array}$$

1. 妈妈带着 100 天的宝宝经过 1330 公里奔波，留下和太外婆的合影。

——Esar HU《源》，浙江慈溪

2. 近乡情难怯。哪怕一年不见，故乡的亲朋好友总是一见如故的。那刻在基因里、融进血缘中的羁绊，无论何时都割不断，舍不下。

——陈俊羽《好久不见》，浙江金华

3. 每座城市都有自己的幸福密码，富阳的幸福密码就藏在名字之中，“生活富裕、生命阳光”。奶奶的传统手工艺和现代美好幸福的生活。

——董震扬《奶奶的草鞋》，浙江杭州



组图·人物记



$$\begin{array}{c|c} 1 & \\ \hline 2 & 3 \end{array}$$

1. 广东普宁，德安里前，天真烂漫、坚毅神勇的舞龙舞狮少年正在表演。

——方保骅《螺线与瞬间》

2. 浙江金华，香烛供品八仙桌，宴请各路神仙。这独一份的仪式感，哪怕不信神佛，此时也忍不住虔心许愿，祈愿来年风调雨顺、万事如意。

——陈俊羽《谢佛》

3. 广东汕头，女子英歌舞。

——匿名来稿《女子英歌队》

组图·风俗记



组图·景色记

浙江海宁

盐官，一个文人雅士层出不穷的地方。孙中山曾经来到这里观钱江潮，挥笔写下“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但在今天，盐官海塘更多了一份静谧和安详，向我们诉说着它的故事。

——王侑欣《The Land of Tides》

山东济南

这是泉城济南春天白石桥上的景色。护城河畔，白石泉边，春水与蓝天齐翠；小桥迎风，画船听雨，闲情与归心共眠。这是一个可以享受生活的城市。

——李旻尚《春水碧于天》

广东肇庆

传说七仙女下凡，被肇庆美景吸引，愿日日与美景作伴，不愿再回到天上，因此化身为肇庆七星岩。约上三五知己，在此登高摘星，泛舟星湖，谓之良辰美景。

——夏艺嘉《仙女湖》

贵州贵阳

贵阳甲秀楼始建于明朝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取“科甲挺秀”之意，设有浮玉桥衔接两岸。是闹市中的清幽之地，入夜后灯火辉煌，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的聚焦点，在现代文明中闪烁着历史的光芒，昂扬着“甲秀天下”的精神风貌，是贵阳历史的见证，文化发展史上的标志。

——陈苑珏《甲秀楼》



- | | | |
|---|---|-------------------|
| 1 | 2 | 1. 浙江海宁日出东山（王侑欣） |
| 3 | | 2. 甘肃兰州白塔山一角（吴卓亿） |
| | | 3. 浙江温州傍晚海滩（陈坤） |

时代剪影中人与乡土的情感纠葛

——“家族史”优秀作业片段汇总

学生采编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前言

“家族史”作业是“GEA2000——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调研任务，其目的在于通过对家族中人物经历的深入了解，系统地认识并体会祖辈所处的年代，他们身上的故事所映射的时代缩影，理解他们面对命运的路口时所做出的抉择，并看见他们的身影如何在我们的基因中刻下记忆，并代代相传。

本次收录的“家族史”优秀作业片段，主要展现了时代浪潮下人与故乡和异乡的情感纠葛，从文中，我们能窥见那段轰轰烈烈的历史中无数人物的缩影，理解时代的车轮是如何一步步走到我们当下的世界，而我们与故乡、与乡土的联系又是如何随着时代的洪流发生瓦解与重构。

一、大时代洪流下的知识分子们

二十世纪六十年的中国是风起云涌的：从1961年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恢复与发展国民经济方针的提出到“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暴发；从1966年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取消到上山下乡运动的蓬勃开展，时代浩浩荡荡的洪流影响着身处其中的每一个个体，我的姥爷丁陵就是其中之一。

丁陵1948年出身于山东济南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从小成绩优异，顺利地考入市里最好的高中，还有15天就要参加高考的他却在1966年高考制度取消后迎来了命运的陡然转折。1968年，于家中待业的姥爷深受当时社会动员宣传的鼓动，满怀着建设祖国的热情，自愿报名参与了上山下乡运动。1968年7月7日，他在济南市的统一安排下，来到山东省临沂市册山区破石桥村开始了长达两年半的下乡生活。在当时的中国农村，人们在人民公社制度之下进行生产活动。知青们作为“插队”来到农村的外来者，既无农业合作经济组织中的财产，其生活习



在党与国家的号召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蓬勃开展。

惯又与乡村格格不入，他们在融入农村过程中与当地农民关系由此经历了从“隔离”到“交流融入”的过程。在与长辈的交谈中，笔者得以跳出教科书中的宏大叙事，以个体的视角了解下乡知青群体的生活状态。在本篇家族史论文中，笔者将基于知青在上山下乡运动中的日常生活，展现知青群体与当地农民关系的演变的过程，在小个体与大时代的共振之下对当时个体的遭遇进行思考与总结。

姥爷下乡的经历，是中国1968年7—10月间百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经历的一个缩影。^[1]潘鸣啸将下乡知青群体称作“失落的一代”，因为他们在本该学习的年龄丧失了求学的机会。^[2]在主流文献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以文革中知青生活为题材的“伤痕文学”“苦难文学”的记述之中，这段历史被蒙上了一层悲伤的黑纱。在读完《失落的一代》后，我对于1968年至1970年中国农村的印象是：生活疲惫而乏味，农民愚昧而封闭，知青们青春宝贵的年华仿佛被白白浪费在了“落后”的乡村。但是，我的姥爷下乡的经历给予了我看这段历史的独特视角，让我看到了大时代“黑纱”下的一抹鲜明的亮色。知青们在与破石桥村的农民们相处中，逐渐交流交融，形成了亲人似的关系。原本“十指不沾阳春水”的青年们，来到乡村这个广袤的课堂上，了解了中国的另外一面，在劳作与交流中磨砺了品质，加深了对于中国社会的理解。今年我的姥爷已经75岁了，上山下乡为他留下的烙印依然明显。尽管现在物质条件比当年丰富得多，他也一直坚决地贯彻了几十年“光盘行动”；他永远和善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对于任何挫折都波澜不惊。他说，这都是在破石桥村的老农民身上学到的；^[3]我想，这也是大时代的洪流为其中的知识分子个体带来的最深刻的烙印。

——王珂昕：《大时代洪流下的知识分子们——个体视角下看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青群体与当地农民关系的演变》

二、出乡：城市梦

19世纪60年代国家优先发展工业和农业生产集体化的政策，使得大量的社会资源开始由农村转向城市。好学校，大医院和新工厂都只出现在城市中。而相比之下，农村的发展停滞不前，有些甚至发生了倒退。现代化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并存，形成了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让城市成为了村民的向往之地。农村的逐渐边缘化令叶青感到了恐惧，更让他担忧自己的发展处境。对自我边缘化的担忧使得叶青开始思考改变的出路。对于一个农村的穷小子而言，考上大学，扎根城市是自己唯一可以离开农村、改变命运的方法。自那之后，叶青变得越发努力学习，并成功在一年后考上了省城的重点高中^[4]。对于一个每年只有寥寥几人考上高中的偏僻乡村而言，这无疑是一件大事。得知自己被省重点高中录取的那一刻，叶青几乎以为自己的“城市梦”实现了。他欣喜若狂，在田野中奔跑，兴致勃勃地幻想着未来的美好生活。在叶青对未来的畅想中，却不包含家里的那几亩田地。在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中，土地是一种生存资本，更是人的情感寄托。中国人强调天人合一、人地相称的人地观念^[5]，人地关系圣神而密切，仿佛坚不可摧。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逐渐打破了传统中国文化中人地之间的紧密联系。工业化的发展使得人对“地”的利用和改造能力有着质的提升，人地作用焦点的多元化，打破了原先“地”对于人的限制^[6]，也由此增强了社会流动性。人能动性增强的同时，却并未进一步发展对于“地”的认知^[7]，使得现代化的发展往往缺乏远见，人地矛盾初现端倪。

1966年，省公路建筑工程队在县里招收筑路工人，叶青报名参加并顺利被批准招收。招工的手续已经在各公社部门置办完成，只剩下最后的生产队支部盖章。生产队的支部书记出身当地大族，

他见不得叶青有所作为，更害怕叶家会就此崛起。于是他非但没有同意盖章，反而在生产大队支部意见上写下了“此人思想十分反动”这几个字，叶青的城市梦又一次落空^[8]。他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自己认为最英明正确的党和政府，会听信一个支部书记的片面之词。一个单纯的高中毕业生，就这样被诬陷成了思想反动者。而在 1968 年，这张招工表又被红卫兵翻了出来，成为了批斗叶家的材料，叶家几度陷入风雨飘零之际。支部书记的阴谋诡计令叶青不齿，周围人的颠倒黑白更令他感到气愤。或许是由于心中的书生气，现实的黑暗残酷反而激发了叶青心中对公平公正环境的向往，也愈发加深了他想要逃离故土、扎根城市的渴望。

经过了数十年的挣扎起伏，叶青终于走出了梧桐村，此时的他已经快 30 了。但出乡并未给叶青带来想象中的喜悦，他的心里有着挣扎与矛盾。家庭的重担使得叶青的“城市梦”发生了动摇。尽管现代化的进程在不断消解中国传统家庭主义，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中叶，强调主动承担家庭责任、维护家庭整体利益的传统家庭主义观念仍在个人心中占有着一定的地位，并逐渐渗入到中国现代化的方方面面。



现代化进程使得农村逐渐废弛，仅剩少数人留守。

其与现代个体主义的融合，逐渐形成了“中国式现代家庭主义”^[9]。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传统乡土社会造成了持续的冲击，乡村工业化导致了人地关系的进一步剥离。叶青出乡务工后，几乎不再从事家里的农业劳作。家中的三个子女，也都在城里工作读书。整个叶家只有许香^[10]自己还在坚持着传统的农业劳作，她感到了落寞，似乎自己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人了。而这也是当时梧桐村的普遍现象。

此刻的叶青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城市梦”，真正扎根城市。但在城市打工与在城市定居终究是两件不同的事。处于繁华的都市中，叶青有些怀念故乡。城市中疏离的人际关系和公共生活的匮乏让叶青缺乏安全感。对他而言，梧桐村仍是自己的家乡。逢年过节，叶青总会回老家看看。他重新开始从事农务。家里的田地还种着枇杷和龙眼，但因为无人照料，叶青和妻子到季节也只能把花骨朵一个个折了，防止结果。

乡里的许多土地都建上了新的学校和商场，原本通向县政府的狭窄小道也变成了平坦大路。叶青为故乡的变化感到欣喜，也在反思其中的变化。中国的现代化令农村焕然一新，但同时也造成了传统农业

的落寞，农村结构的衰退。梧桐村或许会被城市逐渐吞噬，这对于许多人而言无疑是致命打击。现代化带走了农村绝大部分的劳动力。不少村子只剩下了老弱妇孺，由此导致了农村土地的荒废问题。现代化的宏大发展政策，却忽略了许多普通人的心理需要和改革背后所付出的惨痛代价。

——叶舒寰：《出乡：时代裹挟下一位普通农村人的悲欢》

三、“闯关东”移民的缩影

我的曾外祖父姜春孝在 1927 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出生于辽宁省安东县前阳镇石门村，是家中独子，其父亲即我的高祖名为姜文善，母亲为吴姜氏。

根据曾外祖母李桂英口述^[11]，家中口耳相传，姜家祖籍为山东登州府文登县，后在乾嘉之交，由于直隶、山东等省遭遇严重旱灾，始迁祖姜行国带着妻儿泛海辽东，先经过庄河，发现庄河已经到达大量山东难民，局势混乱，又于此走丢了一个孩子，就带着剩下的两个儿子姜太和姜平继续向北走，到达安东时发现这里人烟稀少、土质肥沃、临江面海，便于此定居，开荒种地，是第一代“闯关东”移民。

.....

退休后因为他工作优秀，被单位返聘，直到七十岁，才回到了自己阔别已久的家乡，和家人团聚。由于工作性质的特殊，曾外祖父的大半生都在西北地区度过，每年只有七天假期可以归乡，因此错过了自己的父亲去世和三个孩子的出生。边疆辛苦的条件他甘之若饴，但和家人长期的分离让他一直对家人怀有愧疚之情，常跟我的母亲感慨，自古忠孝难两全。而当他再次回到这片生养他的土地定居时，早已物是人非。

曾外祖父因车祸卒于 2001 年，享年 74 岁。一年之后我才出生，虽然我从未见过这位长辈，但我从小一直听他的故事长大。他出生在东北农村的一个小富之家，青少年在伪满洲国的统治下度过，建国以后听从组织安排支援边疆，年逾七旬才告老还乡。他的人生和家庭境遇深受历史潮流的影响，日本人在伪满政权中对中国人的残忍剥削让他家境中落并饱受亡国之痛，历史书上简单描写的日本人的奴化教育落在和他同时代的东北学生身上是對自己尊严的不断拷打和对未来无望的挣扎；而与苏联较近的地理位置让他早早有了共产主义萌芽，无论是和后来加入八路军的堂叔的交往还是在大学学习俄语，他和他的同学都比同时代其他地方的学生更多地接触了苏联的红色思想；但他的出身又与他党员的身份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空中相互矛盾，虽然自己因为被定为中农而幸免于难，但知道自己其他族人的悲惨下场又让他怅然若失，据我的母亲说，他对自己这些族人的结局向来是闭口不谈的，但在他和曾外祖母的书信里，他曾多次提到若这些家道败落的族人来借钱，一定不要吝啬钱财，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年少时报效祖国和出人头地的想法都基本实现，但与家人的长期分离始终让他耿耿于怀，而三个孩子因为时代原因无法像他一样接受高等教育始终是他的一块心病，因此他十分关注我母亲的教育，每次给家中写信都会询问母亲的学习情况，让她一定要考上大学，而他的这种重视教育的思想也从母亲那传递到了我的身上。虽然他早已离开了人世，但他对于这个家族的影响却一直存在，我在他过世的二十余年后写下这些时，还能发现到他的许多思想在我身上的留存。

——赵培然《家族史》

四、离村者

1958 年 1 月，南安县第一个农村人民公社成立。年底，全县 36 个乡调整组建为 9 个公社，参加

[8] 源自对叶青的口述访问，访问日期 2023 年 7 月 22 日。

[9] 刘汶蓉：《家庭价值的变迁和延续——来自四个维度的经验证据》，《社会科学》2011 年第 10 期。

[10] 许香：叶青的妻子

[11] 曾外祖母李桂英的口述资料来自本文作者 2023 年 11 月 1 日的口述访问。

户数占总户数 98%，实行单一公社所有制，压缩社员家庭副业，社员自留地、宅基地、畜禽、果木等生产资料统归公社所有。由生产队办公共食堂，计划劳动，统一财务，采用半供给半工资的分配制度。^[12] 作为社庄村所属红专人民公社的社员，杨清标攒钱买的龙眼树被迫充公，只能依靠工分换取工资，收入微薄。好在公共食堂吃饭不限量、不要钱，鼓鼓的肚皮尚能慰藉他空空的口袋。但好景不长，从1月开始的大旱毫无好转的迹象，庄稼收成寥寥。7 月各村开展亩产万斤稻的高产竞赛，社庄村大放卫星、移苗并丘，为数不多的稻谷几乎都烂在地里。看着脚下一天比一天旱的土地；喝着食堂一天比一天稀的米汤；听着干部一天比一天高的指标，杨清标决定：离开农村，去城里寻找机会。正逢泉州糖厂扩建招工，他主动向村里争取仅有的四个名额，通过重重筛选，顺利入厂打工。^[13] 虽然身体上离开了农村，但在身份上，他仍然是农村户口，城乡差距依旧天堑难越。

1972 年，港英当局正式放宽国内华侨子女赴港或经港赴国外定居。其间，菲律宾政府移民局允许中国国内侨眷子女去菲就业，南安有不少人凭借菲律宾移民局的入境许可证向公安部门申请往菲律宾就业，在过境香港时中途滞港，港方当局不得已给予办理“绿印”居留证。^[14] 同年，已故父亲在菲律宾的好友给两兄弟来信，称自己能帮忙办理“菲证”，他们可以凭此进入香港。^[15] 香港，这个生活水平比大陆高几倍，“做乞丐都比在大陆好得多”的地方，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就是许多大陆人偷渡的目的地，逃亡的群众涉及广东、湖南、福建、黑龙江等 12 个省份，62 个市（县），实际人数超过了百万。^[16] 与偷渡规模成正比的，是反偷渡政策的严格程度。凡是无手续而踏入禁区的，便可视为偷渡，制止不驯或有武力反抗行为者，可以鸣枪警告乃至射击。而相比风险极大的偷渡，通过“菲证”合法进入香港对兄弟俩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杨清标在厦门纺织厂的工作稳定，加上患有严重胃病，不愿放弃城里安稳的生活前往香港。杨清芬本就苦于无法离开农村，决定前往这座陌生城市，从零开始打拼。^[17]



70 年代在枪弹威胁下，人们依旧冒险强渡深圳河逃往香港。

[12] 《南安县志》卷 15《农业》，第 375 页。

[13] 2023 年 12 月 9 日口述采访，受访人杨衍宗。

[14] 《南安县志》卷 12《华侨》，第 322 页。

[15] 2023 年 12 月 11 日口述采访，受访人杨衍宗。

[16] 陈秉安：《大逃港》，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 年，第 22 页。

[17] 2023 年 12 月 13 日口述采访，受访人郭碧真。

[18] 袁畅：《富强战略》，北京：红旗出版社，1996 年，第 353 页。

[19] 《南安县志》卷 14《经济综述》，第 353 页。

[20] 《厦门市志》卷 37《经济管理》，第 2787 页。

[21] 2023 年 12 月 12 日口述采访，受访人郭碧真。

[22] 杨阳：《中国城乡收入差距所有制基础研究》，合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22 年，第 41 页。

八十年代，西方发达国家面临停滞性通货膨胀，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对香港的出口构成了很大的压力。与之相对，大陆改革开放逐步深化，经济高速增长，推动了香港以转口贸易为龙头的服务业发展，加速了传统制造业的衰落。1980 年香港制造业占香港生产总值 24%，到 1985 年、1990 年已经渐次降为 22% 和 17%。同期服务业则从 63% 上升到 64% 和 69%。^[18] 这次经济转型使香港制造业北移，以服务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失去基础，造成明显的经济结构失衡。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高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相伴而生，房地产和股市虚假兴旺，香港最终走向泡沫经济。高昂的生活成本、不涨的工资、失业的妻子，生活的重担让杨清芬不得不承认，自己曾梦寐以求的香港户口，正在失去它的魅力。

1988 年，在贯彻执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后，南安县的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年收入 64483 万元，比 1978 年增长 17.4 倍，平均每年递增 33.8，形成包括官桥在内的九个农村专业集镇。^[19] 许多已在城市定居，有一定积蓄的南安人纷纷回乡投资办厂。进入 90 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生产资料流通领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计划分配物资的品种和数量大幅度减少，1993 年起全部取消。^[20] 杨清标所在的采购部自 1990 年开始裁员，到 1992 年只剩他和两个员工。面对随时失业的风险，杨清标不得不早做打算。此时，家乡的陶瓷行业正快速发展，南安首个民办陶瓷科技研究机构——南安市陶瓷原料中心创办。该中心专业研究陶瓷熔块、粉料、釉料等生产原料，分析产品化学成分，监测生产标准化程度。杨清标的心思活络起来：要不，回老家办厂试试？同样心动的，还有弟弟杨清芬。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合资回官桥办陶瓷厂。^[21]

2019 年、2020 年，杨清标、杨清芬兄弟俩先后病逝，家人遵照其遗愿，分别将之安葬于厦门、香港。与传统的落叶归根不同，他们选择了自己奋斗大半辈子才进入的城市，作为人生最后的归宿。土地改革没收了祖辈的土地；人民公社化充公了自己的土地；三年自然灾害干旱了集体的土地。随着一次次运动对农村的摧残，两兄弟对土地的依赖逐步递减，离开农村的渴望与日俱增。第二个五年计划打开了进城的缺口；“菲证”移民开通了滞港的渠道；改革开放坚定了居城的决心。伴着一项项政策向城市的倾斜，两兄弟受农村的束缚逐渐放松，进入城市的梦想成为现实。与其指责他们是农村的背叛者，不如说他们是更好生活的追求者。他们在有利可图时回乡办厂，又在利润微薄时离乡返城。大抵他们对家乡的些许眷恋，也已被生活的柴米油盐 and 城乡收入的巨大差距磨灭了。

杨清标离开农村的 1958 年，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间的比值为 3.22: 1。杨清标离世的 2020 年，这一比值仍高达 2.56: 1。^[22] 从熙熙攘攘进城的农民工潮中，依稀可窥见兄弟二人当年打拼的景象。他们的进城路，不过是在城乡差异这一历史背景下，诸多企图离开农村、改变命运的农村人的缩影罢了。

——杨芷芸《离村者：一对农村兄弟的进城路》

结语

人与故乡间那种并不稳定的关系，一定程度上也是人与自我、与社会之间不断对抗、适应与妥协的剪影。当我们谈到那些离开村庄寻出路的人、心怀理想闯荡四方的人、落寞留守而被边缘的人，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审视其所处时代的潮流与局限，去思考为什么那些个体会做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他们命运的悲欢离合又是如何在历史中演绎的；作为我们的先辈，他们的经历又如何影响着当下的我们。家族的兴衰与个人追求，政策的影响与迫不得已的告别，成为一代人的独特记忆，并让我们有机会去窥探那个时代的冰山一角，并反思我们当下的生活。

Part 02

去国离乡

我们终其一生也许都在与故乡渐行渐远。“离别后，故乡是一棵没有年轮的树，永不老去”，当我们成为游子，回望故乡时也许才能意识到故乡的意义。透过离乡之人的视角，或许是异国他乡的学子，或许是离乡打工的游人，拼凑出对故乡情感的缱绻。当故乡变成心底深处的记忆，才发现回不去的地方是微毫里的伟大，是夜夜流光的皎月，是埋于心间的眷恋，是我们的故乡。

再探乡愁：黔贵村寨中的乡土之思

——专访 2022 级本科生杜俊林

学生采编 / 唐可馨

责任编辑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杜俊林，2022 级本科生，来自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侗族人。
张芯仪 / 摄

题记

在华夏神州的东南，群山之中，生活着这样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供奉着不同的祖先，信仰着不同的神明，却最终都选择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黔中定居，造就了多民族聚居的奇特景象。他们对色彩有着独特的理解，对音乐有着极高的天赋，对自然保持着最淳朴的敬仰。他们凭借着强大的生命力，在这片土地上生生不息，留下一个又一个传说。

然而，当时代的车辙碾过岁月，高耸的钢筋大楼攻陷了古建筑最后一道防线，机器生产代替了最原始的手工艺，电脑合成音乐取代了古老的民族乐器。景象变化的背后，是古老文化的沉没与民族记忆的流失。

离乡的浪潮裹挟着大自然的子民走出山林村寨，去往更远的远方、更大的世界。关于故乡的记忆在游子的脑海里无数次解体又重构，从鲜活变得零碎。在无人知晓的夜晚，霓虹灯下，风轻轻地路过，带走了谁的思绪，又留下了谁的泪珠？何为乡愁，是那片爱得深沉的土地？是那句无法轻易说出的“再见”？还是每一刻与我有关的瞬间？或许，答案只有风知道。



清晨的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雀鸟村，2023 年夏。戴金涛 / 摄

乡土歌谣里的童年记忆

夜晚，在暖橘色的灯光下，一场对话拉开序幕。与想象中的不同，来自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杜俊林同学，刚一见面，就给人一种如深林湖面的内敛沉静。在他缓缓的音调里，一幅描绘着千山万水，包罗各种民族文化图腾的画卷娟娟展开。在他的叙述中，他的家乡（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总是鲜活的。和中国大部分乡村一样，散落在山林间的贵州村寨也有赶集的传统：在约定俗成的日子里，周围村寨的人们聚集在一起进行物品买卖。

特别的是，在这里的集市上，许多上了年纪的老人，无论男女，总喜欢对街而站，即兴对歌，没有固定的音调和歌词，对歌的两人随性而唱，以歌交流，真实而朴素。一曲结束，往往没有人记得清是谁起的调，搭的话。只有那或雄厚或温柔的歌喉，或通俗或高雅的歌词，在一句句对歌中，交叉联结，织成一张网，轻柔地兜住那份随心所欲的洒脱和自由。除了他，同样镌刻这段朴素美好记忆的，还有一张张反射着五彩光芒的光碟。在这里的集市上，人与人之间仿佛存在一种无需言语的默契：每当对唱开始时，总有人从家里拿出录音机，悄悄地录下歌声刻成光盘。在某个闲暇的午后或热闹的聚会上，光盘缓缓转动，激昂婉转的歌声潺潺流淌，萦绕在耳畔。一张张银白色的光碟载着千变万化的歌声构成了他的童

年记忆。在他的印象里，故乡时而古朴静穆，时而热情欢闹，如七孔古桥下鸳鸯湖面的倒影，林中寒气拂过，在水和光的奇妙反应中千变万化。

谈起贵州，浮现在大多数人眼前的往往是茅台，千户苗寨，黄果树瀑布等标志性代表，而其他贵州文化似乎鲜为人知。相似地，当介绍起贵州的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时，大众下意识地将目光聚焦于苗、侗两族，但其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还生活着仡佬族、布依族、畲族、土家族、瑶族、水族、壮族等少数民族。与大家想象中各民族文化泾渭分明的特点不同，黔东南这块土地上少数民族的相互融合程度极高。不同民族之间没有刻意地强调在习俗传统、身份认同上的区别，反而融为一体，相互通婚、习俗交融、共同生活。

杜俊林回忆道，“我们并没有在文化上、习俗上分得很清楚。比如我们一年会过三个‘年’，苗年、侗年和春节。地方的法律都规定为法定假日，无论哪个民族，在苗年和侗年，所有贵州人都可以享受假期。”同样的，在长期的民族融合过程中，民族之间的音乐、饮食、习俗等方面的交流也很频繁。例如凯里酸汤鱼，就是属于苗、侗两族的一道传统菜肴。而这种多民族文化也对他的成长尤其是三观的形成奠定丰富的文化基调。他谈道，多元性是民族身份所带来的开拓视野的珍贵礼物。自己接受的教育是大环境下的中国教育，主要体现在统一的普通话教育、教材、



苗族新生儿百日宴和村里的侗族芦笙演奏队伍，2023 年夏。戴金涛 / 摄



苗寨姑娘招待百日宴宾客，2023 年夏。戴金涛 / 摄

爱国教育，这部分文化和汉族文化紧密相连；同时，作为生活在贵州的侗族人，他也受到苗族等民族文化的熏陶，包括音乐、建筑、服饰等；另外他个人对于欧美音乐和日本动漫以及日语十分感兴趣。

变化中的家乡和无处安放的乡愁

但是，他的这份对家乡的记忆，似乎随着贵州旅游业的爆发式发展逐渐变得模糊。在贵州省政府公布的 2023 年贵州旅游业报告中提到，仅 2023 年，贵州全省接待游客达 12.84 亿人次，全年旅游总收入约为 1.46 万亿元。在独特的多民族文化和绮丽的自然景观以及全面的旅游服务系统的多重加持下，贵州的旅游业蒸蒸日上。然而，旅游业的常态化、普及化也在无形之中使得贵州“不似记忆中的模样”。平地拔起的高楼大厦挤压着传统民族文化的生存空间；大规模的入城浪潮造成了原始村寨的衰落；公式化的旅游景点改造使得贵州失去了最独特的一抹韵味。市集、对歌……这些独特的民族符号和故乡记忆在城市化、现代化的尘土中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不可否认

的是，在初步构建旅游话语权时，这种“标签化”往往是快速建立地方形象、吸引客源的最优方案。但同时，“打上标签”意味着仅有少部分地方特色或者民族文化能得到集中展示，而其他特色与文化则不得不做出让步，暂时性地藏起光芒。这样的标签化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削弱了一个地方，一个文化所能展现出来的多元性。作为贵州发展的见证者和受惠者，杜俊林对此深有感触。一方面，他感叹贵州发展的日新月异，旅游业的发展极大程度上带动当地经济发展，提高当地民众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惋惜贵州现在的旅游业更多的是停留在初步阶段，对于地方文化内核的挖掘还不够深刻。他说道：“我感觉，贵州现在的旅游业更像是在给中产阶级提供旅游消费产品，而与贵州这片乡土完全融在一起的文化内核却没能全面地挖掘和完全地体现出来。”

在谈及这个话题时，笔者不由得想到自己的故乡，远在千里之外的古都西安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与挑战。二十年光景，西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纵横交错的幽径小巷摇身一变成了宽敞平坦的柏油马路；朴素的夜市一条街被人为打造成旅游景点，人来人往，日夜不息，每逢节假日，人潮更甚；各种名胜古迹不断被修缮和整改，走



雨后的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雀鸟村，2023 年夏。戴金涛 / 摄

向商业化道路。而真正的古物在琳琅满目的“类古物”纪念商品中黯然失色。高速扩张的旅游商业版图没有做到“把与乡土完全融在一起的文化内核全面地挖掘和完全地体现出来”，还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伤害了人们对于家乡的情感和记忆。当思乡心切的游子重返故地时，却发现一切早已物是人非，难以将眼前的景象与记忆中的模样勾连，那份名为“乡愁”的情感又该如何宣泄？

思乡的时候，我们究竟在想什么？

作为人类永恒且神秘的情感，乡愁一直都是人类向内探索的主题。诗人余光中把乡愁具象化为邮票、船票、矮矮的坟墓和一湾浅浅的海峡。散文家汪曾祺则将乡愁藏在对故乡食物的描写叙述中。在采访的前半段，对话的内容似乎一直聚焦在童年经历、贵州旅游业、少数民族文化这些

具体的事物上。对于乡愁这一抽象的情感，杜俊林并没有直接地表达他的想法，而是首先谈起了他对于不同地方生活节奏的看法。

伴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外来务工人员涌入深圳，深圳虽然人口密度越来越大，但是人与人之间的疏离感越来越强。每个人都在被社会推着走，像是被上了发条的木偶，每个人都遵循着社会赋予的指令，为了生计奔波而忘却了和身边的人建立联系。这种社交距离上的巨大落差使得他喘不过气来，也往往会成为他想起故乡的触发点。他说：“我们学校的很多同学来自各个地方的省会或者是一、二线大城市，相对于我的故乡凯里，大城市的生活节奏是很快的。在凯里生活时，整个人很松弛，而来到深圳后，猛然加速的生活节奏和陡然拉开的社交距离让我很难找到在凯里的那份安心和舒适感。这会让我产生一种怀念在凯里生活的情感。我想这大概就是所谓的乡愁。”



贵州省苗族侗族自治州凯里市，2023 年夏。戴金涛 / 摄



所以，令你魂牵梦绕的到底是什么？“当我们说思乡，我们是在说思乡的‘思’还是思乡的‘乡’，是在谈地域归属感还是民族身份的认同？”随着采访的深入，这个问题的答案变得愈发模糊。在他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超越单一地域认同的民族情怀。但是这份托举起民族情怀的地域认同又贯穿于每一次对话。那么，兼具地方身份和民族身份的他，究竟把这份乡愁归结于何处？

他缓缓地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我不觉得我会因为自己是贵州人，就会对贵州有具体的乡愁。同理，我也不觉得我是侗族人，就会对侗族有具体的乡愁。”在他的认知里，乡愁是个人的。乡愁最终要落脚在一个具体的物件、一段具体的记忆、一段具体的和“我”的关系。他说道：“我不希望用一个地域或者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身份去定义我，或者说明确我的乡愁的来源。我在各种各样的民族文化熏陶下成长，它们对于我而言都不是完整的。但是也正是每一个不完整的它们塑造了一个完整的我，塑造了一套我对于世界的看法，对于我自己家乡的文化的见解。同样的，我的乡愁也是地域、民族以及第三种未知的因素共同影响作用在我身上产生的一种情感或者思绪。”故乡的意义对于他而言，更像是基于我们过去经

历的一种归属感与安全感。这份感觉超越地域、超越文化，但却又在两者的基础上得到升华。从民族到文化，从乡土到城市，即使地域上的故乡与我们渐行渐远，但记忆却会在时间筛选下把最有意义的那一部分留下，并成为我们立身于世的信念源泉。

后记

采访告一段落，在整理文稿的过程中，笔者一直在反复思考几个问题：“如果一个地方承载着我所所有的童年记忆，它就能称为故乡吗？”

“如果故乡如今的模样与过去大相径庭，让我再无法从它身上找到精神寄托，我又该如何对待它，我的童年记忆、我的思乡愁绪又该归于何处？”

太多的问题，太多的答案，太多的可能性。在每一个字落下的时候，总有一股力量轻轻地敲打笔者的心。那是沉默而沉重的一击。

“有答案吗？”笔者自问。或许，时间会告诉我答案。也有一种可能，没有答案。

半径扩大的同心圆： From Hometown to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学生采编 / 蒲严博
责任编辑 / 刘璐嘉
编审 / 陈俊豆

受访者（排名不分先后）：



Alae-eddine Nasr（摩洛哥）
2019 级
祥波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Maire Hellem（挪威）
2022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Natalia Ramos（墨西哥）
2023 级
逸夫书院
人文学院（交换生）



赵雪茹（中国）
2020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曾于法国、德国、丹麦参与海外交流学习项目）

编者前言

受农耕文明缔造的精神底色之影响，传统中国的文化语境对于地缘意义上的故土有种独特的执着。“背井离乡”“反认他乡作故乡”这些耳熟能详的语言叙事在字句之间无形地树起了“故土”与“异乡”之间的厚障壁。但是，随着各国之间跨越地缘的交流日益密切，受全球化趋势影响的我们，正在尝试着用自己的体验和理解，逐渐重构和诠释一种新的秩序。在此篇访谈中，我们邀请到了四位背景迥然不同的同学，共同探讨“在不同背景青年的视阈中，传统意义上的“故乡”与“异乡”会焕发出怎样富有时代性和现象级的光彩。

Chapter 1. Past/Motivation 过去 / 动机

1. 最初想要离家千里到异国他乡求学的动机是什么呢？
What was the initial motivation for traveling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your hometown to study in a foreign land?

赵雪茹（中国）：第一个原因是想环游世界。我一直很喜欢旅行，喜欢去陌生的城市、探索未知的东西、了解不同的文化。之前只要有人问我的梦想是什么，我都会说我要环游世界。所以出国交换对我来说就像开辟隐藏地图，充满了新鲜感。

第二是由于在学业上的迷茫和焦虑。我的大学生活基本是一年一个阶段，大一刚从高中压抑的学习状态中脱离出来，尽情地享受了我想象中的大学生活。但大二时我就被扑面而来的压力逼得喘不过气——因大一玩得太开心而不太理想的 GPA、实习的劳累、发展方向的迷失、各种考试 DDL、疫情封控等等。我甚至在那时候出现了焦虑症症状而被医生建议一定要调整好心态——所以我很早就计划大三一整年的交换，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盼头。我不想再随着大流的标准被内卷着稀里糊涂过完宝贵的大学生活，想出去寻找一下自己的方向。

Alae-eddine (Morocco): The initial motivation for venturing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my Moroccan hometown to study in China stemmed from a desire for growth, exploration, and the pursuit of knowledge beyond familiar borders. While it's true that the allure of China's thriving tech industry, particularly in the field of computer science, played a significant role in my decision, I know deep inside that the real reason goes deeper than mere academic opportunities. I was also a huge fan of learning languages and the culture behind them.

Growing up in Morocco, a country renowned for its deep ancient culture and vibrant tapestry of influences from various civilizations, I was fortunate to experience the richness of diversity from an early age. As a trilingual individual navigating the streets of Morocco, I was exposed to a myriad of languages, traditions, and customs that reflected the interconnectedness of cultures throughout history. This melting pot of influences not only shaped the mosaic of Moroccan identity but also instilled in me a profound appreciation for the complexities of cultural exchange and communication. From the bustling souks where merchants haggle in a blend of Arabic, Berber, and French to the echoes of Andalusian melodies reverberating through the winding alleys of ancient medinas, Morocco serves as a living testament to the power of cross-cultural dialogue in shaping the fabric of society.

Natalia (Mexico): My initial motivation was to get myself immersed in China; and get to know the country better, its people, its cultures, its stories, and its history.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Mexico has been growing and since I'm major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 want to experience myself if everything that the world is saying about China is on the mark.

Marie (Norway): It was all about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a new culture and region that I was curious about. Studying abroad teaches you about entirely different lifestyles and opens you up to new perspectives on the world and the way that people think. I was also interested in meeting new people and exploring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I had never seen before.



在结束 ESSEC 商学院交换项目之际，赵雪茹（左二）在校内与朋友们聚餐话别



Alae-eddine 在摩洛哥的街头集市



摩洛哥的杰玛艾夫纳广场（Jemaa el-Fnaa Square），该广场展现了摩洛哥大众文化传统的精髓

2. 能否分享自己与故乡之间的故事，这个故事又如何塑造了你对于故乡的印象？

Can you share a story about you and your hometown and how it shaped your impression of your hometown?

赵雪茹（中国）：我的故乡浙江长兴散发着一一种独特的轻松氛围。与深圳的匆匆忙忙相比，我返乡后能体会到一种慢节奏的生活：一家人到风景区转悠，在家乡商场里与售货员拉家常，在绿道上悠闲地喂喂流浪猫……这一切在我的心中构成了故乡的画面，是我想守护的一方恬淡美好。

Alae-eddine (Morocco): One unforgettable memory that shaped my impression of my hometown was the bustling Jemaa el-Fnaa square, a vibrant melting pot where storytellers, musicians, and merchants converge, creating an atmosphere teeming with energy and tradition. In this lively marketplace, I witnessed a kaleidoscope of languages and faces from around the globe, highlighting the square's welcoming embrace of diversity. I remember hearing an old shopkeeper talking with East Asians and Europeans alike. I was mind-blown. They were effortlessly bridging linguistic barriers and fostering connections among visitor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赵雪茹故乡的新春对联



Maire 六岁时和朋友们在挪威的森林里玩耍



墨西哥城鸟瞰图

Natalia (Mexico): I grew up in Mexico City, the capital of Mexico, which to some extent gave me a more diverse perspective of how cross-cultural interactions work, in the sense that I could get to know people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Mexico, as well as peopl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rgo, I've learned about Mexican cultures and traditions while living and coexisting in the capital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places. In that same sense, in Mexico City people speak different languages and have various backgrounds, which made me realize how different and diverse not only the world could be, but also one country per se.

Marie (Norway): When I think of my hometown, I immediately think of nature and serenity. As a child, I would spend most of my time playing outside, regardless of the weather. We have a saying in Norwegian that translates to “There is no bad weather, only bad clothes”, which I think is a good representation of how much we love the outdoors. On the weekends, for example, we would always go on walks and have picnics in the forest with our friends and family. During the Easter holidays, we would be out skiing every day, followed by running around the cabin searching for Easter eggs. My entire childhood has raised me with the impression of my hometown being a safe, comforting, and peaceful place to live.

Chapter 2. Present/Experience feeling 现在 / 体悟

1. 初到异国时，会因为当地与故乡存在差异而感到不适应吗？又是怎样去克服的呢？

When you first arrived in the foreign country you studied in, did you have any difficulties when encountering cultural differences? And how did you overcome it?

赵雪茹（中国）：我刚到法国时，正值疫情，因为出了国就没戴过口罩，我马上就阳了。不太好的健康状况也放大了异国生活的不适应带来的麻烦。在国外的生活远没有国内便捷——我想办电话卡，运营商告诉我电话卡需要绑定一张法国银行卡，于是我就去法国办银行卡，银行卡又有复杂的文件和程序……我已经数不清跑了多少次办公室，写了多少封邮件了。超市里，很难为我的中式菜谱找到食材；在药店，我也发现很难向药师描述“上火”这件事。虽然这些差异有时候会让我觉得很苦恼，但它们也让我发现了很多我曾经以为普适的概念，其实是独属于我的故乡的。

学会“逐渐理解差异”是我能适应这种矛盾的良药。比如在丹麦的时候，我很疑惑为什么哥本哈根会有很多卖卡牌游戏和玩具的连锁店，以及为什么工作日的公园有很多晒太阳的人。在对丹麦了解不断深入后，我就明白他们的幸福感来源于一种不必艳羡他人的平等的生活状态，于是在丹麦我也爱上了晒太阳。

Alae-eddine (Morocco): Upon arriving in China, the differences were so massive. I wouldn't say I was uncomfortable, but I was almost dissociated from the world. There was a stark contrast between the vibrant chaos of places like Marrakech where every stranger is talking to you and the organized bustle of Chinese cities where everyone is minding their own business. However, I was excited! I took it as a challenge to immerse myself in the local culture, I sampled new cuisines to find what I like and forged friendships with fellow students. That is the beauty of cultural diversity.

Natalia (Mexico): I must admit that my first day in China was tough, mainly because I don't speak Mandarin, so the communication barriers were more substantial than expected.

Actually, to some extent, I felt frustrated because I couldn’t communicate with others and not be able to even use a translator. Without a Chinese phone number and mobile data, I couldn’t do anything, neither could I pay (no WeChat Pay or Alipay), nor use public transport or order a Didi. That was the hardest part I would say, but I was able to overcome the situation afterwards. After getting my Chinese SIM Card, I learned how to pay and do everything online and with my phone. However, I must emphasize that Chinese people were always very helpful, kind, and cooperative which made the overcoming part more harmonious.

Marie (Norway): There were definitely a lot of differences and culture shocks I hadn’t foreseen, such as the extensive use of technology in everyday life and the city’s high population density. In my hometown, we do not have an app like WeChat that compresses multiple functions and services into one, and our streets are rarely crowded with people. I received a lot of help from my roommates and Chinese friends to show me how everything worked, especially when most applications and information were only provided in Mandarin. So, the language barrier was also another big challenge for me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This encouraged me to spend more time improving my Mandarin proficiency in order to be able to handle more situations on my own.

2. 在异国他乡的时候最想念故乡的什么事物？

What do you miss the most about your hometown when you are in a foreign country?

赵雪茹（中国）：最想念故乡的美食和文化。在国外时，如果大家想一起吃顿火锅了，从国内背来火锅底料的朋友此时就仿佛散发着圣光。在柏林洪堡上寒课期间，我第一次在异国度过春节——那天的年夜饭有大陆、香港、韩国的同学。故乡的范围可大可小，从具体的家，到亚洲，或是更大，都可以让不同的人找到共同的归属感。文化把在异乡的同乡人联结在一起，这是一种很强大的力量，也让我感到很温暖。

Alae-eddine (Morocco): Food! I miss all the friends and family obviously... but then there is the food... specifically, the smell of the food! I miss the aroma of Moroccan spices wafting through the air, The smell of the traditional mint tea that cannot be replicated...

The nostalgia reminds me of the warmth of family gatherings. Being away from home has 100% deepened my appreciation for the diversity in Moroccan cuisine and strengthened my bond with my roots.

Natalia (Mexico): My mum, of course, and probably the social interaction; we are used to saying “Hi” and “Good morning/afternoon/evening/night” to people in the halls, in the school, or on the streets even if we don't know each other. That’s because we believe that we are all human beings and since we coexist in the very same place it’s nice to recognize the existence of the other person and just smile, be kind, or wish them to have a good day. So I miss that about my hometown because here people don’t usually say “hi” if they don’t know each other, though I’m getting used to it already.



棕榈树、沙漠以及中东式明灯，描摹出摩洛哥风情画卷



仿佛打翻上帝的调色盘一般
绚丽的墨西哥城

Marie (Norway): I honestly miss my house the most. I miss the comfort of being at home and having everything that I grew up with around me. My house is almost like my safety net. The place that I can go to and feel most protected, knowing that my family and loved ones are nearby.

3. 对于故乡有没有由于距离和国界产生新的认识和理解？

Did you develop a new understanding of your home country due to distance and borders?

赵雪茹（中国）：故乡就像一个以我的家庭为圆心向外扩展、半径不断增大的同心圆，我与别人的相似性受彼此故乡范围的重合度影响。当我在不同地方生活、了解更多文化时，我的故乡半径也在不断扩大，我对所见所闻也有了更多包容和理解。当组成我们认知结构的“故乡”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它便能兼容不同交流对象和地区的文化共识。

Alae-eddine (Morocco): Through distance and borders, I've gain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my home country, recognizing its complexities and nuances beyond the surface. I would never have been able to write the past paragraphs about Morocco if I hadn't gone abroad and viewed it through an external lens, more critical of the things it is missing but still cherishing its unique identity.

Natalia (Mexico): Definitely, every time I get out of the country I learn something different about it. Sometimes we don’t realize that we do or we like certain things about our hometowns until we go to other places and see that not everywhere works the same way.

4. 随着时间的推移，你对异国的感受和你的心态是怎样发生变化的？你自己的身份认同是否也在这一段经历中也发生着改变呢？

How have your feelings and mindset towards the foreign country changed over time? Did your sense of identity also undergo any changes during the experience?

雪赵茹（中国）：我以前会浅显地认为说好一门语言并在这个国家找到好的工作，我就可以舒适地在那里生活下去。但在国外待的时间越长，我就越能发觉一种源于文化归属的孤独。就像前面问题里我举的故乡半径的例子，我在哪里生活得越久，我就在哪里拥有更深的文化理解，但故乡半径的扩大并不代表文化归属范围的扩大。无论到哪里，我都还是中国人，这个身份认同是无法改变的。

Alae-eddine (Morocco): As time has passed, my mindset has evolved a lot here. Especially in an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like CUHKSZ where I have met people from countries I didn't even know existed. These experiences really make you understand how big the world is. It keeps your ego in check and helps you transcend the narrow notions exclusive to your hometown.

This whole chapter in a foreign land has challenged and reshaped my self-identity, fostering a sense of adaptability and resilience when facing the unknown.

Natalia (Mexico): It’s complex, because it's evident that my mindset has changed over my stay here, but at the same time I don’t feel I’m a different person. It’s as if I have known new versions of myself during my experience in China, that I’ve learned so many things about life, I’ve met so many extraordinary people, and of course, I’ve really identified myself with certain things here, but I wouldn’t say that my identity has changed at all, probably it just got reinforced.

Marie (Norway): I feel like I have become braver and more independent from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China. Moving to a foreign country means leaving your family and everything you are familiar with behind. I had to learn to adapt to the lifestyle here and find ways to support myself when times were hard. Through these experiences, I feel that I have become stronger mentally, and also more resilient to change.

Chapter 3. Future/ Identity 未来 / 身份归属

1. 你对“故乡”和“他乡”这两个名词在到国外求学的这一段经历中是否有产生新的理解呢？两者的概念是否会在某些时候发生交叉互换呢？
Have you develope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terms "hometown" and "foreign land" during your experience of studying abroad? Did the concepts of the two cross over at some point?

赵雪茹（中国）：我对故乡的理解在不断更新，小时候会说故乡是浙江长兴，到了国外我的故乡就是中国，在欧洲遇到韩国、日本或者越南同学，我们也说是从一个故乡——“亚洲”来的。回国以后，和朋友怀念在丹麦交换的生活时，我们也说那是我们的精神老家，因为我们在一个特别的地方拥有了一段共同的回忆。所以故乡在不同的语境下，成为我和其他人的最大公约数。他乡与故乡则相对，过去可能是除我出生地以外的所有地方，但现在我更愿意把他乡当作我未曾到达和了解的地方，因此他乡与故乡在不同环境下讨论可能就会有重叠了。

Alae-eddine (Morocco): Yes! Studying abroad has totally blurred the line between

"hometown" and "foreign land", leading me to realize that home is not solely defined by geographical location but by the connections we forge and the memories we create. The concepts of home and abroad intersect in unexpected ways.

Natalia (Mexico): To some extent, I think I have, I realized that hometown does not always mean “good”, or “safe”, and that foreign land does not always mean “bad”, “against” or “opposite”. I always knew it was more complex than that, but it is not until you immerse yourself in the foreign country that you acquire that it’s indeed more complex than we could even imagine or that we could even understand. Likewise, I do believe both concepts cross over at some point and it’s when you get to know the similarities between your hometown and the foreign country and where they both convey.

Marie (Norway): Living in a foreign country for an extended period of time, has slightly influenced my perception of where “home” is. I naturally feel a stronger connection and belonging to my hometown; however, I have also built an entirely new life here in Shenzhen. Things have gone from new and unfamiliar, to normal and routine. So although I always look forward to traveling back home to Norway during the holidays, I know that once I graduate, I will miss the home that I had here as well.

6. 是否有在异域文化中加深对于原生文化的更复杂感情和理解？你认为在全球化的大框架下，世界公民这个新的身份是怎样调整故国与他国之间的界限的？个人应该如何让异乡与故乡在认知中共处呢？
Do you develop more complex feelings and understandings about your own culture when you are immersed in an exotic culture? How does the concept of being a global citizen help you adjust the boundaries between home and abroad in the



从 Maire 在挪威的家中望出的风景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How should individuals reconcile the concepts of foreign land and homeland in their perception?

赵雪茹（中国）： 我和一个丹麦好朋友有次就聊到了这个话题。她叫 Lilian，她的父母是从越南移民到丹麦的，她从小在丹麦长大。我参加了她的生日游船 party，但我发现她的朋友大部分是越南裔或者亚裔的。我当时问她：“如果这不冒犯的话，我想知道为什么你从小在丹麦长大，但是相比当地白人更喜欢和越南裔朋友相处，是因为丹麦白人的圈子难以融入吗？”

她的回答让我开始思考异域文化和原生文化的关系。因为她在丹麦成长，完全能融入丹麦的文化，但是相比抛弃自己的身份认同变得和传统丹麦白人无异，她更为从家庭中延续而来的越南文化背景而自豪和自洽。在丹麦，她能通过原生文化吸引到喜好相似的人，她和同样有越南背景或者亚洲背景的朋友相处有一种文化的归属感，可以说只有这个文化背景才能聊得起来的话题、开得了的玩笑，可以在饮食偏好上轻松地达成共识。这样一想，其实我能和她关系这么好，也是因为，虽然我们生活环境和成长模式差异巨大，但我们在更深的基因和文化中共享一种天然的认同。

因此我认为，原生文化是根植在种族、血缘和基因上的深层因素，即使代际生活环境有巨大的转移，原生文化的影响也是持续存在的。原生文化是我们拥有文化归属感的前提，而异域文化则是我们融入和理解他人生活方式的关键。与 Lilian 很好地平衡原生文化与异域文化相反的一个现象是，我在国外也不乏遇到母语羞耻和主动抛弃原生文化的国人，他 / 她们以完全融入异域文化为目标，实则抛弃了与拥有相同原生文化人们的天然联结，不仅会产生别扭的身份认知，也会体现一种隐隐的自卑，这和电影《绿皮书》在讨论身份认同的问题类似，“If I’m not black enough, and if I’m not white enough, then what am I?” 我们探讨文化融合的理想状态首先就应排除种族歧视，因为原生文化与族裔和血缘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其与异域文化的界限在于我们对异域文化的接纳是根植于原生文化的，首先是自己的身份认同，再是认同他人的身份。

Alae-eddine (Morocco): Immersion in an exotic culture has deepened my understanding of my heritage. This was mostly felt through all the conversations and reflections I had prompted by other people questioning me and my habits. When someone says, “Wow you guys do that in Morocco?” I also go, “Oh wow yes that is definitely unique, I never noticed until now!”

Currently, as a global citizen, I navigate the intersections of different cultures with ease, embracing the richness of diversity while honoring my roots. The emergence of this identity challenges traditional notions of belonging, urging individuals to reconcile their attachments to both their home country and the world at large. It is a very beautiful phenomenon. There are obvious risks but with openness, empathy, and a willingness to embrace complexity. I believe this will blossom into a beautiful future for Humanity.

Natalia (Mexico): Yeah, I believe that my feelings and my understanding of my culture got deepened with my living experience in China. Above all, I noticed the importance of all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that have led us to this actual moment. And that’s why I don’t share the idea that there is something



赵雪茹与 Lilian 在丹麦的草坪上享受阳光

such as “global citizens”, because even though globalization has indeed broken boundaries, what makes a place or a “country” different from others is the history, its people, its stories... and that is where my point relies on, on the importance of memory. In fact, we could make the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home country coexist by not forgetting where both really come from.

Marie (Norway): I think I have gaine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my own culture and what its key characteristics are, because when you live abroad, it is very easy to compare the culture you are living in now, to what you are used to back home. This comparison makes you more aware of the differences and also the reasons behind them, which I find to be very interesting.

I think by being a “global citizen”, people are less likely to feel like their hometown is the only place that they belong. They are more open in their perspectives on what our individual roles should be for the world as a whole, rather than just focusing on what they can do for their community at home.

When one chooses to travel to a foreign country, there is usually a reason or purpose behind it. For me, that was to study abroad. So, for this period and purpose in my life, the foreign country that I have traveled to has become my new home. However, once this period of my life is over, i.e. I graduate from university; I will have my home in my home country to travel back to. By looking at it from this perspective, I think that the foreign country and the home country can coexist in recognition.

历史切片中的乡土记忆

—— 对话人文社科学院彭永昌教授

学生采编 / 赵榕熙
责任编辑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彭永昌教授，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通识教育部助理教授（教学）。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社会史、城市史、香港史、传统中国慈善问题。

前言

从古至今，“乡土”一直是我们最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它不仅仅代表着一方草木与一方水土，还是家族与信仰的根脉。世代生活于此的祖辈为这里书写了无数平凡而感人的故事，并在时间的发酵中成为文化与记忆的香醇酒酿。在古代战伐纷乱的时候，农民总是最后一个割舍土地，带着眷恋与忧郁离开家园。灾难与变革击碎了“乡土”的稳定，旧有的秩序面临重组，人或坚定地出走故土，谋求未来；或不可避免地在时代浪潮中流向“异乡”，浪迹远方。当我们踏出站台的那一刻，我们的记忆与展望又会引领我们走向何处，当我们渐已习惯“异乡”的生活，又该以怎样的心境面对那个曾经养育了我们的“故乡”？

家族史：时代浪潮下的个体抉择

从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是中国近百年来最为波澜壮阔的历史，GEA2000：中国近现代历史与文化课程带领我们从宏观视角领略近代中国百年间的风云变幻。透过文字与课堂讲解，我们得以窥探那个时代的一角。彭老师提到该课程最初是由李潇雨教授等老师在大学成立之初所设计的，并在课程之中加入了家族史的作业形式，希望同学们不仅能感受到历史的广度，了解宏观叙事的历史潮流，还能感受到历史的温度，从微观切入，走进历史概念背后真实而鲜活的故事中。家族史便是一个很好的载体，与我们相隔数代的祖先是 我们陌生但又有着微妙联系的存在，透过他们在所处时代的经历，我们能够亲身触碰那些已远去的岁月。或许有些同学会觉得自己的家族普通而平凡，自己的祖辈并没有什么值得论道的人生经历，因此不知如何下笔。针对这样的困惑，他谈道，每个人都生活在具体的历史时期中，他们可能参与了历史的变革，也可能只是接受了客观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了自己的生活，但历史正是由一个个普通个体的生命经历组成的，这种个体生命与宏大历史之间的联系值得我们去思考和挖掘。透过他们的生活，他们在历史变动中的遭遇，我们或许能看到历史的微尘是如何负担在普通人的肩上，他们在风口浪尖所展现的行为与选择，也许会令我们困惑，令我们惋惜，但这正是历史的魅力所在，它的演绎永远不会按照既定的剧本进行。同时，彭老师也认为历史教育的目的不仅是

传授知识，也希望通过这样的机会能够加深现实中代际之间的情感连接。

家乡：变迁的见证与情感的纽带

许多同学在讲述祖辈或父辈的故事时，会提到他们目睹了家乡巨大的变迁或是背井离乡的经历。家乡，是家族存在的场域，它可以成为主题，也可以作为背景。无论是选择留在故土，还是离乡寻求发展，家乡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人们的生活中，成为情感与记忆的载体、家族兴衰与历史变迁的见证。

随着社会环境不断变化，不同年代的人们因各种原因离开家乡。对于 50 后的人来说，国家建设的需要对人口迁移起到了重要作用，例如上世纪 60 年代超过 400 万三线建设者从上海、沈阳等工业重镇向西部偏僻深山里转移，支援“三线”发展。另一种离乡方式是外出参军，这在当时的农村被视为一条社会晋升的捷径，转业退役后可能留在当地城市。总的来说，在改革开放之前自发的人口迁移仍相对较少。而 60 后和 70 后则是更多受到了改革开放后经济机会的吸引，自发地涌向东南沿海地区。彭老师提到，近四十年城镇化率的迅速提高意味着数亿农民从乡村迁往城市，这几乎是全球范围内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对于 80 后、90 后来说，面对高等教育扩招后的机遇，许多人在求学阶段选择前往外地城市深造。很多人会选择继续留在经济、教育资源较好的区域，而不是在就业后返乡。



“三线”工程中成昆铁路的修建



客家宗祠

谈到自身经历，彭老师回忆起小时候看过的《天南地北山东人》节目，面对广阔世界的吸引力，他在大学求学时离开了家乡，随着来到不同的城市读书、工作，这种吸引力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存在。但是当他遇到现实生活的困难、感到在外漂泊无依时，家乡的疗愈作用便显露出来，让他有力量继续在外闯荡。和许多游子一样，他只能在每年有限的时间回家看望父母。谈到故乡在自己心中的形象，他说：“我对家乡既有牵挂，又对它的形象逐渐感到模糊。这种模糊一方面让我和现实中的人事物联系减弱，但另一方面我对家乡美好的想象也因此变得更加强烈。”好像当我们离家乡越远，就更容易回忆起它的美好之处，将其抽象化为童年记忆、生活习惯以及与小家庭的联系，进而从中获得温暖与力量，而似乎有意无意地忽略了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和背后复杂的社会关系。“故乡”在心中渐渐演变为一个呼唤游子归来的符号，等到真正回去后才发现，原来我们的日常生活和家乡的交集已经少之又少。他认为这种割离感可能是背井离乡者在心理上处理故乡问题的一种方式：我和家乡有亲情，但又与之保持距离。

民族基因：乡土情结与移民文化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安土重迁”的文化传统，彭老师谈到，这种对家乡的依恋和坚守，既是对传统价值的传承，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适应。在农业社会中，特别是在古代生产力不发达的时期，土地是核心生产资料，因此人们很难离开土地。同时，长途旅行意味着脱离原有的社会关系，对生存



来说是很困难的。

然而，在中国历史上也存在着大量的移民群体。外出谋生、战乱离乡……或主动或被动，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与家乡的联系。

例如明清时期有名的徽州商人群体，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他们选择离开家乡去到江南地区（如扬州、苏州、杭州等地）做生意积累财富。彭老师提到，中国古话常讲“父母在，不远游”，似乎是在劝告人们不要离开家乡，但鲜有人知的后半句“游必有方”却是说如果为了自身的理想和追求，那么离开家乡就是有价值的、是允许的。这些移民群体被称为“客商”，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关系已经不再局限于家乡，但仍然保持着对家乡的认同，自称为徽商，并在地维系着自己的组织。清朝政府专门为移民群体设立了“客籍”，方便他们在异乡进行科举考试，也是从官方层面承认了移民的存在。

彭老师还谈到了“客家人”这个群体，在中国历史上由于战乱等原因，他们从北方（山西、陕西、河南、河北等地）迁移到南方地区，现今在福建省分布最广，两广、湖南和江西等地也有一些分布。他们虽然离开家乡，却一直通过自己的方式怀念家乡。客家人在移居他乡后仍然保持了原先的生活习惯、语言和文化传统，并组成了互助团体，保留村落和家族的形态。客家人重视传统，崇尚祖制观念和孝道文化。宗祠是一个家族共同祭祀祖先的神圣地方，也是客家人的精神寄托，既承载着对故土的深深眷恋，也凝聚起共克时艰的宗族信念。此外，祠堂中的对联大都是传颂家学渊源、劝诫后代子孙的箴言，在这种文化氛围下祠堂也成为本族子弟重要的办学、教育场所。

人们与家乡的联系不仅仅是在情感上，也体现

在对于家乡的回馈。福建省也是一个多移民的地区，由于地形上“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特征，人口压力较大。明清时期即便有海禁政策，许多人还是冒着风险来到东南亚从事商业活动以维持生计，在菲律宾和马来西亚等地建立了大量华人聚居区。这些移民对于自己的家乡也有重要的贡献。彭老师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据传说，番薯最早就是由一位福建商人从菲律宾带回中国的。当时福建正遭受饥荒，产量丰富的番薯引发了他的注意。为了躲避菲律宾官员的禁运检查，他把早就准备好的番薯藤绞在货船的缆绳里，有惊无险地带回国内。清朝道光年间，福州人民建“先薯祠”和“先薯亭”以纪念引种番薯有功的明朝商人陈振龙。在古代，福建人对家乡就有这种回馈的精神。而在近代，我们看到抗战期间以陈嘉庚为首的一批爱国华侨积极捐资赈灾，在海外奔走募捐，据统计，300多万福建华侨捐款近1亿元，捐献飞机200余架，救护车上千辆，为支援抗战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华侨率先投资，从小商品到基础设施和高科技项目，处处都有侨商的影子。

新变化：乡愁与全球化的交织

进入21世纪，随着全球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越来越多的Z世代群体对于“世界公民”这一身份的感知更加明显，对于到数万公里以外的地方求学、工作也逐渐习以为常。随着脚步越走越远，Z世代对于家乡的情感态度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彭老师坦言，他对这个问题也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无论哪个时代的人，家乡总是我们生命的一部分。即使作为所谓的“世界公民”，接触多元文化，但家乡这个概念在我们心中始终存在，因为这代表着我们最深层的“身份认同”。当我们在他乡一切顺利，并且能够很快地融入新环境，或许能够忘却家乡这一名片赋予自身的价值。然而随着年纪渐长、经受挫折或者心境发生变化时，我们也许会重新思考家乡之于自身的意义。

彭老师还谈到另一个影响乡愁情感的因素：技术发展。古代的旅人通过写信与家人联系，长久

的等待以及信息传递的困难使得游子的乡愁难以化解，无数关于思乡文学作品历经千年的沉积化作我们的文化记忆。而近代以来，随着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地域间的距离实则已被逐渐缩短。彭老师聊起自己读书的时候已经有了手机、3G网络，可以通过电话联络，但那时候视频还不像现在这样流行。随着高铁、飞机等更方便的交通方式逐渐普及，同样十几个小时的时间，原先城际之间的距离已经拓展到跨越半个地球的飞行轨迹，技术的发展缩短了Z世代在离家时与家乡的实际距离。当人们发现故乡不再那样遥不可及时，所谓的乡愁情绪可能就没有那么浓烈了，取而代之的是游子们更踏实坚定的内心。

在谈到新时代的新变化时，彭老师提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他发现最近有越来越多三四十岁的中青年群体开始选择返回家乡。从A地到B地的人口迁移可以被理解为两个城市推力和拉力的共同作用，随着改革开放后经济因素主导这一过程，很多人纷纷离开家乡来到大城市寻找就业机会。然而，在当今许多二、线城市经济发展加速、一线城市内卷压力不断上升的背景下，许多人不再执着于留在大城市，人们重新发现了家乡对于自身的价值。回到家乡后，人们既能获得适应当地物价水平的物质基础，心态也更加放松。虽然并非所有的返乡结果都令人满意，但是这种情感和经济上的双重满足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回流，也为Z世代未来的人生选择提供了另一条路径，重新构建起与家乡的深度链接。

结语

从“家族史”作业中我们得以窥见人与故乡的关系是如何在时代浪潮下发生改变，我们亦看到不同的群体如何在异乡扎根并将记忆代代相传。近代以来，伴随着传统乡土社会的瓦解与社会流动性的加强，越来越多的人怀揣着理想从故乡的土地走向世界各个角落，故乡的概念也在行走与见闻中变得更加丰富与深刻。当我们离开故乡后，回忆在内心深处沉淀、升华；当我们重返故乡之时，那些故事才显得愈加鲜活，历历在目。

Part 03

此心安处

我生于斯，却不长于斯。我流淌着这里的血，却对这里陌生得近乎一无所知。究竟何处是我的故乡？究竟何方才是我心安处？

“故乡”一词早已超越了简单的地理意义，承载着人们对于归属感的期冀。“自我”在一次次“离开”中逐渐完整，陌生的人和陌生的土地，让我们不得不探索如何构建与当下“附近”的连接，在其中内核得以确认和延展。从而，拥有回望故乡、理解故乡的欲望和能力。也许是带着永恒的温暖和接纳与世界交手，也许是光阴流转后的重回故乡。在这一部分，我们将共同探讨异乡人如何寻根，以及我们在当下如何重构与故乡的联系。

离开故乡，获得故乡

——《十三邀》观影沙龙纪实

学生采编 / 张恩禧、惠诗雅

责任编辑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所有远行，最终都能帮助自己理解故乡；的确，只有离开故乡，才能获得故乡。”贾樟柯导演在他的手记中如是写到。当越来越多年轻人面对着“远方”与“陌生”的可能之时，怀揣着各自的思绪与心情从熟悉的事物中逃离，逃离业已厌倦的环境，逃离既定的框架。脚步绵延，指向未知与无边的旷野。

而当我们为了远方而悸动，内心却也在一次次“离开”中飘摇。社会的流动日益加剧，人情与人际关系变得日益破碎，当物理距离的不断拉长变成某种必然之后，我们与故乡的瞬间变得珍贵而隽永。远离故乡后，当我们面对自我选择的“附近”，企图重新构建一种相对稳定的归属感时，又往往容易弥散在“原子化”的周围之中，沦于徒劳。当下的我们该如何审视这种乡愁？当我们谈论“故乡”与“附近”时，我们又在思考什么？

在本次观影沙龙中，《神仙湖畔》杂志社诚挚邀请到来自人文社科学院的王宁馨教授担任沙龙主持。王宁馨教授是英国伦敦国王学院博士，研究领域为媒介人类学、数字民族志、创意城市、文化创意产业、新媒体与互联网文化、算法与平台治理、文化政策与文化市场、流行文化与粉丝研究。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期间，王宁馨曾师从人类学家项飙教授，学习人类学。

《十三邀》是一档深度纪实访谈节目，发起人许知远与来自不同领域的嘉宾进行对话，在对话中观察和理解这个世界。其第四季邀请到了项飙教授进行对谈。这位当今中国极负国际声誉的学者在其家乡温州，再一次谈起他的理论，分享他的经历。我们该如何审视当下人和社会的联系，又如何以“附近”为抓手，从现实中获得新的“他信与自信”，项飙教授在这段对谈中给出了他的回应。

一、故乡是一场盛大的离散

人在年少时往往很难留恋故乡。当自己被限制在一片土地上时，我们对世界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想象。而当岁月渐长，高度流动的社会推着我们离开故乡，探索世界，踏上崭新的土地。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与影片中提到的在京温州人、去澳工作的人一样，



人文社科学院 王宁馨教授

有着“高度流动性”的共同身份属性。跳脱出故乡的框架，我们与故乡间开始变得疏离。而视角切换后，倘若人们背井离乡却始终无法融入当下的生活环境，忙着追向一个未来，从而导致当下被悬空，好似蜂鸟不断振翅，迟而未决。

马天乐：我是深二代，但在上大学之前从未认真审视过自己与深圳的关系。对我来说，“故乡”似乎并不具有特殊意义。深圳是一个由无数有着各自故乡的人搭建而成的城市，可我作为深二代在此长大，我所感知到的关于“故乡”的情感是匮乏的。我并不像我的父母带着故乡的印记而来，我与自己的老家联系并非十分紧密，不过是过年回家走走亲戚；我也不像深圳本地人，真正成长于这片土地。比起故乡，深圳仿佛不过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处落脚之处。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成长于与周围一切事物较为疏离的环境，对“故乡”缺乏认同感与归属感。而这份情感的缺失，让我对自己的生活也缺乏信心和爱。

刘璐嘉：我对故乡情感的觉醒似乎来自远离故乡。我是广州人，虽然广州与深圳的距离并不远，但这样的距离也足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与故乡的关系。在上大学前，我从未真正探索过广州，但上大学后才发现故乡的可爱之处。我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距离产生美”。或许只有当我们远离故乡时，才能真正意识到自己对故乡是什么样的情感。

杨国玉：与在大城市长大的大家的感受有所不同，我来自江西的一个小县城。于我而言，我与故乡的关系比较复杂：一方面，熟悉的风景、乡音和亲友让我感到亲切，这份难



观影现场。惠诗雅 / 摄



讨论现场同学发言。惠诗雅 / 摄

得的深厚感情是需要长时间建构的，尤其当我离开家乡后，这些和家乡、与家人相关的瞬间，都变得珍贵而隽永；另一方面，虽然我与家人朋友有着亲密的关系，相处久了却发现大家的思想观念并不一致。他们更关注琐碎的日常生活，相对传统固化的观念也让我觉得无法与他们深入交流。对故乡和亲人深厚的情感让我对他们充满挂念，但同时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而无法与家人更亲近，是一个十分矛盾的问题。我思念故乡，却无法再进一步亲近故乡。

王宁馨教授：当我如今回望从本科、硕士、博士一路走来的历程，我发现我与故乡的联系早已超越了这种被学历所定义的联系。我是浸淫在故乡的环境中长大的，我各种各样的联系都是在故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不可能完全跳脱成长环境成为一个孤立的原子化的个体。或许有人拒绝承认自己与故乡的联系，但其实我们很难将自己与故乡完全割裂，因为人是生活于社会环境的各种联系之中的。我还记得自己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期末考试期间曾经在房间里待了一个星期备考未曾出门。这种过于孤独和封闭的状态使我不断诘问我自己离开故乡来这里求学的意义是什么。那时我的导师建议我走出房间，主动与周围的环境建立联系，从而避免产生留学生与社会隔绝的“悬浮”感。在应对这种过分的孤独感的同时，我也在重新思考我同故土和故乡的关系。希望我的经历能够给予即将走向留学道路的诸位同学一些启发。

二、消失的附近

我们对故乡的感知，大都源自未离乡时对其“附近”的感知，也许是千百度回首过的小巷，也许是亲切熟悉的乡音。然而，当我们离开故乡，来到自我选择的起点，“附近”这个极度与自身相关的空间便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甚至变得真空。何谓“附近”？根据项飙教授的阐释，“附近”是一个具有很强社会性并充斥各种复杂社会关系的空间，是原子个体与宏大世界之间的中间层。它以自我为圆心，强调人与周围环境的主观联系与具体经验，是人们重新建立对生活的感知及掌控的基础。

项飙教授提到，距离感能够让我们超越生活本身，从精神上俯视生活与世界，从而对“附近”的事物发生兴趣；但在当今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们倾向于通过抽象概念和原则理解世界，而不是通过自身对“附近”的具体感知来认识世界。当“消灭附近”变成一种趋势时，个体容易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固步自封，做一个纯粹的原子；要么凌驾于一切之上，做宏观的评论。他讲道，青年人中存在的矛盾感和无力感，与对“附近”感知能力的丧失息息相关。如今的社会，大家对自己周边世界缺乏那种浸淫其中并形成叙述的愿望和能力。我们习惯于超越一切去批判反思整个体系，却忘记在超越之后回看自己身边的世界。

刘熙越：在我看来，当下的我们确实很难与周围的人建立强烈的联系，而主体间性的消失会使人人与人逐渐趋同。一方面，我们缺乏与附近的联系而变得原子化；另一方面，相同的消息源会使我们对宏大叙事的观点变得同质化。在算法不断推送符合偏好内容的助力下，个体的声音逐渐与主流的观点一模一样，舆论重重堆叠，愈发极端化。



活动主持嘉宾——王宁馨教授。惠诗雅 / 摄

陈美仪：随着社交媒体不断入侵我们的生活，我们对“附近”的情感需求从线下转为线上。极端夸张的舆论符合效率最大化的考量，而匿名的冲浪方式会进一步加剧舆论的极端化，可能也与当下社会追求效率的态度有关。

王宁馨教授：正如影片中项飙教授所提到的，当今时代，我们过度重视效率，同时缺乏足够的信心以投入一段情感关系，而近年来兴起的“搭子”和各种约会软件可谓是“弱连接”人际关系的映射。不同于“朋友”，我们不需要对“搭子”投入过多精力以维护关系，还能够通过相互利用从对方身上获得利益。这种对于友情“功能性过剩而生态性不足”的计算同样适用于爱情，随之而来的是年轻人依赖父母介绍和约会软件衡量最匹配的对象。不可否认，这种方式极大地降低了风险、提高了效率，但处理人际关系时过度重视效率必然会导致我们忽视最本真、最核心的关于感情的真实体验。

张毓：附近的消失同互联网的高度发达息息相关。生活在互联网时代，我们接触外界的媒介越来越方便，满足自身需求的成本越来越低，追求效率最大化似乎是社会发展到目前阶段的必然产物。然而，过度追求效率也会加剧社会个体的原子化，这是需要我们反思的。我们始终需要保留一些不追求利益和效率的部分，保留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性与独特性。

熊瑞欣：影片中，项飙教授提到，当代人越发关注自我和宏大叙事，唯独不愿意面对“附近”的生活。在我看来，这一症状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不确定性的增强，其二是终极价值的缺位。人们之所以愿意谈论这些距离我们非常遥远的事物，似乎是因为它能为我们带来一种超越感。人们想要超越自己当前的处境并去往一个更好的地方，但它究竟好在哪里，我们并不清楚。我从小在上海长大，因此对上海祛魅比较早。于我而言，上海只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城市，无法承载过多像《小时代》中纸醉金迷的幻想。对于我们来说，很多时候重要的是距离感而非真实本身。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为什么会把这种强大的想象加诸现实呢？我想，或许是因为终极价值已经不复存在了。无论是尼采的“上帝已死”还是马克斯·韦伯“价值理性压倒工具理性”，我们不再有普遍的宏大想象，所以才会追求某种“存在”。但这种“存在”并不是真正的存在，只是过去的残影，就像食腐动物汲取尸体上的营养一样。然而，我们都清楚，这种营养并不能真正满足我们的渴望。

余思远：在我看来，人们热衷于讨论宏大叙事是社会分工精细化的产物。我们就读于不同的专业、任职于不同的岗位，“共同生活”十分有限，这必然导致“共同认同”也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会有意无意地制造一个共同认同，例如“来了就是深圳人”。这一个认同必须足够宏大，才能够让所有人都产生认同感。对于个体差异极大的我们而言，或许只有宏大叙事才能让大家一起探讨。从这个角度来看，“附近”消失的症候也许是我们渴望维系人际关系的选择。

王宁馨教授：我在牛津大学人类学系读书时，所有中国同学每个月都会跟项飙教授见面，共同探讨关于人类学研究的体验与思考。项飙教授在谈及人类学家的视野时曾多次跟我们强调，在研究中注重“主体间性”的重要意义，这次观影活动唤起了我的记忆，项飙教授如今对于“附近”的关注与他当年强调的主体间性有异曲同工之妙，可见这已经是他长久以来的深入思考了。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之后，整个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加速推进，人的主体性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成为解释自然、掌控自然的工具，以至于达到了极端的程度，盲目追求效率、利益，忽视对环境的破坏和可持续发展。于是，这种主体性成为工具理性，个人主义、消费主义思潮滋长，每一个个体只关注自己的利益，



“深圳散步”活动海报



“散步练习”卡片

沉溺享乐和资源浪费，人际关系也成为被利用和算计的对象，人与人之间失去信任和平等。于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哈贝马斯提出了人需要建构“主体间性”。这意味着人需要重新思考主体性和人际关系，意识到处于人际关系之中的双方都是被尊重的主体，从而给予主体间平等交流的空间。项飙教授多次向我们强调在人类学研究中“主体间性”的重要性，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自己与“附近”的人、物、自然和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同时也不停止对自身处境和影响的反身性考察，从而能够正视我们在社会关系中的位置，对于我们的“附近”倾注更多的关注、爱和思考。

三、再回首：寻找故乡，重构附近

故乡，不仅为游子提供永恒的温暖和接纳，更时刻提醒他们珍惜此刻。珍惜此刻，因为当往事流转后，每一个此刻，都是未来回不去的“故乡”。而在“附近”几近消失的今天，寻回“附近”意义重大。个体构建出自己的“附近”后，才能重新获得儿时“故乡”所能提供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让“附近”成为一个锚，并基于此延展出对具体生活的意识。人与每一刻的“附近”都在产生关系，每一刻的“附近”都值得用生命具体感知。作为我们与周围环境产生联系的“抓手”，“附近”能够为我们提供一个扭曲生存环境中可以喘息的空间，去看具体的风景，爱具体的人，从而缓解因与故乡联系渐淡的失落。项飙教授提到，人不能等到对生活有了全面判断之后再去生活，关键是在当下给定的条件下，不让自己的思考能力和行动能力丧失。重建“附近”，就是一个现实的、很小的突破口。对于离开故乡的人而言，重建“附近”方能摆脱“悬浮”身份带来的迷茫与焦虑，重拾对周围环境及人际关系的爱与信心。

惠诗雅：对我来说，“故乡”是一个很熟悉的概念，我与故乡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然而，即使我很爱我的故乡，我可能也不会选择以后回到故乡生活。与此同时，我的“附近”是不断变化的：我来到深圳读大学，之后可能去往另一个城市读研，再去另一个城市工作。我的“附近”不再是固定的状态，而会随着我生活环境变化而变化。对于像我一样熟悉故乡但无法回到故乡的人而言，如何与不稳定的“附近”建立联系似乎是一个必然要面临的难题。我可能需要不断地在新空间进行实践，才能不做城市的漫游者。

刘紫欣：在我看来，我们与故乡之间的连接可能只是某一个触角而已，或许是美食，或许是公园，也或许是某个特定的场景。当我们与故乡的触角失联时，我们会试图通过互联网构建一个想象中的精神故乡。我曾经看到一个调查，超过一半的中国人会将自己的微信地区设置为冰岛，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向往冰岛慢节奏的生活。但假如我们真的在冰岛，会发现日照时间很短，很有可能极不习惯。我们会赋予精神故乡很多想象中的元素，作为一种精神上建构出来以逃离现实的意义，但实际上，想象构建的“它”与客观存在的“它”并不等同。不可否认的是，我们需要这份能够给予我们力量的依托，在长大后，精神故乡便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第二故乡。

徐涵：其实，正如影片中项飙教授提到的，“附近”是可以介入的。我想分享两个例子来回应同学们的困惑。第一个例子关于我朋友的书吧。她和其他三个股东在深圳宝安的城中村租了一个小店作书吧，为朋友们提供了一个公共空间和精神阵地。每逢周末，我们会组织主题性的观影、读书、讨论会等活动，和不会出现在自己生活圈的人交流。第二个例子关于我自己，自从高中毕业后，我离开深圳已经十几年了，可以说对这座城市十分陌生。当我回到深圳后，我开始组织一些类似“握手 302”的“城市走读”活动，召集身边的一些朋友进行城市漫游。我们选择了几条路线并确定了不同的主题，我还设计了一套小小的散步卡片作为大家散步时的观察工具。探索“附近”并不困难，大家可以尝试通过力所能及的小事与“附近”重新建立联系。也许这种联系，就是在帮你建造属于自己的归属感。

归去来兮，人生不过是离乡与归乡。当故乡远离、“附近”真空、失落与迷茫席卷，我们被迫失根而悬浮于半空。然而，倘若我们重拾对周围环境及人际关系的爱与信心，与当下的“附近”重构联系，由“附近”延伸开去，故乡兴许就在蓦然回首处，那可能是丝丝缕缕的乡愁，也可能是自我搭建的归属感。

贡献者名单：

余思远 2020 级 经管学院

刘熙越 2020 级 经管学院

刘紫欣 2021 级 经管学院

马天乐 2022 级 经管学院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刘璐嘉 2023 级 经管学院

杨国玉 2023 级 经管学院

熊瑞欣 2023 级 经管学院

陈美仪 2023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张 毓 2023 级 经管学院

徐 涵 传讯与公共关系处

街头启示录： 走向心中的故乡

供稿人 / 胡思恬

学生采编 / 谭芷韵

责任编辑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香港 City Walk 街景：旧湾仔邮局 胡思恬 / 摄

想象一下，走在上海两边长满梧桐树的街上，跟着自己喜欢的路牌名拐弯或是前进。没那么刺眼的太阳照在红砖铺就的浅褐色墙上，左边是一家精品古着店，右边是音乐学院修理小提琴的作坊，转角处还有一家没听说过名字的咖啡店，马路对面是牵着小狗的异国情侣。再可以想象一下，踏上香港的叮叮车，选一个在粤语歌中经常出现的地点落车。拿着湾仔的地图，沿皇后大道东一路寻找那些地图画出来的历史建筑：旧邮局、洪圣古庙、和昌大押，顺便把街市的小摊逛一遍。

大多数人第一时间跃入脑海的词应该是“City Walk”，近日火遍社交媒体的新型旅行方式。或许是被疫情束缚太久，人们在解封后第一时间爱上的是“特种兵”式旅游，即用最少的时间打卡最多的景点。然而过了不久，人们似乎意识到——“City Walk”，这种无需详细计划且蕴藏惊喜的方式，可能更可以深入一座城市的肌理，甚至能像本地人一样体验生活的感觉。

“City Walk”，我更愿称它为“城市漫步”，顾名思义，用脚步丈量城市。因为是用“脚步”，足以见得节奏之慢。不急不缓地行进，让心情也变得悠闲，从而留了时间给身边的景，好让人沉浸其中，刻下以步长为精度的城市记忆。还有一个关键词，便是“丈量”。我们的脚步仿佛一把尺，

一寸一寸地把每个角落都觅遍。走过的路尽管比起整个城市只是一小块，但这样细致的探索可以让人情不自禁陷入回味：哪条秘密小路有自己吃过最好吃的苍蝇馆子，哪座房子碰到了向你讲解历史的老伯。

一、路过时光：脚步留下回忆碎片

我来自上海旁边的小城无锡。近几年来，它好像变成网红，春天人们挤进鼋头渚赏樱，秋天去惠山古镇看“天下第二泉”和菊展。而对于我，一个在无锡生活了十余年的人，早就不习惯去景区看热闹。我喜欢反复去一些我已经熟悉透了的地方，看看那边我常逛的小店是否还营业，那些老街巷经过市政规划后改造成什么模样。

无锡有一条南长街，大抵是旅人们心中的City walk 首选之地。不仅因为它傍着有“江南水弄堂”之称的古运河，还有近处是素墙黛瓦、远处是高楼大厦的独特景致。街上更有时常排队的茶颜悦色和吱秆绳油赞子，以及文艺青年喜欢的书店邮局，可以说是无锡必打卡的景点。南长街自然也随着社会的潮流更新着，不断给自己添上符合现代人审美的装饰。十年前待过



近处是南禅寺小吃街的摊位，远处为寺庙中的妙光塔。 胡思恬 / 摄



学前街地上的铜制导览图。 胡思恬 / 摄



小学附近伫立着的钱锺书雕像。 胡思恬 / 摄

的咖啡厅几年前就不见踪影，不少老房子也被贴上“危房”的标签，唯一还保留着的便是地砖上刻着的无锡方言。我虽然是个“洋泾浜”，却对这些方言情有独钟。小时候去南长街的乐趣就是找每隔一段路地砖上刻的字：“喽哒”“击棍”“青馒头”。对外地人仿佛天书的这些词，在我读出来的刹那就可以会心一笑。时至今日我依然觉得这些地上的方言才是南长街的精华所在，踏上这些地砖仿佛与这座城市对话，倾听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声音。可惜游客大多走得太快，只觉得南长街是一条普通的古街，却忘了低头看看脚下的路。

南长街的旁边是南禅寺，据说是“南朝四百八十寺”中其一。游客可进寺庙里拍一张妙光塔，再求一串十八籽。但是“南禅寺”这个地名对于老无锡人来说有着更特殊的意义——我以前经常来南禅寺，可直到去年才第一次进这座寺庙烧了第一炷香。南禅寺所在的街是小学时和同学出来百玩不厌的小吃街，是搜罗新奇文具的书城，是老年人最爱来的全城最便宜的朝阳菜场。我喜欢走在菜场边的槐古支路上，排队买梅花糕的阿婆是“全村的希望”，说她们整个小区都喜欢这家梅花糕；我喜欢走上公交站旁行速缓慢的天桥，听来来往来的老年人炫耀在菜场以多低的



将夜未夜的古运河畔，是烟雨江南经典的一隅。 胡思恬 / 摄

价格拿下一袋河虾。南禅寺是“烟火气”的代名词，而不仅仅是字面上的一座寺庙。南禅寺热闹着，我眼前的无锡也鲜活着。

翻看社交软件上的无锡旅游攻略，会看到推荐的住宿位置几乎都在市中心，理由是有一个连接好多综合体的地铁站，吃喝玩乐以及交通都很方便，但市中心好像也只用于解决吃饭和住宿。对于本地人来说，市中心才是真正的无锡，它记录着无锡的岁岁年年，也书写着我的成长。我的小学在市中心地铁站隔一个街区的学前街。那时候只觉得“学前街”是因为这短短一段路坐落着三所学校，后来长大了才意识到这条街上曾经住过不少文人雅士，有过许多在历史文献中读到的人曾真实地站在这里讲学。很多年没走过学前街的我，仍能记得小学时哪个角落有卖烧饼的老夫妻，哪条是赶公交抄的近路。如今学校后门的小路重新装修了，甚至连公厕都粉刷了，正当我觉得属于我的回忆变得模糊时，突然惊喜地发现了地上镶了一块铜制的导览图。图上标出了学前街上各个名人故居以及为他们所立的雕塑的位置，我于是循着地图走进了顾毓琇纪念馆，认识了一位文理兼修近乎全能的顾毓琇；参观了薛福成的“江南第一豪宅”，想到前不久刚学的洋务派核心理念就是由他最先提出；现在的钱锺书故居多



在罗湖打卡“深圳曼哈顿”的景象。胡思恬 / 摄



在盐田高级中学观景台看海边的集装箱。胡思恬 / 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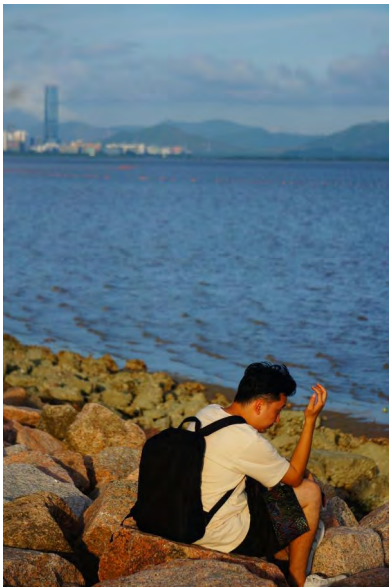
了“锺书客厅”，可以通过投影看到《围城》是怎样被创作出来的，给人一场错位时空的见面。我惊讶于自己竟与诸多大人物曾身处同一经纬，同时也油然而生出自豪。千百年来的学者从无锡走出去，一代又一代像我一样的人，也在创造这个城市的历史。

人们通常称他们出生和成长的城市为故乡，现在的我每每看到“无锡人”这三个字，都会默认是“我”。生活在无锡十几年，我好像成了这座城市的“主人”，被容许进行无数次无限时的 City walk，对每个熟悉的角落更加了然于心。无锡注视着我长大，我也见证它的日益繁华。相伴多年，它是我心中难以割舍的一个角落。正因如此，我时常眷恋这个时刻接纳我、给我安全感的城市。

二、印象解码：用心感受城市温度

十八岁那年，我离开无锡，来到深圳上大学。深圳这个城市，在我印象中就是“一位老人在南海画的一个圈”。它应该是高楼林立，名企比肩，穿着西装的打工人在地铁站间穿梭，改革的春风吹遍红树林。直到大一开学前和父母一同爬上莲花山看过邓小平爷爷雕像，去人才公园散步赞叹过这繁华的夜景，我仍是这样觉得。

开学那一天，我在朋友圈写了这样一句：“我开始接受这就是接下来四年我要待的城市。”初入大学，抱着新鲜感，我迫不及待地探索这座完全陌生的城市。我像个穷游的背包客，没有很明确的目的地，单纯想见一下只是听说但从未见过的风景。十月，我一个人去了罗湖，想去清水河追一趟绿皮火车，想去东门老街造访一下中国内地第一家麦当劳。可惜我的导航带着我骑车进了洪湖公园，我幸运地看到夏末的残荷和公园里一只闲庭信步的猫。经过名字很有意境的晒布路，逛了一圈文和友，我向着黄贝岭的方向走去，据说在那边的天台可以看到“深圳曼哈顿”的景象。走了好一段维修中的马路，我终于登上所谓的楼，靠近半闭的窗拍了一张——罗湖商务中心、地王大厦、京基100、平安金融中心，深南东路上一栋更比一栋高的楼见证着深圳的崛起和发展，令我这个旅人有一种被征服的感觉。那年冬天，我为了摆脱期末考试的压力，突发奇想去盐田看海。天气很好，我晒着暖暖的太阳坐在海边的长椅上。栈道上空无一人，这个城市此刻是那样平静，没了高楼大厦，只有远处五颜六色的集装箱和停在码头的货轮。傍晚，我辗转多班公交来到海鲜街。身边是贴有“百年墟镇，今朝更新”的手架，鼻子里灌进的是淡淡的鱼腥味，肠粉店里甚至是矮矮的天花板和水泥地。深圳也有这样朴素的小



深圳湾坐在礁石上的人 胡思恬 / 摄



华强北弹钢琴的人 胡思恬 / 摄

渔村，忙碌的人们、归家的学生，在山海之间自在着。我好像拨开了深圳的第一层面纱。

进入大学一年后，我的脚步又陆续光顾福田、南山。但此时我不完全是一个旅人，已经成为了半个土著。我在华强北发现地铁站口摆了几架钢琴，有一个程序员似的小哥正专注地看着 iPad 弹琴，论琴技显然是初学者。我不禁好奇，他是不是想回避一下繁杂的工作因而跑出来练琴？抑或只是为了有一点浪漫主义，在人来人往的电子市场门口沉浸于他自己的艺术？我想他应该跟我一样，愿意在这个快节奏的城市里慢一点逗留。我在八卦岭的城中村走进书刊批发市场，走廊两旁的小铺中书多得把老板娘几乎淹没。这时候我仿佛穿越到从前：南禅寺的书城也有这么多的教辅和杂志，我也曾站在高高的书架前挑挑拣拣。或许深圳的小孩也常来这里挑书，我想象着，故乡的影子若隐若现。我还在深圳湾碰上了刚好满座的书吧，于是便在一旁的草坪坐下。海边有穿着深圳校服吃糖葫芦的初中生，有互相拍照的异国情侣，有穿着运动衫的跑友。我注意到礁石上坐着几个托着腮望向远方的人。他们是和我一样在等一场日落，还是在思考“偌大一个深圳怎么没有我的位置”。如果以后我留在深圳，会不会有一天也会成为别人眼中“坐在礁石上的人”？深圳是如此包容，以至于在城市漫步的过程中，我遇到从前、现在以及将来的我。深圳的形象，慢慢在我脚下得到重塑，我开始在这个城市寻找自己的轨迹。

葛亮曾这样描述深圳：“我从没感觉到自己的年轻在一个城市会如此的恰如其分。”这句话让在深圳待了近三年的我产生了极大的共鸣。越往深圳的细小处走越会发现深圳的韵味。以前跟大多数人想法一样，深圳是个专注搞钱的城市。但在逛遍深圳的各大文化场馆后，我不禁赞叹深圳的人文气息。有一次在南山博物馆看人物肖像油画展，周遭的观众不像我以前看到的只会说“这幅画好看”，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谈论着画中的人物身份怎样影响作画风格，以及色彩如何形成光影对比。深圳虽没有厚重的历史，但它愿意让城市里的人们去尽可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在深圳美术馆，我了解到盐田千春把人与人的命运具象化成相连的线；在深圳博物馆，我欣赏着非遗手工艺人制作的象牙雕，展馆中的陶器令很多人拿出水彩作画。这座城市是一个巨大的通识课堂，我很感恩我是课堂中的一员。

深圳很年轻，深圳人也很年轻。在天桥的标语上我无意中发现，深圳有“儿童友好城市”的称号，细想来深圳的儿童也确实多，蓝白校服已经成为深圳的某种象征。可能正是因此，深圳人依然葆有童心，他们的生活有一种纯朴的知足。在冬天，深圳人会涌进公园看落羽杉使层林尽染，会趴在深圳湾的栏杆看候鸟南飞；在春天，绿意盎然的草坪上总会摆满野餐垫，小朋友们在跑闹，大人们放风筝，像是把一周的烦心事都放开去。他们的幸福感来源好像只是一些小事：一家人聚在一起，抑或是在街边小摊买到好吃的煎饼。在这座城市的影响下，我也变得不那么追求完美主义，生活中猛然产生的孤独感可以被路边任何一棵挂着红灯笼串的树治愈。

在龙岗待久了，我发现深圳这个“一线城市”实际上也充满浓郁的烟火味道。我尤为喜欢深圳的夜，不似无锡一片寂静，夜色下的深圳会冒出数不尽的小推车和地摊。甩卖的衣服鞋子，现榨的水果汁，这一切都是我不曾想



在深圳美术馆观展“盐田千春”。胡思恬 / 摄



周末的草坪上坐着聊天的姐妹 胡思恬 / 摄

象过的深圳。居民区楼下的超市会有两个年轻小伙一唱一和：“叶菜只要一块一把了啊！”“好新鲜的芋头啊，买几个回家去！”一旁的老年人围着玉米货架撕下玉米叶子，手中拎着满满一包打折的土豆。广场舞方阵的做操队伍徐徐移动。几个小学生相约糖水铺，争先用电子手表付钱。咖啡书吧的主理人在店外与一群朋友架起烧烤架，在烟雾缭绕中玩狼人杀。这样的深圳给我一种生活的感觉，就像很平常的饭后散步，可以轻易融入这市井气中。

我从未想过我在深圳的足迹能称为“City walk”，毕竟别人问我深圳有哪些好玩的地方，我甚至不能脱口而出一个答案。我至今还没进过世界之窗、大梅沙这些“必玩热门景点”，但我从一条条本地人才熟知的路上认识一个和往日印象不一样的深圳。我的深圳记忆或许不是宏观辩证的，但它是专属于我的，我看过的风景都成为我的一部分。深圳的气质逐渐影响了我的气质，恰恰是这些“乱走”的经历让我从一个观察者变成了一个体验者，现在的我，看到“深圳人”三个字，也会下意识地认为我是其中一员。

城市是一本打开的书，而“City walk”是阅

读这本书的独特方式。它的慢节奏可以让人静下心来，深入城市的肌理，贴近城市的呼吸。而它所要求的细致探索，也让城市的气质渗透进人的气质。当这座城市变为“故乡”，“City walk”就从旅行形式变成生活态度。

在深圳这些年，我意识到故乡这个词，其实除了“出生和长大的城市”，更有另外一种含义：即承载我最深厚情感与记忆的一个地方。无锡是我的第一故乡，那深圳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若把无锡比作我的一位长辈，那每个假期回家就像探亲。我在城市中的漫步就像在打量这位几个月没见的老人又有什么变化：老房子开始翻新——老人在把鬓角的白发染回，鲜有人知的古迹开始得到宣传——老人笑咪咪地展示儿时的奖状。深圳则是我成长路上遇到的一位挚友，他的年轻与活力感染着我，鼓励着我不断试错、看到更大的世界。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随和与包容，让我也成为一个更理性的人。一路上走走停停，深圳不再是那个只和“改革开放”挂钩的城市，它是承载着故事、信仰与温度的共同体。我感到幸运，因为我能够有时间慢慢享受这座城市的韵律，因为这座城市足够细腻，愿意把每个角落展示给我。

当代年轻人与故乡连接的新构建

——专访 2020 届毕业生黄嘉俊

学生采编 / 刘广悦

责任编辑 / 叶润博

编审 / 徐涵



黄嘉俊，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 届人文社科学院毕业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客属联谊会、大学麒麟队、大学粤剧团创办者，“知行计划：下南洋”策划者。毕业后，黄嘉俊回到故乡台山创办民宿，为保护故乡传统文化不懈努力。

前言

故乡对于当下的我们来说是一个熟悉却又模糊的概念。在瞬息万变的时代里，人们步履匆匆，背井离乡，走南闯北，走马观花般掠过一座座城，短暂地栖居在一间间房，最后却不知道哪一片土地可以被称为“故乡”。然而，在黄嘉俊学长的心目中，“故乡”一词承载万千，它是代代传承的乡音，是客家血脉中的“硬颈精神”，更是支持他重返故乡、上下求索以保护传统文化的原动力。跟随黄嘉俊学长的脚步，我们或许能在这来去匆匆的时代里，重新寻回与故乡连接的意义。

Part 1: “日久他乡即吾乡”

黄嘉俊学长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十分特殊。他在父亲的故乡惠州出生，却在母亲的故乡台山长大，并在那里度过大部分的童年时光。而幼儿园时，父母为了让他接受更好的教育，又将他送到深圳念书。从那时起到大学毕业回乡创业前，他都与深圳这座城市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多元的文化背景熏陶下，他对于“故乡”的理解是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他提到，在很小的时候，他一直称自己为“惠州人”，直到某天，他在方言的差异中猛然发现——惠州并不全是客家人，“惠州人”一词也并不能简单涵盖自己的故乡。于是他改变说法，开始称自己为“客家人”。大学时期，黄嘉俊学长再次陷入“故乡”定义的困境。那时，学校里有许多讲粤语的同学，自小在深圳长大、对广东话极为熟悉的他以为自己能很好地融入“广东人”这个群体。然而，黄嘉俊学长却发现，即使是与相隔仅一百多公里的广州同学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地理差异，让他对“广东人”的定义产生了动摇。可若是称自己是惠州人，又无法解释“你不是从惠州考来的”这一问题。一时间，黄嘉俊学长也对故乡一词的定义亦深感迷茫——“我到底属于哪里？”

不仅是黄嘉俊学长本人，他身边的朋友对于“故乡”一词的定义也非常模糊。他回忆说，身边很多籍贯并非深圳的“深二代”同学，似乎都习惯于称自己是“深圳人”。比如哈尔滨籍贯的同学会发早茶照片，配文“我们深圳人还是吃得惯这些”；再比如湖南籍的同学学习惯说“我在深圳长大，就是深圳人”。久而久之，大家似乎潜移默化地接受了这个规则，也是从那时候开始，尽管依旧心存怀疑，黄嘉俊学长也开始跟身边“深二代”朋友一起，自称“深圳人”。

黄嘉俊学长真正认清故乡的定义，是在看到黄氏客家祠堂中的一首认祖诗之后。其中有两句话让他豁然开朗——“年深外境犹吾境，日久他乡即故乡”。他开始重新思考故乡的定义，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然日久他乡即故乡，那么何必纠结，深圳是我待最久、最熟悉的地方，那便将它作为我的故乡。”经年思考，时过境迁，黄嘉俊学长终于拨云见月，形成了对故乡的独到见解。



“下南洋”活动——坤甸共同希望教育基金会 / OSA 摄

Part 2: 客家人的“硬颈精神”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而黄嘉俊学长不仅是“知行计划：下南洋”策划者，还是我校客属联谊会、大学麒麟队创办者。他说，这些成就与他自幼习得众多方言，以及客家人的“硬颈精神”密不可分。

大学一年级时，黄嘉俊学长偶然加入到一个名为“九州客家群”的QQ群内。在这里，他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学习客家话，方言水平突飞猛进。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惊喜地发现，客家话这门方言竟然有如此之强的凝聚力，能将大洋两岸的同胞聚集在一起。一个新想法迸发了——我可不可以通过弘扬客家文化，来将更多的同胞与故乡连接在一起呢？

2018 年下半年学期，黄嘉俊学长迎来了一个机会。他受到学生事务处老师的邀请，协助举办一场官方实践活动。对于本次参访活动的内容，他陷入沉思——怎样才能跳出传统思维，将活动办得更大、更有意义，让同学们能与这个世界有更深层次地对话呢？最终黄嘉俊学长给出的答案，便是延续至今的实践活动“知行计划：下南洋”。活动中，他带领同学们来到印尼坤甸，对当地的华人社区进行调研，决定针对当地华人学校的中文与方言教学问题，策划一个特殊的语言项目。他说，这些印尼华人很多都是 150 年前从广东到南洋打拼定居的客家人，然而对他们而言，中文传承已经成为了危机。活动的初衷是希望能够打破大家对东南亚的偏见，在走近当地华人的同时，也帮助他们重新拾起故乡的语言。

为更好地传承客家文化，大二时，黄嘉俊学长小试牛刀，成立了第一个传承客家文化的社团——客属联谊会。一个初步设计为“客家小点心制作”的小活动，在 2018 年 12 月迎来了它独特的机遇。学勤书院的老师得知黄嘉俊学长的想法后，连声称赞，并鼓励他们大胆一点，将活动与即将到来的新年联系起来，做成一场盛大的新年宴席。就这样，受到鼓舞的黄嘉俊学长与三四个伙伴一头扎进准备工作中，各司其职，成功举办了一场浩大的“客家团圆饭”。活动当天，客家山歌婉转悠扬，客家麒麟生龙活虎，有一千多人参与到活动现场。在这样热气腾腾的氛围中，黄嘉俊学长感慨万千，想要继续发扬客家传统文化的决心也愈发笃定。

大三下学期，黄嘉俊学长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交换时观看了醒狮队的表演。他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醒狮队是非常受欢迎的队伍，无论在哪个场合都不乏它的助阵。这再度引发了黄嘉俊学长的思考——为什么醒狮队这项中国传统文化，在异国他乡能如此备受追捧呢？看完香港电台拍摄的以客家麒麟为主角的纪录片《麒麟醒狮瑞兽》后，他更加兴奋：既然香港、深莞惠地区都保有客家麒麟的习俗，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何不以此为文化名片，创建自己的麒麟队呢？有了这个想法后，黄嘉俊学长即刻为“麒麟队”的筹划行动起来。

然而这一次，事情却没有他想象的那么顺利。一连受到父母、朋友和书院老师的拒绝后，黄嘉俊学长深感沮丧。尽管处处碰壁，但他并没有就此止步。终于，在他不懈地坚持下，老师们被打动了。不久后，麒麟队便以学校校队的身份，正式开始招新。黄嘉俊学长说，麒麟队刚成立的时候，经费严重不足，乐器和麒麟头都买不齐，只能从老师傅那里收旧的。但这并没有影响麒麟队员的热情，队员们拿着“破锣烂鼓”，却练习得格外起劲儿。终于，在人文社科学院的校友返校日上，麒麟队首次被邀请正式演出。据黄嘉俊学长所说，他们穿上自己设计的服装，买了崭新的麒麟头，在学校内一舞惊艳，



“下南洋”活动·坤甸新力中文补习班 / OSA 摄



“下南洋”活动·当地语言教学情况调研 / OSA 摄



“下南洋”活动·汉语教学活动开展 / OSA 摄



大学麒麟队合影



大学麒麟队在思廷书院周年庆典表演

现场叫好不绝，大学麒麟队自此正式拉开了辉煌序幕。

黄嘉俊学长曾经说过：“客家人发展得这么好，原因有很多，其中之一就是客家人的‘硬颈精神’与念祖念根的文化传承。”黄嘉俊学长解释，“硬颈精神”指的是客家人不服输、靠努力打拼一片天的精神，即便在没有任何地理优势的情况下，客家人依然能白手起家，靠得就是不信命运、迎难而上的一股劲儿，而在麒麟队成立的过程中，黄嘉俊学长也就是凭着这不服输的“硬颈精神”，不断争取，终成正果。

Part 3：当代青年如何“回望故乡”

说到黄嘉俊学长，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还是他返乡创办民宿的决定。谈到这个决定背后的原因，黄嘉俊学长承认，这其实是一件久埋心底的事。小学三年级时，机缘巧合下，他在电视上看到“开平碉楼申遗成功”的消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开平跟台山毗邻，但奇葩而有特色的风俗建筑，也令他对开平碉楼产生了浓厚兴趣。大学期间，他积极参与乡村项目，一次次实践体验让他逐步意识到，乡村振兴对于国家传统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只有振兴乡村，才能挽救家乡的瑰宝。于是毕业后，他踏上了回乡之路。在台山，他自学建筑学，亲自与装修师傅交流；学着打水、砍柴、做饭。创业途中磕磕碰碰，他也由青涩的学生成长为一个合格的社会人。黄嘉俊学长提到，一开始，台山人并不视他为“本地人”，所以为了融入当地文化，他开始重拾台山方言。他起初说得不太流利，只敢在街道办事处与人简单交流，后来则越来越大胆，也越来越能够契合当地文化。用他的话来说，这算是一种“再台山化”的过程。

谈到当下传统文化的生存困境，黄嘉俊学长表示十分可惜。他说，在他小的时候，大家普遍都讲方言，并不觉得这是件多么丢人的事情。小学门口的文具店，就是因为店主讲他听不懂的潮州方言，才成为一个对他来说“神秘而不敢接近的地方”。那时放学后，形形色色的方言杂糅在一起，客家话、潮州话、广东话四处可闻，甚至连小朋友们交流



大学麒麟队在思廷周年庆典表演



民宿举办大学生参访活动



黄嘉俊在华侨文化研学活动中进行解说

新兴玩具时，用的也是地方的方言。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家长的观念变了，似乎讲方言成了个上不得台面的事情，走在大街上，讲方言的人可以说是少之又少。

方言的流失，也导致故乡的概念在人们的心中愈渐模糊。对此，黄嘉俊学长表示，当代年轻人想要与故乡保持联系，一定要做的事，就是学习方言。他建议，千万不要觉得学方言是负担，要相信自己的语言能力。就他而言，学习方言后，他对语言应用更加灵活了。此外，他还提到，一定要常回家乡看看。“比如拿惠州来说吧，虽然我在那里没有人际关系，但每次回去，我都觉得，自己的根在那里。”

黄嘉俊学长还提到，与故乡产生连接的方法，除了讲方言，还有就是要多了解家乡的历史。黄嘉俊学长提到，自己曾担任深圳博物馆的讲解员，负责宣传深圳历史的工作。他了解到深圳的前身“宝安县”，竟在改革开放前就已有几十万的人口。了解深圳这令人振奋的历史文化后，他深感骄傲。他说，很多人其实并不熟悉深圳的历史文化，当地的故事值得我们学习和深挖。他通过自己的经历举例，建议年轻人多在故乡“走动”，从当地的岁月遗迹中挖掘故乡的历史。随着对一座城了解的深入，与它之间的联系和纽带也就会愈加牢固。

黄嘉俊学长认为，在当下想让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接轨，其核心是“创新”。为什么舞狮文化中的北狮没有南狮流行？就是因为南狮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时进行了改革，它是与时俱进的，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什么粤剧受欢迎？因为它适应本地人口味，把语言从西南官话改为粤语，这才兴起浪潮。黄嘉俊学长说，“永远不要觉得传统文化是一成不变的，只有跟着新时代进步，传统文化才能重新焕发光彩。”

最后，谈到未来的规划，黄嘉俊学长表示，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利用网络来传播传统文化是最优解，比如前段时间通过抖音进入大家视线的潮汕英歌舞。大学时期，曾有一位教授鼓励他将客家乡音用视频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样即使某天乡音消逝，故乡的痕迹也依然有迹可循。受到教授的启发，大学毕业后，他一直坚持记录乡音。而在未来，黄嘉俊学长将会聚焦客家方言的口音特色和未来推广，将更多客家人凝聚在一起，期待在未来某天，客家话能像粤语一样发扬光大。

主编手记

构思这个话题，是从春节的返乡浪潮中获得启发的。

今年的春节是疫情以来第一个可以自由行动的春节了，市井乡里间久违地出现了年味与团聚后的欢笑声。笔者有时会想，为什么我们的文化会对于“家”与“故乡”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以至于不远万里也要回到家乡与家人团聚。也许是中华文化中对于土地与农耕的高度重视，对于家族与伦常有着完备的体系。但无论如何，从古至今，我们对于故乡和土地的感情总是复杂而深刻的，故乡的文化与历史，街头巷尾的叫卖声与雕凿的印迹，自己在那时那地发生的那些故事，都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最初的印象，也是我们与故乡之间最为紧密的联结纽带。

笔者的故乡是江苏南京，世人称之为“六朝古都”，文化气息与历史感浓厚，然而只有真正在此生活十几年，才能感受到这种抽象的“文化气息”是如何自内而外地散发并影响着每个生活在这里的人。城市生活中的从容与沉稳，方言中的敦厚与朴实，经历了千百年风雨的洗刷，你能看到明城墙在草木荣枯中似在诉说过去的事情，也能看到各处散落的遗址与丰碑仿佛祭奠着时代的谢幕。而对于笔者而言，故乡发生的这些故事，其背后蕴藏的荣耀与灰暗、欢呼与叹息，都已伴随着文字与传说刻进骨髓，成为自己生命底色的一部分，让笔者即使离开家乡，也能时时感受到她所传授给我的人生道理与深沉的呼唤。也正是这种超越时间的相识，把笔者与故乡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故乡在当下的变化也时时牵动我的内心。

然而当下我们与故乡的情感也发生了变化。即使是春节期间，越来越多的人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再回到家乡。故乡于他们而言显然已经不是最重要的存在。随着技术与观念的不断更迭，我们与传统意义上的故乡开始疏离。一方面，交通方式的升级让我们更容易从千里之外回到家乡，不必拘泥于某个固定的时间点，另一方面，熟悉且封闭的环境也让我们渴望冲破固定的生活方式，于是故乡的意义不再局限于某块土地之上，而是与个人的幸福、内心的归属牢牢绑定。浪迹天涯的旅者会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志存高远的勇士写下“人生无处不青山”。故乡的山水，或许只有在我们旅途受挫之时，化作一个自我构想的乌托邦，让我们聊以慰藉。

因此，寻觅故乡的意义便转向了我们的内心，转向了我们自身幸福的来源。如何让过去的记忆与当下的自己和谐共存，是这个命题的核心。

叶润博

主编手记

最终敲定主题报道的选题是“故乡”的时候，我是有点迷茫的。作为一个广州人，“故乡”于我而言很近又很远，区区三十分钟的高铁的距离，载着的却是将近半载光阴的分别。到现在，一期杂志的编撰已经接近尾声，但究竟何为“故乡”？这个问题似乎已得到了解答，又似乎仍未有答案。

在第一部分，我们把“故乡”看作为出生地、成长地、血缘的归属地，收集了来自天南海北的故乡记忆；在第二部分，我们从离乡之人的视角回望故乡，探讨我们对故乡是何种感情，故乡又给我们何种支撑；第三部分则是对故乡的再思考与再讨论，从更加形而上的角度探讨在这个普遍归属感缺失、身份认同迷茫的年代，如何重构我们与故乡的联系，寻回我们的归属与寄托。此时，“故乡”一词早已跳脱出单纯的地理概念，化身为珍贵的回忆、心灵的依托、身份的认同、文化的归属。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那种若有若无的失落感、疏离感，也许正是源于这种根的缺失——对于土地依附的消失、对于故乡文化认同的缺失。对于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所谓的乡音早已成为听不懂的方言，所谓的故乡也不过是记忆里模糊的一角。找不到故乡的人也是寻不到根的人，如那蓬草般随风漂泊无所依托。如何抵抗疏离，如何自我和解，如何觅回归属？有的人用 City walk 来重新理解一座城，也有的人回乡开民宿重建与自己故乡的联系。无论何种方式，无论何时何地，不过是求一份心安，寻一份归属。有道是：“此心安处是吾乡”，所以何处不能是故乡呢？

在这一期主题报道的制作过程中，我收获了很多第一次——第一次参加选题会、第一次思考一本杂志的逻辑、第一次审校不同的稿件……每一次聆听不同的声音，都是对自己旧有想法的重新审视。每一次组织自己的语言，都是对过往经历的拆解重组。制作主题报道的过程也是我不断自省与成长的过程。

因为这是我初次参与主题报道的工作，当然也会有不顺利的时候。每回我字斟句酌，冥思苦想而不得时，包括现在，我就会开始反思——我在这里冥思苦想是为了什么？《神仙湖畔》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呢？每当这时，我就会拿起手边的过往刊物翻看，找写作的灵感，找存在的意义。当我捧起一本杂志，书在手中沉甸甸的感觉让我由衷感到踏实；当我掀起一角书页，那种纸张与纸张轻微的摩擦之声让我感到平静；当我抚过一行行铅字，文字的厚重感让我心生敬畏。当我一次又一次翻阅前辈们煞费苦心编撰的一本又一本校刊时，我想，也许这就是意义所在吧。我们的冥思苦想、我们的不懈努力、我们的相遇、我们的告别并非如那燕去无痕，这一本本白纸黑字的校刊便是见证。

真的十分感谢《神仙湖畔》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给了我们一个自由创作的平台、思想碰撞的殿堂，也很感谢一路走来，老师们、前辈们、伙伴们的帮助。

落笔写下这篇札记时，凤凰木的花已开了，春日里“故乡”的故事亦告一段落了，炎热的夏天也要来了……

刘璐嘉

人物

记录人物故事

Stories about
inspiring faculty and
students

PEOPLE



专访经管学院谭安厚教授： 我们都是答案的一部分

记者 / 于睿 施清源

撰文 / 施清源

编审 / 张筠尉

前言

谭安厚（Hugh Thomas）教授成长于加拿大西部，在早期的教育经历中深耕历史和文化领域，分别获得了艾伯塔大学的历史文学学士学位、北京语言文化大学的汉语言硕士学位和南京大学的历史学硕士学位。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让他对中国的文化、社会 and 经济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进入香港中文大学修读 MBA 课程，其后又获得了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的金融与金融专业的国际商务博士学位。

1980 年，谭安厚参与了中国第一所商学院的筹建，即位于大连的国家工业科学与技术管理中心。之后，他曾在香港从事银行业和咨询业长达七年。出于对学者身份的自我认同，他回归学术界，自 2003 年至 2013 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任职，并在 2015 年加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经管学院。作为一位拥有交叉学科背景和多元实践经历的学者，谭安厚对国际化人才培养的实践有独特见解，值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十周年，我们从他的独特视角，来理解这所大学致力于培养拥有国际视野人才的意义所在。

（R）

×

谭安厚教授



谭安厚教授接受采访

一、人生旷野

用谭安厚自己的话来说，从一开始学历史，到后来参与中国第一所商学院的筹建，他一直都处于“an unplanned path（计划之外的路径）”上。他的早期教育从加拿大开始，对历史的深厚兴趣引领他进入大学学习艺术和历史。上个世纪 70 年代，“反主流文化”是时下风靡并蓬勃发展的一股浪潮，质疑主流权威，推崇理想主义，“离经叛道”成为另一种主流。谭安厚也是其中的一分子，选择中断学业，开启一段环球旅行。这段经历把他带到了更大的世界之中，也加深了他对不同文化和政治理念的理解。

两年后，他重返大学，生活看似回到了原先设定的轨道，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谭安厚的人生轨道再次出现分岔口——前往北京语言学院学习中文。人总不觉车轮滚滚向前，已驶向一片新田野，这个选择彻底改变了他的职业方向。“我一直对中国感兴趣，中国其实是我个人背景的一部分。我的母亲出生在中国，她是一个在广州出生的美国人，所以她的粤语说得很好。用中文交谈是让她感到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这让我觉得很有意思。”

在中国学习和生活的经历，加之来自母亲的影响，谭安厚愈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经济发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78 年是一个不平凡的年份，“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全新的发展道路异军突起，聚焦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与讨论，在谭安厚的眼中也不例外。他来到香港，在香港中文大学攻读 MBA，正式踏入商业和金融领域。之后，无论是在银行业的工作，还是在帮助建立商学院的过程中，谭安厚都在学者和实践者的双重身份中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轨道。“当我从港中大毕业并获得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后，我成为一名银行投资家。我还帮助商务部在大连建立了一所商学院，我非常喜欢在东北的这段经历，这让我同时收获了在商业领域教学的经验。回到香港后，虽然我当了几年的银行家，在内心里我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学者。所以我再一次改变我的轨道，去纽约大学深造。”



谭安厚教授与同学们交流

最终，他回归学术界，先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任职，把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学术知识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港中大（深圳）是建立在港中大传统之上的一所大学，能够参与到其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二、发展剧变

谭安厚谈到了他对港中大（深圳）经管学院快速发展的看法。他表示，自己能成为这一变革的一部分感到非常荣幸，学院发展速度之快远超他的预料。他回忆道：“当我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在启动区，只有几幢破旧厂房改造来的教学楼。那个时候，我没想到这所大学会发展得如此之快，不仅在硬件方面，更是在软件——人才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那时，我们还没有这么多拥有热忱并具备能力教授公司金融入门课程的成熟师资力量，但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一支非常优秀的金融领域师资队伍。”

在大学迅速发展的这十年，外面的世界也在发生着剧烈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让人始料不及的，同时也引人忧虑。谭安厚认为，社会信念的不同往往是全球冲突的核心，纵观历史，人们对失去自己所珍视事物的恐惧一直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恐惧，担心自己的文化会因为入侵而被改变，这就是为什么尝试更多的沟通并试图理解对方在当今社会变得非常重要。正如数据革命是现下世界最为剧烈的转变，但它不一定是坏事，谭安厚认为在社会层面上，

R

×

谭安厚教授

R

×

谭安厚教授

我们实际上变得更好了。

“比如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或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入侵者强加自己文明的方式是非常恶毒的。现在比那时更糟吗？不，我不认为情况更糟，我认为我们变得更好了，因为我们更加了解其他人在做什么。”

而从个人层面出发，谭安厚认为当代人之所以觉得世界变得更糟、每个人面临的压力更大，很可能是因为我们认为能够通过决策改变自己的人生，而决策总是会带来一些压力。

“每个人都不得不做出很多选择，但我希望港中大（深圳）的学生能够接受思想的多元，享受不同思想交汇的环境，思想的交融能帮助他们进行决策。”

三、理解至上

在如今这个充满不确定的时代，“理解”是谭安厚在采访中提到最多的词。“你必须能够进入世界另一端的人的头脑，从他们的角度看待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也许并不是真相，而只是你两耳所闻、五官所感的世界形态。所以你需要以某种方式进入他人的大脑，以他们的方式看到这个世界。因为只有这样，你才能了解如何促成双方达成共识。”

他提到，我们总期待陌生人能信任自己，但其实这是种错误的假设。我们不应该去假设对方信任自己，而是理解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何而来，并且去理解他们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要真正实现一些伟大而美好的事情，需要人们相互合作，需要彼此存在一些信任和信念。港中大（深圳）环球供应链及物流管理项目就是印证这个观点的鲜活例子，这个联合培养项目始于建校第一年，它能落地港中大（深圳）得益于高校间的合作与信任：英属哥伦比亚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出于对港中大学术质量的认可，愿意跨越边界，对建立在港中大传统之上的一所大学预支信心和厚望。“两所高校对港中大（深圳）的信任来源于他们与沙田校区所建立的深厚联系，这种记忆和信任，是中外合作办学的优势所在。”

当谈到港中大（深圳）国际化人才培养时，谭安厚认为大学的国际化发展与深圳这所具有国际化背景的移民城市密不可分。“港中大（深圳）的学生和沙田校区学生的不同之处在于，沙田的学生出生在一个全球都市，而我们的同学来自中国五湖四海，选择来到深圳——全国最为国际化的城市之一，他们是带着成为具有全球视野的人才这个期许而来。这也体现了大学与这座城市的联结。”

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人才上，大学为学生提供了足够多融入世界的机会。勇敢抓住这些机会，走出舒适区，通过个人经历来了解世界的其他地方，尽最大可能通过个人经历去理解他人，这是教授给出的建议。

大学是个很浪漫、充满理想主义的地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更是努力为学生提供国际交流的场所。然而，这所学校的青年明明身处在一个相对自由、国际化的氛围中，却常常被未来可能遭遇的生活压力灼了心。“where to go？”相信是不少同学内心深处的疑问。与谭安厚教授的对谈或许能给我们一点启示。尽管我们现在还不知道答案，但我们都是这个充满意外的洪流中的一部分，努力理解他人并尝试与之合作，我们都会成为答案的一部分。（编审 / 张筠尉）

Interview with Hugh Thomas: “We are part of the answer”

Reporter/Yu Rui, Shi Qingyuan
Writer/Shi Qingyuan
Reviewer/ChenJundou

Forward

Hugh Thomas was born and raised in western Canada, living in Edmonton and Winnipeg. He received his bachelor of arts, with honors, in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postgraduate diplomas in Chinese language from the Beij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University and history from Nanjing University, an MBA from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nd a PhD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Finance from the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New York University. He participated in founding China’s first business school, the National Center for Industri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 at Dalian in 1980, and subsequently worked in banking and consulting in Hong Kong for seven years. He was tenured at CUHK from 2003 to 2013 and has been at CUHK-Shenzhen since 2015.

On the 10th anniversary of CHUK-Shenzhen, w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University in cultivating students with a global horizon from his unique perspective.

Unplanned Path

In his own words, Hugh Thomas was "on an unplanned path" from his early studies in history to his involvement in the founding of China's first business school. His early education began in Canada, where a deep interest in history led him to the Faculty of Arts and history studies at the University of Alberta. And, it was his passion for history that eventually led him to the wider world of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

In the 1970s, influenced by "the counter culture," Thomas chose to discontinue his studies and to embark on traveling around world. This experience not only broadened his horizons, but also deepened his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t cultures and political philosophies. Upon returning to university, he continued with history studies. However, an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the Beijing Language Institute changed the course of his career.

R

×

Professor Hugh Thomas



He showed profound interest in China's history, cul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while working and living in China.

"I've also always been interested in China. China is personally a part of my background.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so she was Chinese born American. She was American by nationality, and in terms of ethnicity, she is Caucasian. She has a Scottish, German, and English background, but she was born in Canton (Guangzhou), and so her Cantonese was excellent, but she didn't understand Mandarin. I grew up in Alberta in western Canada. I found it fascinating that nothing made her happier than listening to and talking with Chinese people. That was a very alive part of my background. "

After completing an MBA program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homas entered the business and finance field. Since then, Thomas has demonstrated his dual roles as a scholar and practitioner, both in his work in the banking industry, and in helping to establish a business school.

“When I graduated from CUHK with an MBA, I was able to help in the joint project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o set up a business school in Northeast China. I really enjoyed that experience.. We started China’s first business school in Dalian in 1980. That gave me a background in teaching business. Later I worked in Hong Kong as an investment and commercial banker for seven years. But in my heart I was basically an academic, not a banker. So I dropped banking and became a scholar again, pursuing a doctoral degree at New York University. That is what got me back into academics.

After he returned to academia he taught finance courses first in Canada, then in Hong Kong and now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passing on his extensive experience and knowledge to the next generation.

"I think CUHK-Shenzhen is a great university built on the tradition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o it's been fun to be part of it."



Unexpected development

Professor Hugh Thomas shared his views on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ME) at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He said he felt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is transformation. Initially, he did not anticipate that the school would grow so rapidly and make significant progress -- not only in terms of hardware, but also in terms of software, the talents.

"When I first came here, we were in the startup area. We just had the old administration building and those other converted factory buildings."

"I didn't think that the University would grow so quickly, both in hardware and software and talents. Because when I started, as I said, there weren't enough people that were keen on and really able to teach the introductory course in corporate finance. And now we have an extremely good finance faculty and finance department in SME."

In fact, during this decade of rapid growth of the university, the world was changing rapidly, and this change has been both unexpected and worrying at the same time. According to Prof. Thomas, differences in social beliefs are often the core of global conflicts, and what is really troublesome is the people who are convinced that the world is stealing something from them. The data revolution has been the most dramatic change in the world recently, but it's not bad. On a societal level, we're actually getting better.

"We haven't had the years like in WWI and WWII, when we had many people slaughtered, or the invasions of China by the Japanese or in the Middle East, where you have had the Greeks, Persians, and Romans that were really quite vicious in their way of imposing their own civilizations. Is it worse now than then? No, I don't think it's worse. I think that we're richer. I think that we're more aware of what the other people are doing. I think it's better that way."

R

×

Professor Hugh Thomas

R

×

Professor Hugh Thomas

From a personal perspective, Prof. Thomas proposed a novel idea. He argued that the reason we think it's getting worse and more stressful is likely because we think that we can change our lives through decisions, and decisions bring stress with them.

"I hope people attending this university can identify every aspect of that mix of ideas, enjoy the mix of ideas, where they can take advantage of it, notwithstanding the pressures of their programs."

Understand what their stories are

In times of uncertainty, "understanding" is the word Prof. Thomas used most frequently.

"You've got to be able to get into the head of the person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and see the world as they see it. I'm not saying it's the truth. I'm just saying it's the world as they see it. And the way you see the world is not the truth. It's just what's between your ears because you've taken it in through your five senses over the last few years. So you somehow have to get into their heads and see the world as they see it. Because only then can you understand how you can make a project or a business deal."

We always expect strangers to trust us, but that's a false assumption. Instead of assuming trust from other persons, we should know where the mistrust comes from and try to understand how they see the world. The economic system, according to Thomas, is like a trust system. To realize something great and meaningful, it requires cooperation, trust, and belief in each other. It is just like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Program at CUHK-Shenzhen, which exists based on the cooperation and trust among the three universities.

When talking about cultivation of internationalized talents at CUHK-Shenzhen, Prof. Thomas mentioned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ed development of the University is inextricably linked to Shenzhen, an immigrant city with an international background.

"The domestic Chinese students are international in outlook because they are international by choice. They come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and they come down to Shenzhen, which is the most international city in China. So those students are global in outlook by choice. This differs slightly from the CUHK students—they were born in a global city. For those who are global by choice, they want to become students with a global perspective. So that's one of the aspects of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UHK-Shenzhen and the city of Shenzhen."

Meanwhile, the University provides sufficient opportunities for students to integrate into the world, both within the mainland and through exchange programs overseas. Many students seize opportunities and leave their comfort zone to learn from other people and other places around the world - through their own experiences.

University is a romantic and idealistic place, and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henzhen strives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a place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Yet students are often stressed out about their future in such a free and internationalized environment. "Where to go?" This is a question at the bottom of many students' hearts. The interview with Prof. Thomas may give us insight. Although we don't know the answer yet, we are all part of the unexpected. If we try to understand and work with others, we will all be part of the answer.

邓扬舟：做一棵高出自己的树

学生采编 / 唐沐尧、金珠淇

责任编辑 / 张恩禧、冯子凌

编审 / 张筠尉



邓扬舟 肖像制作 / 何天妤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邓扬舟，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人文社科学院副教授（教学），人文社科学院首任通识教育部主任，长期致力于传统人文经典的教学和研究。邓扬舟曾在武汉大学、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通识教育部任教多年，于 2015 年获得“南粤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邓扬舟教授接受采访

常言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十年时间能见证一棵小树苗茁壮成长成为参天大树，对于校园里辛勤工作的老师们来说，十年时间又见证了什么呢？今年是邓扬舟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工作生活的第十个年头，他始终重视人文精神，专注于通识教育的延续和发展，教授学生知识与专业技能，与学生分享自身经历，启发他们对当下社会的思考和对未来生活的探索。

人文底蕴，一脉相承

在香港生活近十年后，邓扬舟选择前往深圳，成为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首批教师，他希望能将自己在香港生活工作中积累下的通识教育理念和方法带回内地。“在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的通识课以学生为本，提倡原典阅读，更重要的是采取对话式的教育方式。在我看来，这是人文教育里最重要的教育理念。”如今身处港中大（深圳），邓扬舟认为这是传播通识教育理念的好机会。“我先在沙田校区上课，后又到深圳校区上课。我认为，这几乎是无缝对接的过程，因为两地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是一致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建校十年来，邓扬舟深受同学们的关注与喜爱。他教授的“与人文对话”通识教育课程十分火爆，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同学们对通识教育的热情。

在新建成的逸夫国际会议中心里，邓扬舟和记者侃侃而谈自己对通识教育的看法：“如果用最简单的话来说，通识教育在我看来就是一个成年知识分子，在专业技能之外，

所需要的一种智性的、自由的知识储备和思维能力。”

通识教育是香港中文大学的金牌课程，曾在 2015 年荣膺美国通识教育学会颁布的首届国际通识教育大奖，而这种优秀的通识教育传统在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得到了延续和发展。港中大（深圳）的通识教育课程旨在为学生带来丰富学术生活及启发未来生涯的知识、技能及经历。结合广度与深度，通识教育提供了多种诠释人文艺术与自然科学的课程与活动，使学生能在当今瞬息万变的世界中做出更独立、理智、全面的选择。“通识教育的使命在于弥补当今大学教育过于技术化而导致学生欠缺综合知识储备的缺憾。”

邓扬舟认为，港中大（深圳）高度重视本科生的通识教育，其表现有三：一是分量重，通识课程学分占本科毕业生毕业学分要求的近六分之一；二是学科全，学生需要阅读人文、自然经典，包括天文、地理、社会领域等门类；三是配备专业师资和坚持小班教学，“大课、小课都由教授上，这几乎是全世界大学绝无仅有的”，而且外籍教授占师资团队的三分之一，所有通识课的讲师均拥有全球知名大学人文或社会学科的学术背景。

通识教育作为连接专业技术教育和全人教育之间的关键一环，注重全人教育中涉及独立及批判思考能力的培养。

“我为我们学校的通识教育感到非常骄傲，从同学们的反馈中也能够看出他们对通识教育大体是非常满意的。”作为通识教育部的教授，邓扬舟对港中大（深圳）的通识教育如是说。

拥抱变化，迎接挑战

如果把传统人文经典看作亘古不变的崇山峻岭，那么日新月异的科技就是浩浩汤汤的千流万川。二十一世纪，人类正向人工智能时代不断进发。当 ChatGPT 闯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人们无不谈论、尝试和探索这种功能强大的新兴技术。从“元宇宙”到人工智能，关于技术是否会取代人类的争论从未停止。语言哲学专业出身的邓扬舟也在观察着这一新事物：“有时候大家觉得这种大语言模型可以取代很多需要人类做的事情，比如认为它可以帮助人类思考，甚至可以帮助人类进行人文话题的探讨。当一些技术热潮蓬勃发展起来时，大家都非常兴奋。但有时冷静下来一看，会发现人们对于这种热潮的态度似乎过于乐观。”在学术界，对大语言模型的争论一直存在。邓扬舟引述了乔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学派的观点，语言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关于思想的系统。“机器看起来像是在思考，但实际上并不具备真正的语言能力。”在他看来，这是人工智能与人类语言能力之间的本质区别。

在尝试使用 ChatGPT 后，邓扬舟觉得这是一项“好玩的技术”；然而作为一名负责通识教育的老师，邓扬舟也表达了一些担忧，比如倘若有学生尝试通过人工智能完成期末论文，这必然会涉及学术诚信问题。然而这种担忧并不显著，因为“目前在通识教育方面，ChatGPT 还写不出一篇能拿到高分的文章。我见过好几篇类似的文章，自己也曾尝试使用 ChatGPT 写文章。然而，尽管我将要求描述得十分细致，但从学术角度来评析 AI 生成的文章，似乎都不太理想。”

R

×

邓扬舟副教授

R

×

邓扬舟副教授



邓扬舟教授授课。

面对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邓扬舟保持着开放但谨慎的态度。他指出，虽然人工智能可能会取代某些技术性强的职业，但在人文学科领域，尤其是需要独立思考和深度解析的领域，其局限性依然明显。“我不担心人工智能会取代人文学科的老师，”邓扬舟说，“我个人觉得没有必要把目前的热潮夸大为前所未有的历史性关头。历史上每一次看似巨大的技术变革都是如此，之后回望似乎并没有像人们当初想象的那么具有革命性。”

秉持着这种观点，邓扬舟鼓励同学们从传统人文经典和古老智慧中汲取应对现代新技术浪潮的力量。“我们需要从最古老的智慧里面吸取先哲们对人生对世界的反思，而勇于接触新事物也是现代知识分子的必要素养。历史上几乎所有获得成就的知识分子都能以开放平和的心态接受新事物。”

读一休人文，做气质青年

动画片《聪明的一休》承载了不少人的童年回忆，小和尚一休哥凭借其聪明伶俐的形象深入人心。“一休人文”是邓扬舟于 2016 年创办的个人微信公众号，他时常

通过这一窗口分享个人经历与理解感悟，志在播下人文种子、经营人文沃土。“一休人文”凭借其风格有趣、见解独特的内容，收获了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同学们的大量阅读与评论，在学生群体中产生许多共鸣。

或许“一休人文”长盛不衰的秘密，在于邓扬舟总是能将生活话题与人文思考巧妙结合，源源不断地输出有内涵的“段子”、有深度的长文。譬如，提起恋爱话题，邓扬舟在 2017 年通过“一休人文”发布了一份关于爱情的调查问卷。在一千多份来自港中大（深圳）学生的回答中，有 70.65% 的同学认为“在一起的感觉”是选择男 / 女朋友最看重的因素，有 18.81% 和 7.81% 的同学分别最看重“人品”或“颜值”，仅有 2.73% 的同学在选择男 / 女朋友时最看重“学问”。当记者问及邓扬舟对此的看法时，他首先承认了问卷的“娱乐性”。“当时学校里一共只有大约 1000 个学生，填报率非常高，几乎成为问卷发布当日的一次狂欢。”对于大多数同学都认为“在一起的感觉是选择男 / 女朋友最看重的因素”这一结果，邓扬舟表示十分理解，“因为这估计也是在大学象牙塔里面才会出现的结果，大家都非常纯粹地选择自己的恋爱。恋爱是一种重要的人生体验，所以我希望同学们不要被外表、财富和学问等外在因素所左右。我觉得问卷结果很好地表明了我们学生都很真诚。”在他看来，发布恋爱问卷、谈论恋爱话题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讨论爱情，而是用同学们感兴趣的话题来阐述道理，就像苏格拉底讨论爱情的目的是为了阐释人的精神成长一样。

谈及青年成长话题，邓扬舟也分享了他的独特理解。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青年的成长环境与以往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论语》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电视剧热播，“二十不惑”“三十而已”逐渐成为热门词语。邓扬舟认为，孔子的经典言论应更多地被理解作为一种指引，而非刻板的教条。在孔子的时代，人的平均寿命远不如现代，因此“三十而立”中“三十”的含义在今天可能相当于现代人的 40 或 50 岁。邓扬舟表示，随着时代变迁，人们不应拘泥于具体的年龄界限，而应当更加关注个人的成长路径和生活质量。对于“二十不惑”，邓扬舟坦言：“20 岁的年轻人正处于人生探索的关键阶段，困惑和迷茫是自然且正常的现象。与其急于摆脱困惑，不如坦然接受并享受这一过程，正如庄子的哲学思想提醒我们接受本性。”当被问及对“三十而已”的看法时，邓扬舟认为这反映了社会对年轻人期望的演变。在他看来，30 岁的生活状态不应成为评判成就的标准，年轻人应更多关注个人的发展而非外界的压力。“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我的大学生生活相对轻松，社会性的压力远不如今天的年轻人这般大。那个时代的学生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空间去探索和享受生活，而当代年轻人则面临更大的学习和就业压力。”尽管如此，邓扬舟也看到了当代年轻人在多元能力和综合素质上的显著提升，并指出这是社会进步的体现。

“一休人文”不仅致力于智慧的传递，更指引着香港中文大学（深圳）的同学们，通过葆有对生活深刻的洞察力，走向更为丰富多彩的人生旅程。在近年的阅读经历中，邓扬舟最愿意和同学们探讨的是《论语》中孔子周游列国的片段。这段历程不仅见证了孔子对施展抱负的不懈追求，也充满了理想与现实冲突的精神探索。对邓扬舟而言，这是一种理想主义与现实困境的生动展现，在当代青年寻找自我与面对挑战的道路上同样具有启示意义。正如孔子所言，“君子不忧不惧”，面对生活的挑战，青年人应坚定信念，勇往直前。

R

×

邓扬舟副教授

R

×

邓扬舟副教授

一棵树的信念

公众号“一休人文”中，一篇名为《树的信念》的长文在师生间广为传播。这是一个关于两代人命运与梦想的故事，邓扬舟在文中回忆了一位被时代遗忘的农村教师的生活轨迹。邓扬舟的父亲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树先生”，他曾经拥有成为教师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但无奈高考恢复得太晚，最终为了成就家庭更好的生活而牺牲了个人前途。尽管如此，他仍鼓励和支持儿子走出农村，去往更广阔的世界。

不知不觉间，文中那棵小小的树已经长大，邓扬舟也成为许多人喜爱和敬仰的“树先生”，变成了一棵注视着同学们成长的行道树。他自嘲是棵广东的榕树，生得野蛮，张牙舞爪、四处蔓延。这棵树拥有一种信念，根部粗壮，汲取养分供应全身；枝叶繁茂，智慧和思想充盈其中，启蒙和教育荫蔽众生。

在《树的信念》的末尾，邓扬舟写道：“我坐在树先生身边，为它插了一支烟，无言地久久地哭泣。泪眼朦胧中，我望着远方，那是我生活的方向。我在那里，已然活过了当初树先生的年岁，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教着差不多大的一些少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有时蓦然怀疑，我自己似乎也在那里快要活成了一棵不合时宜的树。我经常在门口的空地上整夜发蒙，把一支烟点燃又掐灭，掐灭又点燃。但无论如何，我都对身边的他们说，将来你要去很远的地方，去水草丰茂的地方，去风景壮丽的地方。你不要跌倒，跌倒了你也不要怀疑。你要知道，每一颗远飞的种子，都承载了树的信念。”

二十岁，我们的黄金时代

——专访播客《二十纪事》栏目创办者董智行、廖冰雁

学生采编 / 罗雯静、童溢
责任编辑 / 张恩禧、冯子凌
编审 / 张筠尉



董智行，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级学生，就读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现规划未来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相关工作，是播客《二十纪事》栏目创办者之一。自称是“永远在折腾的体验派”，持续追求世俗成功但坚信“快乐是第一要义”。他拥有很多身份，如欧莱雅校园创想家（优秀校园大使）、德勤 Club Member（最佳校园大使）以及美团、曼伦、蓝月亮校园大使等；同时，董智行也有非常丰富的经历，参与的项目有字节跳动—飞书商业化、欧莱雅—校园招聘、怡安人力资本—组织绩效与人才管理咨询等。最近，他在做一件有意思的事情——草坪小酒摊企划，被锐评为“港中深有自己的大冰”。



廖冰雁，香港中文大学（深圳）2020级学生，就读于会计学专业，辅修经济学，现定研究生申请管理学方向，是播客《二十纪事》的另一位创办者。大一以专业平均绩点第一进入会计学专业，大二在实习、社团、创业、商赛多方探索并皆有所成就，二十岁选择gap一年，在多种工作的尝试和旅游中，探寻内心真正的热爱。她自称“人生大冒险家”，爱好各种舞蹈、语言、运动和美食，喜欢旅游、参观博物馆、读书和听新闻，在多样的挑战中实现自我迭代，在热爱的领域不断深耕。



董智行（右一）、廖冰雁录制《二十纪事》播客现场

生命是一场持续的叙事，无论篇幅长短、节奏缓急，二十岁始终是其中不可忽视的节点。它见证了初出茅庐者尚未褪去的稚气，对不远未来的希冀，以及无可避免的迷茫和焦虑。二十岁的经历因人而异，潜心学习扎根学府有之，穿梭于社团和有趣活动有之，实习体验职场环境有之，四处旅行开拓见闻亦有之。

然而，无论是何种生命形态，身处于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和易变性的时代，二十岁左右的我们皆离不开对自己的追问——

“我们，还能勇敢吗？”

“人生的旷野，在何方？”

一、《二十纪事》

此番追问，体现在由董智行（Gary）和廖冰雁创办的播客栏目《二十纪事》中。这一栏目立志于收集银河系里各式各样二十岁青年的人生体验和思考，探讨人生的多种可能性，希望给正在探寻自身旷野的青年人带来一些启发与灵感。

当被问及取名“二十纪事”而非“十八纪事”时，冰雁指出，相比十八岁时在父母的指导下往前走，二十岁的我们则拥有更多自己的声音，更有勇气为自己的人生负责，尽管这个过程中难以

避免地伴随着许多迷茫。Gary 则认为“十八”到“二十”的两年，是更能独立思考、不断完善自我和完成人生“启蒙”的两年。

《二十纪事》播客抛开宏大的叙述视角，聚焦于个体，勾画出二十岁出头青年人的生命卷轴：由商科转教育的昭昭，探索什么是使自己真正感到开心、满足的事情，于是发现当老师、教语文是不错的选择，希望用自己的努力帮助他人，无论是充盈其知识，还是令其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有所成长，都宝贵且有意义；进入职场两年的明哲认为，自己直到现在仍不是大人，他始终保持着“be professional and cool”的人生格言，在对跳舞、登山、阅读等诸多爱好的不断深入中感受生活的激情，发现相比学生时代的事事对标，在职场中可能更需要找到自己的节奏，由内在驱动自己；睿睿在与自己的各种对抗中寻找出口，发现失控是人生中正常且必要的经历，体悟在成为更好的自己之前，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学会爱当下的自己……

当被问到印象最深的节目嘉宾，以及对“人生的旷野”问题有何思考，廖冰雁表示对自己影响较大的是与明哲学长对话的一期。她回忆道，录制那期播客时她正处于低谷，发现自己规划从事的管理咨询行业境况并不理想。人生的不确定性使廖冰雁感到迷茫。但在该期节目的对谈

中，廖冰雁才发现即使自己原本认为规划清晰的 Gary 和明哲学长，他们在做出选择的时候也没有对未来十足的把握。原来，大胆地允许迷茫存在，坦然接纳并锻练自己与之共处，并不妨碍对于人生旷野的追逐。人可以永远只为自己当下的选择负责，并带着迷茫在旷野中不断奔跑前行，横冲直撞地来到人生的下一个“拐点”。

二、逆流而上的鱼

作为《二十纪事》栏目的创办者，Gary 和廖冰雁的人生故事亦是独特而精彩的。正如第一期播客节目的介绍词中所写——“我们像是自己专业里逆流而行的鱼，我们逆着鱼群的大部队与洋流的大方向，转而选择了自己认为这一辈子真正要做的有意义的事情。”

Gary：务实的探险家

当被问及对自我成长有着重大影响的转折性事件，Gary 以大学入学为界，划分出了自己生命周期的幼稚期与成熟期。其中，对人际关系的建构和对世俗成功的追逐，是贯穿他成长过程的两条主轴线。

在大学前，首个关键经历是初三时谈恋爱。据 Gary 说，初中虽然自己是班长，但对学习的事情并不上心，而是将大量的时间投入学校社团活动之中，因此成绩并不是很理想。但在和“学霸女友”恋爱后，为了能顺利考入同一所高中，Gary 在其督促下成绩快速提高，最终在中考时进入年级前列。“这段经历对我升学这条主线的帮助很大，不然我可能从此走偏了。” Gary 笑了笑，指出人际关系对于人生方向锚定的影响。

相较于同龄人，Gary 较早地开始了对自我的认知和探索，这也为他未来的专业选择和职业规划做了铺垫。在高一升高二的暑假，Gary 参加了一场沙盘模拟的挑战赛，即广义上的商赛。从功利性角度看，对于以升学为目标的在校高中生而言，参与商赛对于提升成绩和进入一所好的大学并无帮助，因而显得有些“不务正业”。但 Gary 却说，正是这次由好奇心本能驱动对于

未知的探索，使他开始觉察到自己的优势和兴趣所在，并开始思考自己未来的职业规划。

从高中的商业兴趣，到大学就读于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的大跨度选择，Gary 娓娓道出其中的心路历程：这并不是无厘头的冲动，而是结合对行业趋势考虑的慎重选择。高中时 Gary 曾看到港中大（深圳）市场营销专业一位在职教授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港中大（深圳）该专业是交叉培养的，包含与大数据相关的配置设计。Gary 发现自己的观点和文章相近，即未来很多商业领域将由大数据科学来推动发展。自此，港中大（深圳）便成为 Gary 高中时的梦想。在被港中大（深圳）顺利录取后，正值第一届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开设，Gary 认为倘若想要通过数据驱动市场营销，不如先学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再投入商业领域。

进入大学后，Gary 用“改革开放”类比自己的成长与收获，每学期都是不同的生活面貌。其中，Gary 强调了加入学生组织“友思”对自己未来的职业选择所产生的影响。自大一上学期加入“友思”以来，Gary 先后负责“友思”一线的活动策划执行和管理工作，并于大二下学期成为“友思”的负责人。在此过程中，Gary 需要高强度地思考组织和管理相关的问题。Gary 时常探究如何从组织管理的层面出发，在激发员工潜力的同时，令其获得更为愉悦的工作体验。

大三时，Gary 开始了“北漂”生活。受对猎头的职业滤镜和在“友思”的经历影响，Gary 选择在北京快手做高端招聘的实习。此后，Gary 又辗转于咨询、金融等多个岗位，综合考虑下选择了人力资源作为未来方向。Gary 提到从事人力资源管理与自己实现人生价值的方式相符合，即利他主义。据 Gary 说，通过将合适的人安排到合适的岗位上，不仅使个人和公司获益，自己也能得到满足感，实现“三赢”的效果。

廖冰雁：渐进的觉醒者

廖冰雁的经历主要围绕“自我觉醒”展开，她认为人很难在某一瞬间真正完成自我觉醒，而是在很多不同的节点稍微觉醒一点，逐渐递进。廖冰雁主要分享了三次于她而言影响较大的觉



董智行（前排左二）组织“友思”活动

醒，同时她坦言，她对自我的探索仍然在路上。

据廖冰雁说，自己在十八岁之前是比较传统意义上的“乖乖女”，譬如高中时即使发烧到 39 度仍会照常上课。廖冰雁的第一次自我觉醒是在高中参加 FTC 机器人比赛。为了准备比赛，廖冰雁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翘课，一翘便连续几天，不惜熬通宵与父母老师吵架。这次经历使廖冰雁意识到人生除了满足他人的期待外，还可以勇敢尝试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初入大学，廖冰雁认为大一时的自己仍以惯性延续高三“卷”成绩的思维模式，缺少与周围人和环境的交互，因而信息比较闭塞，处在自己构建的世界里，是一种混沌的状态。大二，廖冰雁实现了第二次较大的觉醒。经历审计实习后，廖冰雁发现审计工作和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截然不同，且自己并不喜欢传统会计的就业方向。尽管当时周围充斥着诸如“工作就这样”“忍字当头”

的言论，廖冰雁认为在明知不喜欢审计的前提下，大学本科、读研乃至就业仍要继续为之奋斗，这一切都将无趣且没有意义，人生终变成看得见的死寂。对于廖冰雁而言，这一次觉醒是虽然不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但她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不想走的路是怎样的。之后廖冰雁便开启创业、实习、行研等各方面的探索，将所有自己能想到的路都去走一遍，试图回答“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个人生难解的话题。

第三次觉醒是在 gap year。冰雁坦言自己原本并未设想 gap，这个决策受到了当时实习的公司——迪卡侬环境的影响。在实习中，廖冰雁发现，原来每个人在各个时间段都会有迷茫。然而，她也发现在探索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个层面，无论是 35 岁不愿困于不喜欢的行业而转行从头做实习生的哥哥，还是放弃读博机会、从生命科学学术道路转到供应链管理业界的姐姐，似

乎都比自己更勇敢一些。此外，廖冰雁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个优势：在二十岁左右时“试错成本”还是比较低的。在 gap 的一年中，廖冰雁做了更多的自我探索，其中最大的收获是找到了自己真正热爱的领域——与公益、社区养老相关。此外，廖冰雁还收获了相应的勇气和自信。她曾因为 gap 和父母发生长达一个月的争执，为说服父母，廖冰雁做了四十页的 PPT，每天用半小时向父母解释 gap 的原因、自己的规划和预期，方才得到父母的同意。“即使在全世界都反对的情况下，依然能够摒弃外界的声音，坚持做自己，一直照内心的声音走下去，我认为这是需要极大勇气的”，廖冰雁说道。

被问及如何看待过去“乖乖女”的经历，廖冰雁表示接受每个时期自己不同的状态，自

己不应站在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责怪过去自我的局限和不够宽广的眼界，相反，会以感恩甚至有些心疼的态度看待过去的自己，有时那些尚不完美的点，倒也是成长的可爱之处。由于当时缺乏信息的摄入和思考，曾经的廖冰雁尚未意识到不同人的生命形态可以如此多元，赋予了考试和成绩过高的权重。谈到曾经为大一数学期中考试少考一两分就躲起来默默哭泣半小时，廖冰雁也笑着说“现在觉得不可思议”。但正是大一大二时“卷”GPA，反而让廖冰雁后续有了更多的底气去做其他的事情，这也让廖冰雁在某种程度上感恩过去的自己。冰雁认为人无法想清楚未来的自己会变成什么样，能按照自己当下的想法做好现在的事，已是难能可贵。



廖冰雁于 gap 期间在云南洱海体验生活

三、人际关系

Gary 和廖冰雁提到，发起并主理《二十纪事》这一播客栏目的初心是希望能够链接人群。两位主理人的性格都比较外向，在流行的性格测试中，Gary 和廖冰雁的 E 值分别达到 100% 和 99%，是名副其实的“大 E 人”。

然而，对于建立一段社交关系，廖冰雁认为自己倾向于和一个人慢慢发展并建立持续的亲密关系，但也会有一些在特定时段内关系比较好的朋友。“一个人的口味要宽一点，杂一点，‘南甜北咸东辣西酸’，都去尝尝”，廖冰雁引用汪曾祺先生《人间滋味》中的话类比社交，认为人需要善于发现他人的闪光点，通过与外界的不断交互，认识更多形形色色的人来打破社交壁垒。但同时也要有坚定的自我，而不是遇到谁就变成谁的样子。

相较于廖冰雁对于持续的亲密关系的追求，Gary 说自己对朋友设置的门槛较低，一般在生活中产生过交集，便认为对方是自己的朋友。在 Gary 看来，每个人对社交的需求是不一样的，无论是朋友数量的多少，还是关系的深浅，均无绝对的高低优劣之分。Gary 分享了自己的社交模式——进行适当的自我暴露，尽可能扩大社交的“池子”，以提高能够建立深度关系的概率。“真诚”“理解”和“尊重”是 Gary 总结的方法论。同时，Gary 坦言由于时间精力有限，自己现在有时可能无法满足所有朋友的社交需求。这时自己会明确直接地和朋友说明情况，并真诚地表达自己对朋友的在意。

在建立人际关系时，自我介绍是不可或缺的一步，而两位都使用了“个人说明书”的形式。Gary 提到自己使用该形式的契机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受字节企业文化的影响，在实习时 Gary 发现该企业员工常用“个人说明书”告诉同事自己负责的领域范围，以提高工作效率；二是 Gary 认为简历对于呈现个体生活的多样性有所局限，于是将起补充作用的“个人说明书”的链接放入其中。

对于“个人说明书”的作用，Gary 将其比作“对话的脚手架”，通过向对方呈现不同的攀爬点，供其选择感兴趣的点加以对话。此外，Gary 认为“个人说明书”是一种较好的自我暴露方式，相较于直接的言语沟通，其受众面更广，且不具有针对性，使观者充分享有“看与不看”的自由。“个人说明书”还能避免一些话题的羞耻感，例如能提供和想获得的价值，从事副业甚至买卖东西等，都可直接写在文档中。

廖冰雁认为“个人说明书”比较适合快速社交，有助于新朋友产生对自己的初步了解。此外，冰雁提到回顾和更新“个人说明书”的过程，也是审视自我生命、增进自我认同的过程。在其中，廖冰雁可以看到自己人生的主线，从过去的冒险中感受到勇气的延续，并鼓励自己去做更多的事情。“每次更新的时候都会感觉自己好酷啊！”廖冰雁笑着说。

四、社会齿轮中的一环

二十出头的青年人正处于人生的岔路口，不论是主动还是被动选择，常常都需要各种“卷”，在学校“卷”绩点“卷”科研、走出象牙塔“卷”实习“卷”工作，连社交娱乐也要“卷”新意。Gary 和廖冰雁也可谓在各方面也是“卷”出了成绩。

当被问到如何看待“内卷”，廖冰雁提到了自己心态的变化。廖冰雁说自己在大一大二时是“疯狂”卷 GPA 的类型，但在 gap year 见识到各种各样的人生后，发现大家不过是在大学四年中恰好搭乘了同一班列车。然而，每个人的既定轨道是不一样的，因此站在人生的长时间轴来看，人与人之间实则没有可比性。廖冰雁分享了一个有趣的比喻：每个人人生的不同时期就像拔智齿，有些人智齿长得早就早拔，有些人智齿晚长则晚拔。我们不会因为一个人早拔智齿或晚拔智齿而焦虑，但我们会



董智行的个人说明书（局部）及链接



廖冰雁的个人说明书（局部）及链接



因他人早达到所谓人生的巅峰——比如获得很高的 GPA 或者拿到大厂的 offer——而感到焦虑。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每个人的时区是不同的。冰雁说现在自己会用单纯欣赏的眼光看待周围成功的人，而不会将自己与其进行比较。

Gary 认为看待“内卷”的关键是主动和被动的的问题。如果是主动的话，其实并不算是“内卷”。身处社会中，尽管我们有时需要被动地接受所谓的“游戏规则”，但仍有空间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譬如在寻找实习岗位的时候，虽然有无法改动的行业规则，即一定要有相应的实习经历才能过简历关，但在接受规则之后，我们仍能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岗位实习。

对于如何在“内卷”中突围，Gary 提到需要寻找自身差异性，将自己和他人区别开。谈到同质性和差异性的话题，廖冰雁认为人有时选择随大流是因为缺乏自信，并且不愿为自己与众不同的选择付出代价，逃避为自己的未来承担责任的风险。若结果不尽如人意，便可怪罪于“大流”。在主动被动的话题中，廖冰雁补充道，自己一辈子其实是在追寻某种自由，是在世俗的不可更改的禁锢之上，寻找自己，最大限度地尊重自己内心的声音。

身为社会中的一员，“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是绕不开的话题。Gary 认为本质是遵循自己的内心感受，即追求某一部分，经过筛选后的世俗成功。Gary 指出，从社会地位维度看，从事人力资源管理其实并非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但其可以满足个体对薪资及大厂头衔的追求。此外，Gary 提到对世俗成功的追求，也是证明自己、“打脸”成长路上一些质疑声音的方式。据 Gary 说，他一直性格比较反叛，不太走常规的道路。面对身边众人的质疑，Gary 想用自己选择的路径去实现他们眼中的世俗成功，以此证明并非只有一条正确的路径。

对于 Gary 所说的“证明自己”，廖冰雁认为尽管现在会大胆地承认自己有虚荣心、会在意他人的想法，但还是希望未来自己能不要太在乎别人的声音。“因为这是我的人生，只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不必向你证明什么”，廖冰雁如是说。廖冰雁提到在 gap 期间，周围几乎都是不理解乃至反对的声音，这让她当时极度纠结。但在之后看来，gap 这件事只会对自己的人生造成影响，只要自己不后悔且能承担选择的代价，并不需要因为他人的否定而怀疑自己。

原来，二十岁的我们，是可以如此勇敢地去追逐人生的旷野。

于神仙湖畔，谈《神仙湖畔》

——专访《神仙湖畔》杂志社前主编叶润博

学生采编 / 刘璐嘉

责任编辑 / 罗筱茜 冯子凌

编审 / 张筠尉

引言

作为《神仙湖畔》杂志社的老成员，叶润博总能在开会讨论时侃侃而谈，但当接受笔者采访时，他却坦言自己有些忐忑不安。他一贯自谦，认为自己不过是大学生里、杂志社中很平凡的一员，因此从采访者到受访者这样的身份转变让他感到有些无所适从。或许是为了更自在地交谈，又或是出于对神仙湖特有的情怀，叶润博希望这次采访能在神仙湖，以边散步边聊的方式展开。

采访那天，神仙湖畔万籁俱寂，仿似侧耳倾听叶润博娓娓道来他与《神仙湖畔》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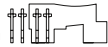
结缘·一纸投稿叩君门

叶润博说，让他与杂志社结缘的，是一次投稿的机会。高考后的暑假，他收到了《神仙湖畔》杂志社的征稿邮件。闲来无事，他动笔写下了这一篇结缘之稿——《理性的终极目标，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后来，这篇稿件被成功收录，并刊登在《神仙湖畔》2022 年秋季刊的主题报道栏目之中。在与当时的责任编辑蒲严博交流的过程中，他发现，在杂志社，大家或忠实地记录，或热烈地讨论，在这方天地思想竟可以如此这般自由地“碰撞”，这正是他的心之所向。进入大学后，润博抓住杂志社秋季招新的机会，经过层层筛选，成功进入杂志社，成为一名编辑。

回看这段往事，叶润博与杂志社的缘分似乎被一个个机缘所串起，但却不难发现这些“巧合”背后是早已深种的“注定”。尽管学的是纯理科，高中语文的学习却让他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虽身处应试教育体制之中，高中语文却教给了他很多考试之外的“大语文”。在老师指导与班级整体氛围的带动下，高中阶段他通读马尔克斯、卡尔维诺等知名作家的一些著作，读书笔记常常一写就是几千字。叶润博说，这样高强度的长篇写作不仅锻炼了自己的文字表达能力，也促使他在阅读过后把诸多思绪重新整合，用一些鲜明的关键词将这些想法有逻辑地串联起来，最后呈现在一篇文章之中。如此看来，高中时期叶润博对于文字的坚持和磨砺是名为“缘分”的种子，而与杂志社的结缘正是经年之后的新芽破土。



叶润博，《神仙湖畔》杂志学生主编，2022 级金融工程专业、道扬书院。



成长·雏凤清于老凤声

谈到他在杂志社的成长历程，叶润博说他很感谢前主编蒲蒲博的帮助。起初，作为栏目编辑的他仅仅负责润色、审校稿件的工作，并没有参与到选题策划的核心工作之中。后来在其提携和帮助下，他一起参加了主题报道的选题会，会上关于核心话题的深入解读让他对主题报道的内容开展与架构逻辑有了更深的认识和理解。谈到这里，他一半自嘲一半认真地说：“虽然当时在会上我发言并不多，但我能感受到他们交流的氛围是融洽且热烈的，所有人都全身心地投入其中，并提出很多颇有意思的观点。”正是在选题会的一次次头脑风暴之中，受讨论氛围的耳濡目染，叶润博关于选题的思考和策划渐渐有了自己的体系。

如今，叶润博已成为杂志社新一届的核心骨干。他在选题会上不再保持沉默；相反，他不仅条理清晰地陈述自己的看法，在面对同学们对于主题的疑问乃至质疑，他也能够沉着回应并统筹归纳各方有价值的想法，及时调整。策划之余，当时作为执行主编的他，还需要跟进编务工作，时常需要在结束一天的学习后，和其他编务组成员来一场“酣畅淋漓”的深夜研讨，从编务进度到人员架构，常常一聊就忘了时间。提到印象较为深刻的一次讨论，他回忆道：“有一天晚上讨论到深夜一点，当时外面狂风暴雨，水漫校园，校巴停运，最后几个人只能校园打车回宿舍。”

谈及他是如何成为学生主编时，他笑着说：“当初，社长问我愿不愿意当主编的时候，我是有些迟疑的。”他解释道，一方面是他觉得自己所知甚少，缺乏相关经验，担心自己不能胜任；另一方面，他当时升入大二，学业繁重，担心应接不暇。权衡再三，叶润博最终决定接下重任，挑战自我。正如他所说：“‘天予不取，反受其咎’，既然有机会，既然热爱，那么就不妨跳出自己的舒适圈。没有接触过，也不知道自己擅不擅长。不尝试，以后可能会后悔。尝试过了，真的不擅长，以后也就有理由不做了。”事实证明，他勇敢迈出的这一步无比正确，虽然在担任学生主编时少不了压力和艰辛，但于他而言，这段旅

途中，一切所见所感所思以及刊物最终落地所带来的成就感，已然是一种无悔。

影响·促我深思再求索

对叶润博来说，杂志社是他大学生活里浓墨重彩的一笔。这不仅仅是因为杂志社作为一个集体，给他带来明确的归属感，更是因为在杂志社工作是一个不断与人对话、产生思想碰撞、不断开阔视野的过程。

叶润博对他进入杂志社后的第一次采访印象尤为深刻，当时的受访者是人文社科学院的雷仕伟教授。回忆起这次经历，叶润博说，雷教授让他对于历史叙述产生了新的认知。雷教授谈道：“历史学研究不应该完全占据历史叙述的霸权，我们应该接纳多种历史叙述的方式，如小说、影视作品等等，这些基于历史真实的再创作能让历史更加鲜活和接地气。”这一观点深刻改变了他一直以来对于研究历史就是研究官方正史的看法，并对于历史创作以及更多的历史叙述方式产生新的认识。

在担任校庆刊学生主编的过程中，他也感触良多。从前，他认为要谈论“何谓大学”的问题，就应该从宏观的、更具普遍性的层面上入手，如谈论高等教育和人的成长。但当他真真切切地着手去编写一本校刊，聆听来自校园里四面八方声音，书写不同主体的故事时，他才发现与那些泛泛而谈的宏大叙事相比，这种从点滴中、从平凡中书写故事，具有触手可及的质感及值得推敲的颗粒感，更能体现出一所大学的独特之处乃至真实面貌，也往往更具共情力。

除了一些观念认知上的变化，在杂志社的经历也促使叶润博对很多习以为常的现象进行再思考：在选题会上常常需要深挖一些校园热点话题的背后成因，这个过程会促使他去重新思考很多问题，比如自己真正想要什么。叶润博说，在整个学校焦虑情绪的充斥之下，在“卷”的氛围的笼罩之下，专心去做一些于长远自我提升有益的事变得很难，比如说坚持写作。很多同学一心只着眼于专业课的一亩三分地，对于一些成效慢



叶润博的第一篇投稿：《理性的终极目标，是回归对于人的关怀与生命的尊重》，刊登在《神仙湖畔》2022年秋季刊。

却于未来人生有益的事情失去耐心。在他看来，大家“卷”GPA的背后，其实是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什么的迷茫，所以只能着手于GPA这样一个相对更直观、更确定的方式。但想要真正回答这个问题又谈何容易，叶润博说他目前也没有很好的答案，这大概需要时间去持续回答和求证。

当被问及杂志社的工作是否影响他的学业时，叶润博说，杂志社的工作于他而言，其实是繁忙学业之外的一种放松。作为金融工程专业的学生，成日埋首于数学、计算机等理工科的知识，难免会感到烦躁和疲惫。每当这时，他就会停下手中的功课，投身于杂志社的工作。他说：“杂志社其实给我提供了一个可以去切换思维方式的平台。”他认为，这样的切换能够防止思维僵化，让他的大脑得到有效休息。就是这样在文理之间反复横跳，他很好地把追求确定性的理科思维与充满创作空间与不确定性的文科思维结合在一起。叶润博相信文字是神圣的，当他抱着这样的想法投入到杂志社的工作中时，就能从文学与文字中感受到精神上的提高。杂志社的工作于他而言不仅不是一种负担，反而是一种享受了。

“在《神仙湖畔》工作的时间已经有近一年半之长，从2022年的秋季刊到2024年的春季刊，从一个普通的编辑到主编，再到主题报道栏目的责任编辑，其间与许多有趣的灵魂深入交流，彼此合作，也经历了很多挑战并一一克服，获得能力上的提升。但我想更重要的是如何去理解自身工作所能给他人带来的积极影响，《神仙湖畔》的宗旨是“忠实地记录，热烈地讨论”，而我在工作的过程中也开始参悟这句话的道理，并且认定我们所出版的刊物是有价值的，它的意义在于：将那些我们曾注意过，但因各式琐碎而并未深入思考的话题通过行动、通过文字、认真且完整地呈现在读者的面前，并寄希望于其并不懂懂的思辨指引，唤醒大家对于社会、对于世界以及对于自我的理性审视。如此，人才更易跳脱出自身所处的困境，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

——叶润博

校长专栏

体 察 思 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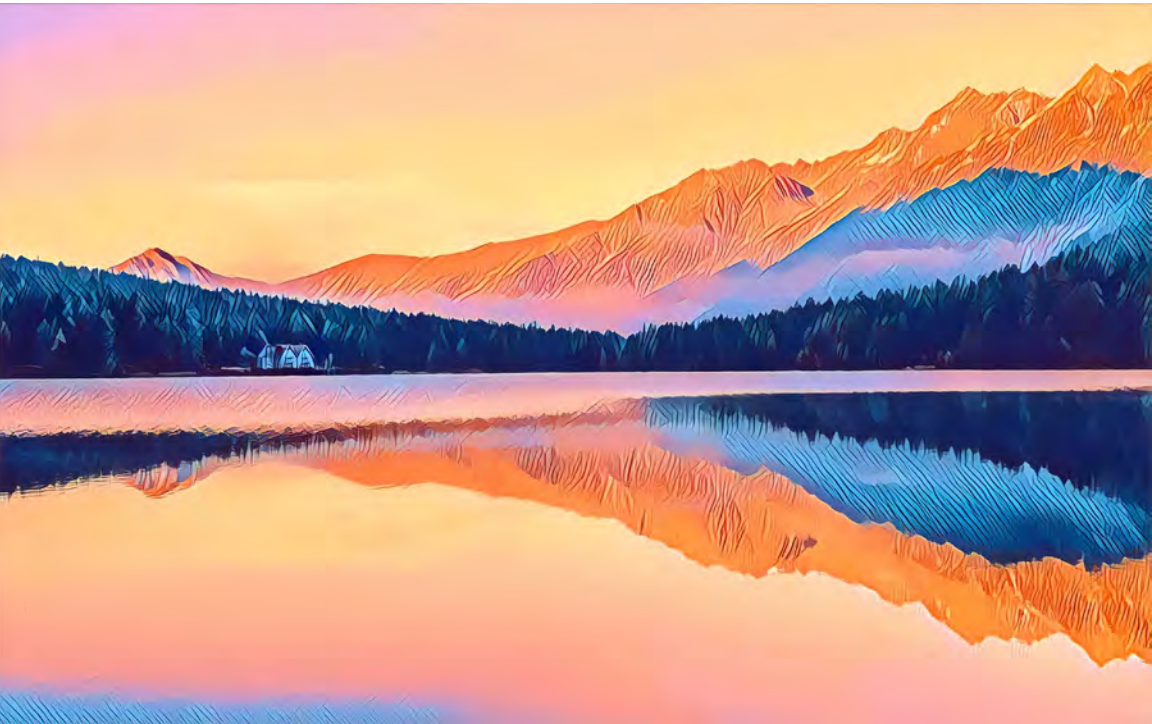
Thoughts about life
from President Xu

PRESIDENT'S
COLUMN



黄昏的神仙湖

文 / 徐扬生
责编 / 林之源



旧时的龙岗，与今天看到的完全不同。我这里的旧时，其实也不过十年不到的光景，那时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刚刚开始筹建，我几乎每天都要从香港，或者我暂住的南山开车过来。那时的龙岗，既不像南山、福田那样是一派高楼林立的大都市的样子，更不消说与香港的中环、尖沙咀比了，也不是一片鸟语花香的田园乡村，而是一簇簇的城中村，中间夹着一处处的建筑工地。夜晚一群群的务工者，打着赤膊，穿着拖鞋，讲着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走在昏黄的人行道上。

我童年的时候曾经与祖母一起在后园里养过鸡。小鸡是很可爱的，毛茸茸的，两只小脚，走起路来一晃一晃的，非常招人喜欢。养大以后的鸡，其实也很好看，公鸡那油光光、绚丽多彩的羽毛，走路永远是趾高气扬的样子，而母鸡则有一种收敛的美，黄橙相间，素雅美丽。最不好看的是刚刚发育的、

从小鸡变成大鸡的过程中，那种“青春期的鸡”，身上长了几根硬毛，失去了小鸡所有可爱的特征，还到处寻事干架，没有人会喜欢这个时候的鸡。

那时的龙岗，就像这种“青春期的鸡”，真的不好看！

而我，却偏偏喜欢这里。

龙岗，这只“青春期的鸡”，是有着勃勃生机的，你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块土地里“青春的躁动”，以及这种躁动背后巨大的能量。这里的街头每天都在变化，这里匆匆行走的都是清一色的年轻人。他们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二十出头，三十几岁的人在这里都算“老”了！这里有的是一大批欣欣向荣的高科技企业，灯光彻夜通明。你在这里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未来，这不就是一所大学应该立足的地方吗？何况这里还有一个非常让我动心的地方——一汪非常清澈美丽的湖水。

水有灵气！这个湖，我们后来就叫它“神仙湖”。

这个湖实际上是一个水库，不是很大，起初是供深圳人饮水用的，需要时甚至还把水输送到香港去，后来因为周边建了几个比它大很多的水库，它就被列为“战备水库”，平时只是蓄水而已。周边的山脉，村民们叫它“神仙岭”，于是当时我就冒昧提议，不妨把这个水库命名为“神仙湖”。湖比水库要雅一点，“神仙”这个名字既与“神仙岭”相谐，又很有意境——教书育人就是神仙的活，办大学要有大神、大仙才能培养出大神、大仙。智者可以视此地为清雅娴静、仙风道骨之处，俗人也可以按自己的解读，祈仙人保佑，日和年丰。所以，这个名字是雅俗共赏的。

然而，一个好湖要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周遭的山色景致，二是湖边的亭台楼榭。你看，内蒙古草原上有很多湖泊，你去问湖的名字，人们都不知道，而我们所知的著名的湖，往往都具备了这两个条件。就说杭州的西湖吧，周围烟雨朦胧的山和山上的宝塔，湖边的座座亭楼和连接堤岸的小桥，都给湖带来了一种精神。清人有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西湖。”你看，有了岳飞、于谦之墓，西湖才得以为世人所重视。

神仙湖，三面环山，山峦层叠起伏，将湖水环抱其中。这些山都不是很高，和湖水相得益彰，正是天然的绝配，所需改造的是湖边的道路和景观。我的办公室里一直挂着一张湖的地图，那时每周都与政府和有关工程部门商量：能否把这里的路打通，建个木栈道？能否在那里建个亭子？有一天晚上，做梦时梦见了日本的雪舟和尚。这位在我们浙江宁波天童寺里住了很久的僧人，把中国画传到了日本。他曾给很多朋友画过他家乡的风景，一个美丽的小湖，周边有起伏的山峦，再有一座很雅致的亭子。晚年，当他返回故乡时，他突然发现，家乡的湖边其实并没有亭子。他问家乡的老人是不是亭子倒了，老人说原本就没有亭子。雪舟很不安，因为他画的那么多画中都是有亭子的，怎么可以没有亭子呢？于是，他决定自己出资建造一座他画中的亭子，就在画中湖边的位置。

想到这里，我觉得神仙湖边上应该建一些亭子。于是，起初在东西两岸建了两个亭子，一个是具有岭南风格的三层中式亭子，一个是圆顶的西式亭子，寓意是中西结合，古今通会。再后来，一位懂文化、有情怀的好友将一座有着三百多年历史的古榭移置到神仙湖边。这个古榭典雅古朴，从任何角度看过去都美不胜收，它的古色古香给这所年轻的大学带来了历史的厚重感，它的质朴高雅又给这里的读书人带来了做学问应该有的纯洁和高尚。

我的住宅离神仙湖走路也不到十分钟，这几年我不出差的时候，几乎每天都会来这里走走。起先是早晨来得多，后来是傍晚多。神仙湖周边有很多小路，这些山边的小路是我的最爱。那时刚刚修这些路，有时水泥还没有干，地还是软的，我一不小心踩上去，鞋印子就留在了那里。由于这里远离喧嚣的城市，周边的居民不多，因此特别适合散步或者慢跑。与我同来的一个香港朋友说，在这里跑着跑着，仿佛以为是在一千多年前的唐朝……静谧的山色，新鲜的空气，确实让你得到难得的休息与滋养。

当我早上从住宅边上的一条小路，沿山往湖边的方向走去时，常常会遇到一位扫地的老伯。他穿着黄色的工作服，小个子，长得很有特点，眼睛特别大，脸短，五官很立体。如果有人对中国古代人物画熟悉的话，这个大伯很像唐代画上的人物，现代人很少有这样的面孔。他有点像寺庙里的罗汉，既有点狰狞可畏，又有点和蔼可亲，我也不懂为什么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感受会同时出现在一张面孔上。这个大伯常对我笑笑，简单打个招呼。起初见到他是在离湖比较近的地方，他每天早上从那里开始扫树叶。后来见到他多是在我住的地方附近，也许他觉得我起床比较早，就先把我要走的那段路扫干净，然后再扫别的地方吧。而当我在傍晚去湖边散步的时候，常常看到他骑着自行车，车后坐着一位老太太，估计是他的夫人，我常常笑着与他们打招呼。有一天傍晚，我在那条小路上散步，天突然下起了大雨，深圳的天气就是这样，躲都来不及。我跑了一阵，发现前面这位大伯和大娘正站在路旁，身上有一块大的黄色雨布。他们把我拉进去，我们仨就在一棵树下躲雨。这雨一直下个不停，我们就聊了一会儿天。他俩是来自粤北的农民，普通话不太灵光，到深圳来原本是为了就医。他们两人都得了晚期的癌症，在医院治疗不仅花费不起，而且效果也不好，所以他们想不如就近找个活做，这样他俩就在这里做起了清扫公园的工作。

听到这里的时候，我忽然想起了许多年前我认识的一对老夫妇，同时得了癌症，医院的治疗效果也不理想。一位朋友告诉他们，每天吃一个苹果或橘子会很有益。但那时一个普通人家要每天吃上水果也不是很容易，所以那对夫妇有时就把一个苹果分成两份，一份丈夫吃，一份妻子吃。妻子总要让丈夫多吃一点，觉得这样也许会让病好得快一点，后来丈夫发现了，又暗暗把苹果给妻子。这样吃了几个月，这对老夫妇的癌症竟然奇迹般地好起来了！后来知道此事的朋友都相信吃水果对治疗癌症可能有好处，我不是专家，不知道是否有道理，但这件事我却知道是真实的。后来，我常常想，也许不是因为苹果，而是因为分苹果的那种恩爱，那种互为依靠的精神，真正治愈了他们的病。

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眼前的那对老夫妇听，他的妻子一下子话多起来了：

“就是嘛，我一直让他多吃点水果，他都不肯吃。”他俩一下子活跃了很多，说话就像一对年轻情侣。

我相信，爱能治愈一切。当有人爱你时，你就会显得自信，就会有战胜病痛的勇气与能量！

生命与爱的关系，我从前总认为，爱是生命的影子，有时有，有时无，有时长，有时短。现在想来这个关系可能应该倒过来，生命是爱的影子，如果没有爱，生命也就消失了！

神仙湖是一个神奇的地方，一天中每个时辰都有它特有的美。当你沐浴着初升的太阳来到湖边时，你会发现清晨时分，湖边的鸟儿实在太可爱了！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鸟，有的比螳螂还小，还有的像鸡那般大，飞都飞不动的样子。除了鸟，还有那些我根本叫不出名字的花。我同家人讲，我在湖边转一圈所看到的花，比我在香港一年看到的花还多。

然而，我最喜欢的还是黄昏的神仙湖。夕阳照在湖面，波光粼粼，微风吹动湖边的芦苇和各种颜色的花。等我走了一圈后，太阳就下山了，湖边的路灯开始亮了。黄昏的神仙湖，显得格外宁静，下午在这里跑步的、拍短视频的、打太极拳的都不见了，来的大多是一对对情侣，在静静地散步。当人的声音静下去时，湖边的鸟鸣声、蛙声和蝉鸣声就听得愈发清晰了。再过一阵，月亮就升起来了，淡白色的月光照在湖面上，一闪一闪，天好的时候，你能看见亭台的倒影和湖对面行人的彩色衣裙。

我喜欢在这黄昏的湖边散步，这是我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光，没有干扰，放空自己，不想任何事情，傻傻地走路。这时间，你会发觉你的呼吸变慢了，身体放松了，心息相依了，物我两忘了。忘形忘物，无天无地，你感受到了仙气，那是神仙湖的仙气，让你感受到生命的真正意义，就在于每一次呼吸，每一步脚下的路和湖边每一盏路灯。

是的，在湖边散步，你会寻找到这快速变化中的永恒。这周边的龙岗一日千里，每天都在追求新技术的突破。然而，我们却不能忘了，世界总有一些不变的道理，那些永恒的东西，就像这一汪神仙湖的湖水，让我们感受到百年大学的意义！

来吧，亲爱的，我们一起走，别出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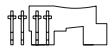
**growth of love
and care**

书 院

成长、温暖与爱

HOME





共启新途，筑梦前行

——逸夫书院旗下学生组织专访

学生采编 / 唐可馨
责任编辑 / 唐嘉谣

恰逢春花烂漫时，校园中，不止春意璀璨，亦有同学们赋予的浪漫。书院不仅是我居所，更提供了联结的平台，在其之上，学生组织各出其采。在逸夫书院这片沃土上，逸舞台与逸夫青年研习社这两大书院学生组织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坚定的信念，凝聚着一批又一批知音，他们或以艺术为媒，或以学术为魂，打造艺术的乌托邦，也力图走出象牙塔探索社会图景。

逸舞台——梦开始的地方

成立于 2022 年的逸舞台，在过去一年的校内各类活动中大放异彩：迷你音乐会，雨声与音乐融为一体，编织一场诗意的梦；“与您逸起唱”，踏上舞台歌唱热爱，聚光灯照亮每一个小小的梦想。逸舞台，给予了每一位敢爱、

敢想、敢做梦的青年登上舞台的机会。

在今年的“蒙面歌会”中，首次参加活动的逸夫书院 2023 级王浩宇同学、2022 级肖雨荷同学和 2019 级寿骏德同学组成了一支团队。寿骏德坦言，自己从很小的时候就喜欢唱歌，拥有一个乐队梦，有的时候在洗澡时都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歌来。但当真正站在逸舞台上，看着台下挥舞着荧光棒的同学与教授们，他不可避免地有些紧张。团队里其他成员的舞台经验也相对有限，大家都是首次参与“蒙面歌会”。

“然而，一旦站上舞台，沉浸在音乐的海洋中，紧张感便逐渐消散。”聚灯光弧四散，贝斯手奏响第一个根音，音符四处幻化成风而台下荧光棒摇晃，他们出色地完成了三首歌的串烧。

在本次活动中也出现了一支大一新生乐队——可燃冰乐队。“‘蒙面歌会’是我们的首秀。在站上舞台之前我们并不知道自己能表



可燃冰乐队演出现场



“与您逸起唱”舞台

达到什么程度，但当全场一起跟随鼓点摇晃时，我觉得我们能够爆发出的能量是巨大的，是这个舞台给了我们继续下去的勇气。”可燃冰乐队主唱坦言。二十岁是爱做梦的年纪，一把吉他、两支鼓棒，在逸舞台的聚光灯下，少年双脚离地，梦想长出翅膀。

为保障活动能持续展开，逸舞台搭建起别具特色的组织架构和管理模式。逸舞台的指导老师 Annie 介绍道：“逸舞台里的所有艺人都是不固定的，可以在不同的部门中流动。”在流动的形式下，所有的人员分配都以个人才艺为准，为最终的节目舞台效果服务。“这是一个‘人才池’。当我们需要筹办一个节目时，我们会在‘人才池’里挑选出最适合该项目的艺人。”演员可能会来自不同部门，协调合作，一同参与一场节目的演出。这种组织模式不仅提高了节目筹办效率，同时也让艺人们有更多

机会站上舞台、享受舞台。

唱出的情感被影像记录，深藏的梦想被掌声激励。或相约于此，或筑梦前行，让我们在逸舞台上歌唱热爱，共享逐梦的青春时光。

逸夫青年研习社——理想者的阵地

关于梦想、关于希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有些人梦想在舞台上燃烧，而也有这么一群理想主义者致力于关注国家大事与社会议题，将静心探索与思考作为理想。逸夫青年研习社就是这样一个学术性学生组织，他们梦想着通过社会调研形成真实经验。

2020 年，逸夫青年研习社的创始人耿士淇萌生了为心系中国社会发展现状的青年学子创建一个交流平台的想法。恰巧，逸夫书院正计

划筹办一个培养逸夫学子集体责任感和社会关怀的学生组织。两者一拍即合，逸夫青年研习社应运而生。

为了避免陷入“只喊口号”“假大空”的误区，逸夫青年研习社坚持“把学问书写在中国的大地上”，以微观层面为切入点，探讨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现实是存在缺陷的，而有些人正在忍受这种缺陷。这不是一种认知，而是一种存在。这种缺陷一经由一部分人忍受，它就成为全体人类的痛苦，因为人们是相互依存的，诸法生减变化，在无量中见到一，在一中见到无量。因此，我们有改善现状的义务和责任，我们不能停滞不前，需要让自己向前迈进一步，

去做些什么。”社员如是写道。

在调研课题设置时，逸夫青年研习社一直注重避免比较宏大的话题，将调研的对象和问题进行细致的划分。例如在面对深圳这样一座庞大的城市时，社员们穿越宏大的图景结构，而更加关注细微之处，诸如住房、爱情与深圳梦，深入城市看不见的角落，对城中村与流动儿童进行调研。

与以往调研不同的是，这一次调研的重点受访群体是儿童。也正是这次别具一格的调研，给予了逸夫青年研习社社长刘竹青不同的灵感，让他对调研者与受访者的关系作出了与从前不同的回答。“作为调研者，我们总是带着预设去向受访者提问。我们的问题设置和当时的采访环境，



逸夫青年研习社社员合影



研习社日常讨论



迷你音乐会舞台

无可避免地会对受访者产生隐形引导。”他不由得产生了一系列疑问：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的答案和反馈是否依旧客观？而受访者的主观意识又在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社员们的提问和观察又是否会让他们感到“被观察”、“被凝视”的不适？如果会，那么调研好像就演变成了一种知识分子的猎奇，与逸夫青年研习社的初衷相悖。

“这一系列的问题促使我不断反思，让我对社会调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刘竹清说。

在实践中产生问题，在实践中解决问题，逸夫青年研习社用自己的方式与世界交手。对于他们而言，每一份客观但冰冷的数据与报告

文字背后，都隐藏着无数个具有温度的故事；每一次调研，都不仅是简单的数据收集，更是一次自我审视、观察社会的心灵旅程。

青年如何看待世界，世界又该如何看待青年。“社会敏锐的观察者和毫无疑问的中坚力量，这是我们对自己的梦想与期待。”这是来自逸夫青年研习社掷地有声的回答。

对于梦想的定义，逸舞台和逸夫青年研习社给出了不同的答案。但相同的是青年们对梦想的坚持与奋斗，知音相逢时灵感碰撞的火花，以及书院对于大家构想的支持。书院同学生组织一起共启新途，筑梦前行，告诉我们他们关于梦想的诠释。

《神仙湖畔》杂志社学生编委会

主编



惠诗雅
2020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I am rooted, but I flow.

副主编



冯子凌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一直真诚的心；

责任编辑



叶润博
2022 级 道扬书院 金融工程专业
这世界真是个令人振奋的地方！



薛中凯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接受平凡，感谢平庸。



罗筱茜
2023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午觉是一种甜美的死，睡者在半醒的状态体味他消亡的快乐。



杜可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公无渡河



唐嘉谣
2023 级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迎风远扬 静承天休



林之源
2023 级 厚含书院 理工学院
独望岁中玉，雪落竹下潭



张恩禧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怕什么真理无穷，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



刘璐嘉
2023 级 厚含书院 经管学院
一起奔赴我们明媚的春光和世界！



陈智欣
2023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那个夏天的蝉鸣比哪一年都聒噪，教室窗外枝丫疯长，却总也挡不住骄阳。

采编



唐可馨
2022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罗雯静
2021 级 思廷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沉潜



季伊忱
2019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因上努力 果上随缘



施清源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Let it be



黄子珊
2023 级 学勤书院 经管学院
勇敢选择自己喜欢的那片海



童溢
2023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bu



高子悦
2023 级 厚含书院 医学院
不耻与浅俗为伍，不怯与灿光探近。



谭芷韵
2021 级 逸夫书院 经管学院
做一个松弛、独立且内心强大的人



赵榕熙
2020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感受、发现和记录是有力量的



刘广悦
2021 级 逸夫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她强任她强，清风拂山岗



于睿
2021 级 祥波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日上三竿我独眠，甚好！



蒲严博
2021 级 祥波书院 经管学院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宣传



陈依雯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静门



伍彤悦
2023 级 厚含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但当你智慧都酝酿成红酒 仍可一醉自救



黄语忻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River flows in you.

美术编辑



裴嘉琨
2022 级 学勤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陈彦升
2020 级 思廷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禁止设计



李潇彤
2022 级 道扬书院 经管学院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郑奕然
2022 级 思廷书院 数据科学学院
再看一遍最喜欢的一集！

流程编辑



肖毅然
2022 级 道扬书院 人文社科学院
the best people in life are free~



王梓涵
2021 级 思廷书院 经管学院
你是我曾拥有无法捕捉的亲昵 我却有你的吻你的魂你的心



叶未央
2023 级 逸夫书院 理工学院
To recreate life out of life.

2024 年春季刊贡献者名单

主编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副主编

冯子凌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责任编辑

杜 可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薛中凯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刘璐嘉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张恩禧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罗筱茜 2023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唐嘉谣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陈智欣 2023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逸夫书院
林之源 2023 级 理工学院 厚含书院

流程编辑

王梓涵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肖毅然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叶未央 2023 级 理工学院 逸夫书院

美术编辑

裴嘉琨 2022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学勤书院
李潇彤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陈彦升 2020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郑奕然 2022 级 数据科学学院 思廷书院

宣传策划

黄语忻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伍彤悦 2023 级 数据科学学院 厚含书院
陈依雯 2021 级 经管学院 思廷书院

[演讲]

编辑

唐嘉谣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主题报道]

编辑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刘璐嘉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赵榕熙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采编

叶润博 2022 级 金融工程专业 道扬书院
唐可馨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蒲严博 2021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赵榕熙 2020 级 经管学院 祥波书院
惠诗雅 2022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张恩禧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谭芷韵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刘广悦 2021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撰稿人

胡思恬 2021 级 数据科学学院 逸夫书院

编审

徐 涵 CPRO

[人物]

编辑

冯子凌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张恩禧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
罗筱茜 2023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采编

唐沐尧 2020 级 经管学院 学勤书院（特邀）
罗雯静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思廷书院
童 溢 2023 级 人文社科学院 道扬书院
刘璐嘉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施清源 2022 级 经管学院 道扬书院
于 睿 2021 级 人文社科学院 祥波书院

编审

张筠尉 CPRO

[校长专栏]

编辑

林之源 2023 级 理工学院 厚含书院

撰稿人

徐扬生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

[书院]

编辑

唐嘉谣 2023 级 经管学院 厚含书院

采编

唐可馨 2022 级 经管学院 逸夫书院